

---

# 蘇軾研究

2015年第3期（总第42期）

（季刊）

## 卷首语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吟咏桂花，苏轼咏桂花诗云：

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玉堂仙。  
驚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  
破衲山僧怜耿介，练裙溪女斗清妍。  
愿公采撷纫幽佩，莫遣孤芳老涧边。

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苏轼任杭州通判，御史中丞杨绘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外放杭州知州。适逢天竺寺高僧赠苏轼桂花，苏轼分赠杨绘，并作此诗，借桂花高洁超迈之姿赞喻杨绘，既表现自己耿介的品格，又以此互勉。此时是苏轼做杭州通判的第三年。自王安石变法起，苏轼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为他所认定的真理进行倔强的斗争，不曾想他这种舍身报国的做法惹怒了变法派，也惹恼了皇帝，最终落了个外放杭州的下场。

又是一年金秋，眉山三苏祠的桂树郁郁葱葱，桂花竞相绽放，馥郁的芬芳弥漫了整个古纱縠巷。让我们在这桂花的芬芳中开启新一次的东坡精神之旅吧！

---

# 蘇軾

2015年第3期（总第42期）

（季刊）

-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 主 编：张志烈
-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 责任编辑：刘清泉
- 编 辑：袁 丁
-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 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年9月

## 研究 SUSHI YANJIU



## 目 录

### □苏学论坛

- 苏东坡的花木情怀（三） 王影聪 / 4
- 试论苏轼贬逐期间的文化回归 郑秉谦/12
- 北宋密州的灾荒与官方应对 古 帅 乔云峰/18  
——基于苏轼知密州时期的考察
- 从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看北宋海外贸易法令的问题
- 基于新旧史料的探索 彭林泉/23
- 再议苏轼葬郊探因 乔建功/28
- 苏东坡与荆楚民歌的情缘和嬗变 饶学刚/30
- 宋代赣南的橘与茶 李云彪/33
- 苏迈安葬在宿州萧县的缘由考辨 王龙海/36
- 苏轼省略成语浅谈 向加富/39
- “文传墨迹留碑上，山列青屏入座中” 徐培富/44
- 我参与苏轼行踪考的原委 李常生/51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

役法之争  
苏洵求官心路浅探

赖正和/54  
有 愚/61

## □研究史话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三) [韩] 洪瑀钦/74

## □诗文鉴赏

《后杞菊赋》主旨别解 饶学刚/66

## □苏学专家

守望眉山的草野学者孙开中 伍成艳/76

## □新书评介

《且行——苏祠外仰视》序二 方永江/68  
《探秘苏东坡》后记 刘 寅/70

## □景苏札记

游苏辙公园 刘清泉/78

## □本期关注

穿越千年，对话东坡 张 玉 肖 倩/71  
品读三苏文化，推进“文化立市” 熊 莉/72  
——2015年端午沙龙·苏东坡与经典诵读综述

## □苏学动态

眉山举办“苏东坡与经典诵读”端午沙龙 熊 莉/80  
徐州举办首届利国苏轼文化节 谭敦容/80  
苏轼文化登上铸造技术高端论坛 谭敦容/80

# 苏东坡的花木情怀（三）

王影聪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苏东坡吟咏竹、梅花、松、荷花、牡丹、橘橙、兰花、柳桃梨李等诗文为例，分类分析、揭示苏东坡的花木情怀和独特风韵。

**关键词** 苏东坡 花木 情怀

## 八、咏柳桃梨李赞百花春色抒怀

苏东坡喜吟花木，多达数十种。在他的诗词中，吟咏柳桃梨李不少，还有桑、石榴、杨花等等。不过咏柳是其中较多的。早在他乘船出家乡时，有一首《夜泊牛口》诗中就有：“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sup>(1) 4</sup>的诗句，只不过是一种实景实情。此后的苏东坡不时在诗中吟咏，如“扰扰下笑柳与蒲”、“岁岁阅榆柳”、“去年新柳报春回”、“柳生两肘鸟巢肩”、“新蒲出水柳映洲”、“溪柳自摇沙水清”、“苔溪杨柳初飞絮”、“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帘前柳絮惊春晚”、“却作漫天柳絮飞”、“春来杨柳不胜垂”、“垂柳阴阴昼掩扉”、“柳色日夜暗”、“共醉榆柳村”、“蹙踏飞波柳阴下”、“一川秀色明花柳”、“落月挂柳看悬蛛”、“已惊弱柳万丝垂”、“起寻花柳村村同”、“不知江柳已摇村”、“垂柳阴阴日初永”、“雪后独来栽柳处”、“我记江边枯柳树”、“大肪何时系门柳”、“牛衣古柳卖黄瓜”、“阴阴垂柳雁行斜”、“野梅官柳西郊路”、“武昌官柳知谁载”、“高柳鸣蜩午更喧”、“野梅官柳渐鼓斜”、“长恨漫天柳絮轻”、“为问何如插杨柳”、“杨柳方婀娜”、“柳花著水万浮萍”、“落花飞絮满衣襟”、“未应愚谷能留柳”，等等。在不少词中也有“江柳微黄”、“柳含烟翠”、“淡烟疏柳”等咏吟。还专门有《洞仙歌·咏柳》：

江南腊尽，早梅花开后。分付新春与垂柳。  
细腰肢、自有入格风流。仍更是、骨体清英雅秀。  
永丰坊那畔，尽日无人，惟见金丝弄晴昼。  
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  
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

一点春皱。<sup>(1) 1159</sup>

这是他的专咏柳词作，还有两首，然而，苏东坡的两首词中，对咏柳抒怀可谓真情意切韵浓。其一，他作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一词中，说超然，以咏柳开篇，风格独特：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sup>(1) 67</sup>

再有一首《蝶恋花》词，也是包括柳枝在内的陪衬的咏吟而抒怀的：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sup>(1) 1161</sup>

不仅如此，苏东坡爱咏桃，他咏吟桃花、野桃、桃李等的诗句不少。“桃花流水先秦人”、“上苑夭桃自作行”、“戴公山下野桃香”、“小桃破萼未胜春”、“桃花流水鳜鱼肥”、“不种夭桃与绿杨”、“佳人如桃李”、“积雪困桃李”、“桃花纵落谁见，水到人间伏流”、“天教桃李作舆台”、“桃李漫山总粗俗”、“飞囊要欲先桃李”、“春水漾桃花”、“认桃无绿叶”、“桃花流水在人世”、“野桃含笑竹篱短”、“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等。他早年在凤翔任签判时，专咏桃花五言诗一首：

争开不待叶，密缀欲无条。  
傍沼人窥鉴，惊鱼水溅桥。<sup>(1) 67</sup>

晚年的苏东坡又写过一首《次韵正辅表兄江行见桃花》诗一首。而且这首五言诗很长，有28句：

曲士赋《怀沙》，草木伤莽莽。  
德人无荆棘，坐失岭峤阻。  
我兄瑚琏姿，流落瘴江浦。  
净眼见桃花，纷纷堕红雨。  
萧然振衣袂，笑问散花女。  
我观解语花，粉色如黄土。  
一言破千偈，况尔初不语。  
可怜一转话，他日如何举。

故复此微吟，聊和鷓鴣櫓。  
江边闲草木，闲客当为主。  
尔来子美瘦，正坐作诗苦。  
袖手焚笔砚，清篇真漫与。  
愿兄理北辕，六轡去如组。  
上林桃花开，水暖鴻北翥。<sup>(1) 977~978</sup>

上述专咏桃花诗，大多被后世苏东坡诗选编者所省略，其实这两首桃花诗均表达了诗人对故友、对自己人生的感悟，充满了东坡情感韵味。当然，他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的：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鴻先知。  
萎蒿满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sup>(1) 666</sup>

据说这是一首题画诗。僧人惠崇有春江晚景画两张，请东坡题诗存念。而苏东坡故意给惠崇开个玩笑。说是要他请客喝酒后再题。喝酒没问题，可菜呢？僧人不杀生不吃肉食，而苏东坡不管，并提出一定是美味佳肴。人们都知道，苏东坡饮食有三个“最爱”，即最爱食刀鱼、鮰鱼、河豚。当时没有刀鱼、鮰鱼，却有河豚，便请苏东坡品了河豚，酒足饭饱，苏东坡题了两首诗，其中上述“竹外桃花三两枝”一诗，成了千古传世之作，这自然也就淹没了他的其他桃花诗了！

在苏东坡眼中的梨和李，也是占春光的好题材，他咏梨的诗《梨》：“霜降红梨熟，柔柯已不胜。未尝蠲夏渴，长见助春冰”。<sup>(1) 67</sup>他还有一首《占春芳》词，是吟颂梨花的，其词：

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不比人间  
兰麝，自然透骨生香。对酒莫相忘。似佳  
人、兼合明光。只忧长笛吹花落，除是宁王。<sup>(1)  
1179</sup>

他的咏梨花诗，吟梨思亲人，后一词吟咏梨花以寄友。在他的眼中，梨花不论是花还是果，都寄托着一种亲情、友情，“欲看梨花枝上雨”、“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梨花淡白柳深青”。因为中国文人对于“梨”的谐音，就是一个“离”、“离别”之意，所以对于性情中人的苏东坡，目睹这一植物花果，总会怀念亲朋故友，总以咏吟以寄情怀。他曾用梅艺术品格“不与梨花同梦”以颂朝云，以示与爱妾永远心心相印，以寄爱情，这也是苏东坡咏梨花之情怀。

同样，苏东坡咏李子、李花，也颇有意韵。他的咏《李》诗：

不及梨英软，应慚梅萼红。  
西园有千叶，淡伫更纤秾。<sup>(1) 67</sup>

千年来，咏李花的诗甚少，即使唐代也仅一首《咏李》，系唐代董思恭的“盘根植瀛渚，交干横倚天。舒华光四海，卷叶荫山川。”所以，苏东坡的咏《李》诗也是千家诗中的凤毛麟角了。一般诗人把桃李同咏的多，苏东坡也如此，因为二花一红一

白，竞相绽放，同占春光，正所谓“桃李满天下”，如“桃李忽成阴，荞麦秀已繁”、“池台半禾黍，桃李余榛菅”、“故山桃李半荒榛，粗报君恩便乞身”、“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琪树罗玄圃。累累似桃李”、“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百舌无言桃李尽，拓林深处鹁鸪鸣”、“他年桃李阿谁栽”、“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桃李溪边驻画轮，鷄鳩声里倒清樽”、“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游客醉”、“深深庭院清明过，桃李初红破”、“又岂料、正好三春桃李，一夜风霜”等等。

春天是百花盛开的时节，苏东坡见到百花盛开，诗情涌心头，脱口吟咏之，咏吟不少好诗句：

他咏杏，就有专门的咏《杏》诗：

开花送余寒，结子及新火。  
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sup>(1) 67</sup>

而在诗词中咏杏（以及与其它植物花卉一起吟咏）的诗句更是令人回味，“春深桃杏乱”、“一色杏花三十里”、“小桃杏、应已争先”、“故作小红桃杏色”、“杏花风、数里响鸣鞭”，还专门写有《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一首：“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sup>(1) 448</sup>

在苏东坡的一些词里，都在用吟咏杏打头，以报春。如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另一首《蝶恋花》有“杏子梢头香蕾破”；在《雨中花慢》中也吟“一株红杏，斜倚低墙”；在《点绛唇》中吟杏“红杏飘香，柳含烟翠拖轻缕”；在《占春芳》中开始便吟“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在《浪淘沙》词中又吟“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据不少学人探究，这是苏东坡由诗吟转为词咏的最早篇章，也许就是杏对他的启迪。不仅如此，对于杏，苏东坡有长诗一首以咏怀。这就是《三月二十日多叶杏盛开》，这是苏东坡在仕途上最后一个知州任上——定州太守时吟咏的长诗。诗中以咏杏抒情怀，自26岁从政踏上仕途后，屡受挫折，隐退、回归家乡的情怀与日俱增，似乎苏东坡预感又将面临新的打击贬谪。所以，在元祐九年三月二十日见定州多叶杏花盛开，触景生情，发思古之幽情，以刘郎（刘禹锡）自喻，表现出隐退回乡的心情。时过不久，他便贬知英州，后又再贬惠州安置，最后贬至海南儋州。所以，这首咏杏诗是他人生转折的一个标志性长诗，不妨录之于下：

零露泫月蕊，温风散晴葩。  
春工了不睡，连夜开此花。  
芳心谁剪刻，天质自清华。  
恼客香有无，弄妆影横斜。  
中山古战国，杀气浮高牙。

丛台余袵服，易水雄悲笳。  
自从此花开，玉肌洗尘沙。  
坐令游侠窟，化作温柔家。  
我老念江海，不饮空咨嗟。  
刘郎归何日，红桃烁残霞。  
明年花开时，举酒望三巴。<sup>(1) 943</sup>

读该诗以小见大，借咏杏花抚今追昔，波澜迭起，雄奇悲壮，用典巧妙得当，气脉畅顺开阔，给人行云流水、荡气回肠之感。

苏东坡咏春夏秋冬的花果树木还有许多，虽不能提及覆盖全部，但仍可举出不少。如花卉中有杨花、杜鹃、山茶、桂花等等；果子有枣、樱桃、石榴、葡萄、枇杷、荔枝、龙眼等等。在这里，我们先说花，后叙果。补充其它。

苏东坡咏杨花的诗词有不少名篇佳句，著名的是《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里去，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sup>(1) 1148</sup>

这首杨花词堪称绝妙之作，词中写花吟花，花中见人，人中有己，己抒情韵，形象生动，变化多姿，感兴幽长，余味谐婉。古人称之为咏花词中压倒古今之作。王国维评价：“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苏东坡还有吟杨花佳句。他的另一词作《少年游·润州作》“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sup>(1) 1155~1156</sup>

再有他的《减字木兰花·乙卯儋耳春词》中吟咏“……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sup>(1) 1170</sup>

在《南歌子》中又吟了：“……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sup>(1) 1179</sup>

还有与弟子由诗中吟咏：“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还与友人金门寺中吟诗中咏杨花喻雪飘：“已应知雪似杨花”等等。

苏东坡咏杜鹃花也颇有韵意。在《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一诗中吟：

南漪杜鹃天下无，披香殿上红氍毹。  
鹤林兵火真一梦，不归阆苑归西湖。<sup>(1) 796</sup>

在他的词作《竹枝词》中也吟杜鹃：

自过鬼门关外天，命同人鲊瓮头船。  
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嶂无梯闻杜鹃。<sup>(2) 600</sup>

苏东坡品咏山茶花甚是绝妙，他在《邵伯梵行寺山茶》一诗中吟：

山茶相对阿谁裁，细雨无人我独来。  
说似与君君不会，灿红如火雪中开。<sup>(1) 614</sup>

他还在《山茶》诗中专咏：

萧萧南山松，黄叶陨劲风。  
谁怜儿女花，散火冰雪中。  
能传岁寒姿，古来惟丘翁。  
赵叟得其妙，一洗胶粉空。  
掌中调丹砂，染此鹤顶红。  
何须夸落墨，独赏江南工。<sup>(1) 636</sup>

苏东坡还有一首仍以《山茶》同名诗咏山茶花：游蜂掠尽粉丝黄，落蕊犹收蜜露香。<sup>(1) 1098</sup>

待得春风几枝在，年来杀菽有飞霜。

同一山茶花，苏东坡的吟咏风韵各异，他的眼中、心中和情景中对山茶的观察和描绘中，抒发了他不同的情怀喻意。

苏东坡也咏吟桂花。在他老家中，母亲程夫人喜种花木，五亩园中就有母亲种下的丹桂、黄荆至今犹存，充满生机。苏东坡吟咏桂花以寄赠亲友。他在杭州任通判时，将天竺寺僧人赠给他的桂花分赠给乡友、杭州太守杨绘（杨绘，字元素，四川绵竹人，时任杭州太守），以咏桂花芬芳，赞扬乡友太守为人正直，品行高洁。该诗题为《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赠元素》：

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玉堂仙。  
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  
破械山僧怜耿介，练裙溪女斗清妍。  
愿公采撷纫幽佩，莫遣孤芳老涧边。<sup>(1) 278</sup>

杭州西湖一带，僧人喜种桂花树，千年传承，中秋前后，西湖至钱塘六和塔，丹桂飘香，尽赏桂香。苏东坡见此状，也是在八月十七日，还咏诗记之，其中就有咏桂花、赏桂花的场景：

天台桂子为谁香，倦听空阶点夜凉。  
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sup>(1) 185</sup>

他还时不时吟咏桂花：“幽桂日夜长，白花乱青衿”，“野竹爆哀声，幽桂飘冤芬”，“野麋驯杖履，幽桂出榛莽”、“古意已将兰緝佩，招词闲咏桂生丛”，“归路相将踏桂华”，等等。

苏东坡咏吟抒怀的花卉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再品点以下：

他吟芍药櫻桃花：

芍药櫻花两斗新。名园高会送芳辰。洛阳初夏广陵春。  
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浓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sup>(1) 1174</sup>

他吟月季花诗《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

幽芳本长春，暂瘁如蚀月。  
且当付造物，未易料枯朽。  
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笋苗。  
乘时出婉娩，为我暖栗冽。  
先生早贵重，庙论推英拔。  
而今城东瓜，不记召南葵。  
陋居有远寄，小圃无闊蹑。  
还为久处计，坐待行年匝。

腊果缀梅枝，春杯浮竹叶。  
谁言一萌动，已觉万木活。  
聊将玉蕊新，插向纶巾折。<sup>(1) 1052~1053</sup>

他咏过《芙蓉城》及芙蓉花。芙蓉花也称之为拒霜花。他的《和陈述古拒霜花》便是佳作：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sup>(1) 186</sup>

在《芙蓉城》这首长诗中也有“芙蓉城中花冥冥，谁其主者石与丁。珠帘玉案翡翠屏，霞舒云卷千娉婷……”<sup>(1) 390</sup>

他品瑞香花时有与年长43岁的刁景纯前辈在一起的和诗，时年刁老80岁，苏东坡37岁，题为《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

上苑夭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时宫花识旧香。  
欲赠佳人非泛洧，好纫幽佩吊沉湘。

鹤林神女无消息，为问何年返帝乡。<sup>(1) 261</sup>

苏东坡吟枣花有名的是《浣溪沙五首》之一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sup>(1) 1172</sup>

苏东坡还咏槐花：  
瞳瞳日脚晓犹清，细细槐花暖欲零。  
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sup>(1) 713</sup>

他还咏过“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的诗句。

苏东坡在黄州游武昌（今鄂州市），写有《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长诗，以咏酴醿花：

酴醿不争春，寂寞开最晚。  
青蛟走玉骨，羽盖蒙珠幙。  
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  
凄凉吴宫阙，红粉埋故苑。  
至今微月夜，笙箫来翠巘。  
余妍入此花，千载尚清婉。  
怪君呼不归，定为花所挽。  
昨宵雷雨恶，花尽君应返。<sup>(1) 503~504</sup>

他还吟咏紫薇花《次韵钱穆父紫薇花二首》：

其一：  
虚白堂前合抱花，秋风落叶照横斜。  
阅人此地知多少，物化天涯生有涯。

其二：  
折得芳蕤两眼花，题诗相报字倾斜。  
筐中尚有丝纶句，坐觉天光照海涯。<sup>(1) 804</sup>

苏东坡石榴花的诗：  
风流意不尽，独自送残芳。  
色作裙腰染，名随酒盏狂。<sup>(1) 68</sup>

还有吟咏石榴花的“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可怜病石榴，花如破红襟”。苏东坡还

有《和子由记园中草木一种》诗中吟咏：“牵牛与葵蓼，采摘入诗卷”，“葵花虽粲粲，蒂浅不胜簪。从蓼晚可喜，轻红随秋深”，“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等等。<sup>(1) 95~98</sup>

此外，苏东坡咏芦花芦苇，他有专咏《芦》诗一首：“芦笋初似竹，稍开叶如蒲。方春节抱甲，渐老根生须。不爱当夏绿，爱此及秋枯。黄叶倒风雨，白花摇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双野鸭，飞来成画图。”他还吟道：“柳堤苇岸连云际”，“芦花萧瑟”，“枫叶芦花秋兴长”等。

他还咏过稻花，是一首六言诗：

陂水初含晓渌，稻花半作秋香。  
皂盖却迎朝日，红云正绕宫墙。<sup>(1) 686</sup>

苏东坡还有一首咏杂花诗，诗中含有不同色彩的花卉：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sup>(1) 973</sup>

苏东坡还咏了一首“扶桑花”的诗：  
扶桑初日映帘升，已觉铜瓶暖不冰。  
七种共挑人日菜，千枝先剪上元灯。<sup>(1) 1133</sup>

苏东坡还有在常州咏菖蒲诗：“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六花菖蒲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在广州也咏菖蒲：“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菖蒲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sup>(1) 961</sup>上述诗中的菖蒲实际就是当今人们所称的梔子花。在西域（今中亚）人们称梔子花为菖蒲。

苏东坡还吟水仙及水仙王。他脱口即出：“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sup>(1) 640</sup>“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sup>(1) 209~210</sup>在《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词咏：“写取余声归向，水仙夸”，“蕙本兰之族，依然臭味同。曾为水仙佩，相识《楚辞》中。”

## 九、吟咏果实，丰富多彩、百味万千

首先，苏东坡咏橙子、柑橘是不少的，他诗吟“卢橘是乡人”，因为他是四川眉山人。这里至今都是橙子、橘子的产地，至今有“中国脐橙之乡”、“中国椪柑之乡”、“中国不知火（一种桔橙）之乡”等美誉。所以，苏东坡对橙黄橘绿格外有情。他的名篇《赠刘景文》写的就是这个果实之季：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sup>(1) 807</sup>

苏东坡还有咏橘的词《浣溪沙》，同题材同韵，可见其对橘的厚爱。并且有《楚颂帖》，实际上咏写

的是橘。而还有一首不为人看重的咏柑的诗《戏答王都尉传柑》：

侍史传柑玉座傍，人间草木尽天浆。  
寄与维摩三十颗，不知薔薇是余香。<sup>(1) 912</sup>

苏东坡还有一首吃黄柑（橙子）的诗，名曰《食柑》：“一双罗帕未分珍，林下先尝愧逐臣。露叶霜枝剪寒碧，金盘玉指破芳辛。……”<sup>(1) 552</sup>还有“朱柑绿橘半甜时”，“金橙纵复里人知”。

他的《浣溪沙·咏橘》这两首词又是另一番韵味：

第一首：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芭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sup>(1) 1172</sup>

第二首：

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木奴何处避雌黄。  
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含滋嚼句齿牙香。<sup>(1) 1176</sup>

苏东坡不仅咏桃花，也咏果实，不仅如此，还包括咏蟠桃。他吟道：“欲采蟠桃归献寿，蓬莱清浅半桑田”<sup>(1) 1138</sup>，“凛凛重瞳日月新，四方惊喜识天人。共知若木初升旦，且种蟠桃莫计春。”<sup>(1) 1140</sup>

他还把桃杏等合咏：“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故作小红桃杏色”，“红杏碧桃香覆髻”，“上苑夭桃自作行”，“戴公山下野桃香”，“野桃含笑竹篱短”，“红桃炼残霞”等等。

苏东坡咏杏、李、梨等水果是有专门诗篇的，请品鉴以下的几首：

他品《李》：

不及梨英软，应惭梅萼红。  
西园有千叶，淡伫更纤秾。<sup>(1) 67</sup>

他品《杏》诗吟道：

开花送余寒，结子及新火。  
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sup>(1) 67</sup>

他品《梨》诗咏：

霜降红梨熟，柔柯已不胜。  
未尝蠲夏渴，长见助春冰。<sup>(1) 67</sup>

他品《枣》诗咏：

居人几番老，枣树未成槎。  
汝长才堪轴，吾归已及瓜。<sup>(1) 68</sup>

苏东坡还有吟咏樱桃的佳句：“一颗樱桃樊素口”，“柳老樱桃过”，“樱桃落晚风”，“麦老樱桃熟”，“芍药樱桃俱扫地”等等。

他咏《石榴》：

风流意不尽，独自送残芳。  
色作裙腰染，名随酒盏狂。<sup>(1) 68</sup>

还有“石榴半吐红巾蹙”、“裙带石榴红”、“石榴新蕊”等。

苏东坡还咏有枇杷诗，“枇杷已熟粲金珠，桑

落初尝滟玉蛆”，他在与好友刘景文在杭州时，同住一座寺院赏花，写了《真觉院有洛花，花时不暇往。四月十八日，与刘景文同往赏枇杷》：

绿暗初迎夏，红残不及春。  
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  
井落依山尽，岩崖发兴新。  
岁寒君记取，松雪看苍鳞。<sup>(1) 793</sup>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有一首《访詹使君食槐芽》咏枇杷：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  
暂借垂莲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sup>(2) 564</sup>

苏东坡也咏葡萄。他的名句：“东风吹开锦绣谷，绿水翻动葡萄酒。”，很妙。（在宋代葡萄也写作为“蒲萄”。）

他吟咏：

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  
恨无襄阳儿，令唱《铜鞮曲》。<sup>(1) 126</sup>

他还有词《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南乡子·春情》也咏葡萄。

苏东坡也吟咏杨梅这一不值钱的水果。他写的《参寥惠杨梅》一诗挺有意思：

新居未换一根椽，只有杨梅不值钱。  
莫共金家斗甘苦，参寥不是老婆禅。<sup>(2) 588</sup>

此外，他在《惠州一绝》诗中也吟“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sup>(2) 580</sup>

苏东坡也咏地柿：

柿叶满庭红颗秋，薰炉沉水度春篝。  
松风梦与故人过，自驾飞鸿跨九州。<sup>(2) 596</sup>

不过，苏东坡咏吟较多的水果中，荔枝是较丰富的。

他在杭州太守任上就写诗《寄蔡子华》而在怀乡之情感中是以咏荔枝（荔子）以抒怀的：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sup>(1) 784</sup>

此后他与《次韵曾仲锡承议食蜜生荔枝》，不久他又以上诗韵再写《再次韵会仲锡荔枝》：

柳花著水万浮萍，荔实周天两岁星。<sup>(1) 928~929</sup>

可见苏东坡对朋友的情怀和对荔枝的喜爱。不久他又尝到蜜渍荔枝，再咏《次韵刘焘扶匀蜜渍荔枝》诗：

时新满座闻名字，别久何人记色香。  
叶似杨梅蒸雾雨，花如卢橘傲风霜。  
每怜莼菜下盐豉，肯与葡萄压酒浆。<sup>(1) 937</sup>

回首惊尘卷飞雪，诗情真合与君尝。

在这时，苏东坡品尝到的不是鲜荔枝，而是相当于“果脯”，他品尝后吟诗想象中的鲜荔枝。他在《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诗中吟他梦中的鲜荔枝：

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

朝来闻好语，扣户得吴钩。

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  
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  
故人情义重，说我必西向。……<sup>(1) 523</sup>

后来，苏东坡再贬惠州时，才真正品尝到荔枝的鲜果味，见到了鲜果荔枝的品韵，兴奋不已，写下了好几首品味荔枝的诗篇，并称为“惠州一绝”。在此前，他南迁到广东清远时还写《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还吟“江云漠漠桂花湿，梅雨翛翛荔子然。”<sup>(1) 960</sup>仍是想象中的果子。到惠州后他初尝鲜荔枝后，欣然写下《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诗。而且是20句的七言长诗。不久，苏东坡又写长诗《荔枝叹》。

此后，苏东坡应邀到惠州太守东堂，又品到荔枝，即兴又写下《食荔支二首》诗篇，其中第二首也称之为“惠州一绝”：

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

其一：

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  
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  
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  
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

其二：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外，苏东坡在惠州咏：“栖禅晚置酒，蛮果粲蕉荔。”他还有一词《减字木兰花·荔支》：

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酿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是当年十八娘。<sup>(1) 1169</sup>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比较龙眼这种“亚荔枝”的水果，他写了首《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支》诗：

龙眼与荔支，异出同父祖，  
端如甘与橘，未易相可否。  
异哉西海滨，琪树罗玄圃。  
累累似桃李，一一流膏乳。  
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  
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  
独使皮生皴，弄色映雕俎。  
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sup>(1) 1088</sup>

苏东坡为荔枝、龙眼写过两篇专文，一是《荔枝似江瑶柱说》，二是《荔枝龙眼说》都充满了辩证法。如第一篇文章：“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第二篇文章：“闽越人高荔子而下龙

眼，吾为评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饱。龙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啮久之，了无所得。然酒阑口爽，餍饱之余，则咂啄之味，石蟹有时胜蝤蛑也。戏书此纸，为饮流一笑。”<sup>(1) 3404</sup>

苏东坡在这两篇文章说，荔枝和龙眼，各有千秋，各有品味，各有所长，不能简单类比。属于仁者见仁，各有千秋。

苏东坡在吃过橄榄后再咏了一首《橄榄》诗：  
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  
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sup>(1) 565</sup>

苏东坡还有两首咏《槟榔》的诗。其一《咏槟榔》：

异味谁栽向海滨，亭亭直干乱枝分。  
开花树杪翻青箨，结子苞中皱锦纹。  
可疗饥怀香自吐，能消瘴疠暖如薰。  
堆盘何物堪为偶，萎叶清新卷翠云。<sup>(3) 146</sup>

还有一首《食槟榔》则是五言长诗：

月照无枝林，夜栋立万础。  
眇眇云间扇，荫此八月暑。  
上有垂房子，下绕绛刺御。  
风欺紫凤卵，雨暗苍龙乳。  
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  
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  
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  
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  
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sup>(1) 1002</sup>

他还有“想见橘柚垂空庭”、“煮茗烧栗宜宵征”，即咏柚、咏栗等。

苏东坡甚至吃了甘蔗也咏诗，他咏“老境安闲如啖蔗”、“溜溜小槽如压蔗”。《甘蔗》七言诗：  
老境于吾渐不佳，一生拗性旧秋崖。  
笑人煮筭何时熟，生啖青青竹一排。<sup>(3) 226</sup>

## 十、吟咏其它花草树木，千姿百态

他吟咏中有树木，如槐、桧、楸等木；也有各类芳草，还咏石、屋、阁、堂、寺庙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仅摘其佳句：

他在26岁时，在凤翔任签判时，在《次韵子由岐下诗》中写咏过三十多种花木，除已前面叙说的之外，还咏樗、槐、桧等。

如《樗》树，他咏道：“自昔为神树，空闻蜩鷋鸣。社公烦见辍，为尔致羊羹。”<sup>(1) 68</sup>

如《槐》诗：“采撷殊未厌，忽然已成阴。蝉鸣看不见，鹤立赴还深。”<sup>(1) 68</sup>

如《桧》诗：“强致南山树，来经渭水滩。生成未有意，鸦鹊莫相干。”<sup>(1) 68</sup>

苏东坡后多次吟咏树，他在北寺，见塔见古桧，即吟《塔前古桧》一首：

当年双桧是双童，相对无言老更恭。  
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雨苍龙。<sup>(1) 193</sup>

在“乌台诗案”后，苏东坡出狱，见御史台的榆树、槐树、竹、古柏后又吟四首。咏榆树诗曰：“我行汴堤上，厌见榆阴绿。千株不盈亩，斩伐同一束。……”咏槐诗“忆我初来时，草木向衰歇。高槐虽惊秋，晚蝉犹抱叶。……”他咏竹：“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他咏柏：“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幽囚无与乐，百日看不已。……”  
<sup>(1) 487</sup>

苏东坡似乎很看重桧树，他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诗中吟：

其一：  
吴王池馆遍重城，闲草幽花不记名。  
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

其二：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sup>(1) 204</sup>

殊不知，正是上述两首咏桧树诗成为“乌台诗案”的重要证据之一。然而，苏东坡仍不改钟爱桧树的性子，后又咏《和赵景贶栽桧》诗：

汝阴多老桧，处处屯苍云。  
地连丹砂井，物化青牛君。  
时有再生枝，还作左纽纹。  
王孙有古意，书室延清芬。  
应怜四孺子，不堕凡木群。  
体备松柏姿，气含芝蕙薰。  
初扶鹤立骨，未出龙缠筋。<sup>(1) 849</sup>

可见，如果再抓他的把柄，这岂不是又会二次“乌台诗案”？不仅在这里咏，他的其它诗句中也有之：“山前乳水隔尘凡，山上仙风舞桧杉”；“请公试回首，岁晚余苍桧”，“三年归来真一梦，桥山松桧凄风霜”，“过淮山渐好，松桧亦苍然”。

苏东坡也咏过楠树、杉树、桐树、楸树等等，他咏楠树有：“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

苏东坡吟杉：“珠桧丝杉冷欲霜”、“似闻梨枣同时种，应与杉篁刻日添”、“共爱丝杉翠丝乱”等。

苏东坡吟楸树：  
楸树高花欲插天，暖风迟日共茫然。  
落英满地君方见，惆怅春光又一年。<sup>(2) 590</sup>

他在海南也吟过“仰看桄榔树”和“木棉花落刺桐开”，把这几种树一并记在了咏吟诗句中。

苏东坡还吟咏桑树：“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以光”，“我亦来寻桑枣村”，“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万树桑柘美”，“枣林桑泊负春游”。

苏东坡咏梧桐：“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至今多梧桐，合抱

如彭聃”、“露冷梧叶脱，孤眠无安枝”，“满阶桐叶候虫吟”，“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卧闻疏响梧桐雨”，“桐柏烟横半山紫”，“梧桐叶上三更雨”，“尘渍雨桐叶，霜飞风柳条”。

他还咏枫树、红叶、棕笋等，他咏吟枫树枫叶：“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枫叶萧萧桂叶碧，万里远来超莫及”，“岁晚杉枫尽，人归雾雨愁”，“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苏东坡咏红叶：“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忆”，“别来红叶黄花秋，夜梦见之起坐愁”。还有黄花吟：“手弄黄花蝶透衣”、“纤纤入麦黄花乱”、“明日黄花蝶也愁”等。

苏东坡咏棕笋，写下了《棕笋》是元祐六年他在京城或颍州所作。这棕笋在《本草》也叫棕榈、棕鱼。苏东坡在《棕笋》中写道：

棕笋，状如鱼，剖之得鱼子，味如苦笋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其贵之，而南方不知也。笋生肤毳中，盖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间，可剥取，过此，苦涩不可食矣。取之无害于木，而宜于饮食，法当蒸熟，所施略与笋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饷殊长老。  
赠君木鱼三百尾，中有鹅黄子鱼子。  
夜叉剖癰欲分甘，箨龙藏头敢言美。  
愿随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  
问君何事食木鱼，烹不能鸣固其理。<sup>(1) 823~824</sup>

苏东坡咏过：石芝、杜若、荆棘、女贞、菱黄等。他在《石芝》中咏写：

予尝梦食石芝，作诗记之。……追记其事，复次前韵。

土中一掌婴儿新，爪指良是肌骨匀。  
见之怖走谁敢食，天赐我尔不及宾。  
旌阳、远游同一许，长史、玉斧皆门户。  
我家韦布三百年，只有阴功不知数。  
跪陈八簋加六瑚，化人视之真块苏。  
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噉雕胡。  
老蚕作茧何时脱，梦想至人空激烈。  
古来大药不可求，真契当如磁石铁。<sup>(1) 931~932</sup>

这石芝实为珊瑚中的一种，是较为稀少的。而苏东坡咏的杜若，即山姜则较多。他把木兰与山姜同诗咏道：

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  
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sup>(1) 167</sup>

他也吟荆棘这种野生带刺的植物：“黄门寡好心易足，荆棘不生梨枣熟”。还咏女贞，他称之为将军树：

阿坚泽畔荪蒲节，玄德墙头羽葆桑。  
不会世间闲草木，与人何事管兴亡。<sup>(1) 238</sup>

苏东坡咏菱芡有时合咏，有时又单独咏：

乌菱白芡不论钱，乱击青菰裹绿盘。  
忽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sup>(1) 167</sup>

然而，苏东坡在单独咏菱时，又是一番雅趣，用了七个“采菱拾翠”以吟咏。他的词《皂罗髻·采菱拾翠》很有韵味：

采菱拾翠，算似此佳名，阿谁消得。采菱拾翠，称使君知客。千金买、采菱拾翠，更罗裙、满把珍珠结。采菱拾翠，正髻鬟初合。真个、采菱拾翠，但深怜轻拍，一双手、采菱拾翠，绣衾下、抱著俱香滑。采菱拾翠，待到京寻覓。<sup>(1) 1175</sup>

苏东坡还咏过枸杞、躑躅（小石榴）。他咏枸杞“荒城古堑草露寒，碧叶丛低红菽粟。春根夏苗秋著子，尽付天随耻充腹。”“枫林翠壁楚江边，躑躅千层不忍看。开卷例知归路近，剑南樵叟为施丹。”他还吟咏桔梗：“鸡壅桔梗一称帝，堇也虽尊等臣仆。时复论功不汝遗，异时谨事东篱菊。”<sup>(1) 1096~1097</sup>

苏东坡还咏蕉、咏麻、咏萱草、咏牵牛以及桄榔等。

他咏蕉：“栖禅晚置酒，蛮果粲蕉荔”，“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綈罗轻”；他咏麻：“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他还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咏了“萱草”，“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劳心插。”咏“牵牛”，“牵牛独何畏，诘曲自牙蘖。走寻荆与榛，如有夙昔约。”咏“芦笋”，“芦笋初似竹，稍开叶如蒲。方春节抱甲，渐老根生须。”咏“丛簪”，“种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种丛簪，春种秋可倒。”还有“牵牛与葵蓼”、“艺兰那计畹”、“时节看瓜蔓”、“从蓼晚可喜”、“君看藜与藿”、“秋瓜感霜霰”、“白芷来江南”、“菖蒲人不识”、“秋风咏江蓠”等，一咏 10 多种花木植物。包括川芎（芎劳）、白芷、苜蓿、蓠通等。

苏东坡在惠州谪居时，还咏过他居所旁的桄榔树：“独倚桄榔树，闲挑萃拔根。”“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鬢鬢。”<sup>(1) 966, 967, 972</sup>

苏东坡还咏过垂云昆、娑罗树。犹为娑罗树：“谁以五竺国，分来一枝来。秀出重楼外，专除世上埃。”<sup>(3) 231</sup>

他还咏吟芳草，“我欲仙掇瑶草”自比仙翁。在苏东坡的词里用得较多：“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无寻处，梦回芳草生春浦”，“惟有落花芳草、断人肠”，“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一霎暖风回芳草”、“楼上望春归云，芳草迷归路”，“行人肠断草凄迷”，“春事阑珊芳草歇”，“酒阑清梦觉，青草满池塘”，“层巅余落日，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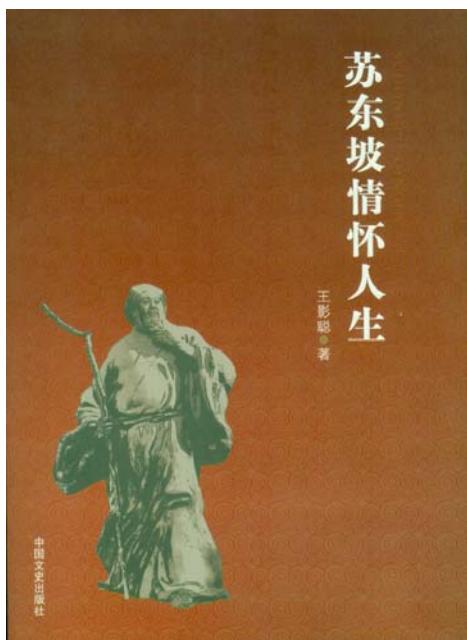
露已沾衣”，“我欲醉眠芳草”，“但有绿苔芳草”，“天涯何处无芳草”……<sup>(1) 1151~1180</sup>

这就是热爱生活，热爱花草树木的苏东坡的情怀，真真切切地叫做“一草一木总关情”。

### 注释

- [1] 苏轼著：《苏东坡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 [2] 苏轼著：《苏东坡全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 [3] 孙书安著：《咏花诗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影聪，眉山市政协主席、市文联主席、市作协主席）



书名：苏东坡情怀人生  
作者：王影聪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年版  
开本：787mm×1092mm 1/16  
页数：388 页  
定价：58.00 元

# 试论苏轼贬逐期间的文化回归

郑秉谦

**内容提要** 苏轼无论在仕宦顺利期或贬逐期，都积极从事文化活动。其中贬逐期间，他更发挥他的文化天性，加强他的文化自觉，加固他的文化自信，这可视为他对文化的回归。这对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师，起了巨大作用，本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他这一时期的文化回归。

**关键词** 苏轼 贬逐 文化回归

苏轼是个文化气息特浓的人，仕途顺利时如此，贬谪期间也如此。只不过贬谪期间，他更集中时间、集中心思缔造他的文化成就而已。这不是灵机一动，更不是偶然得之，而是在贬谪期间，发挥文化天性、加强文化自觉、加固文化自信的结果。这可说是苏轼于从政途上对文化的回归。现在分而论之。

## 顺延文化天性

苏轼从小爱读书写字、吟诗作文，在贬谪期，他更发挥了这种天性。他在这一时期，更爱读书，可说是手不释卷。“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他从州里借来的当值的“白直”（侍候的老兵），也跟着不能睡，以至其中一人以赋中一语“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痛苦。东坡后来听说了，说：“这汉子也有鉴识！”

（《道山清话》）<sup>(1) 77</sup> 据另一种笔记《耆旧续闻》<sup>(1) 77</sup>说，他对《汉书》不仅读过三遍，并且抄过三遍，自称“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只要举出其中一字，他就能“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黄冈教授朱载上曾亲见此事，并教育他的儿子：“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耶？”他晚年被贬荒蛮孤

僻的海南岛，自筑“桄榔庵”以居；迁入当晚，闻邻舍儿童读书，高兴得专为这未见面的孩子写了一首诗，甚至说这邻舍书声“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迁居之夕，闻邻舍儿童诵书……》）<sup>(2) 2313</sup>。跟随他南贬的幼子苏过（其时已廿多岁），一向喜欢读书。元符三年清明日，也被苏轼写入诗中：“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同时还回忆自己读书往事：“却去四十年，玉颜如汝今”，“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和陶郭主簿二首·二》）<sup>(2) 2351</sup>

他自小爱作诗。古以为“诗能穷人”，可是 he 却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穷达。云能穷人者固谬，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答陈师仲主簿书》）<sup>(3) 1428</sup> 他是因“诗案”而首次被贬的，在黄州曾陷入矛盾，是继续作诗好，还是干脆停笔好？但不作则违拗自己的性情，作则怕再次闯祸。连卖药西市的郭遘都同情他的“两难”，而通过紫姑神的“书灰”（扶乩的一种），告诉他诗还是要写，“但不要及新法更得也。”（《孔氏谈苑》）<sup>(1) 83</sup> 到他离黄北上途中，曾谈到在黄曾戒诗不作或少作，此时开了戒，得到极大快感。“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今来复稍稍，快痒如爬疥。”（《孙莘老寄墨四首·四》）<sup>(2) 1322</sup> 晚年南贬，子由因自二品宰执直落到八品小官，反差极大，不免心生畏惧，力戒他不要作诗。但广南东路提刑、表兄程之才却极爱他的诗，常向他索诗。这使他处于极度矛盾中，便给程回信说：“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有说，不欲详言。）其言甚切，不可不遵用。”（《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二十一》）<sup>(3) 1597</sup> “见劝作诗，本亦无固必，自懒作尔。如此候虫时鸣，自鸣而已，何所损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五十四》）<sup>(3) 1597</sup> 他这是兜着圈子说话，兜过去又兜过来；而其内心意思仍是诗还是要作的。当然他有时

也会信誓旦旦地说“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答周循州》）<sup>(2) 2151</sup>，但结果还是照作不误。所以子由在为他的“和陶诗”作序时说：“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口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子由《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

<sup>(2)</sup> 1882

但子由所谓“图史文章亦皆罢去”并不属实。东坡在岭表海外，不仅写诗，更也著文、写字、作画、研史、穷经。因为这是他性情所好，若将这些尽皆罢去，他便活不下去了。这些不仅是他贬谪期的生活内容，更是他此时期的生命状态。他正如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陶潜《五柳先生传》）

<sup>(4) 43</sup>他在惠州，还将自己所崇拜的陶潜、传说曾在附近罗浮山修道的葛洪和自己并列，认为可作“三士图”，说自己“学道虽云晚，赋诗岂不如”。他沉溺于赋诗，也对随自己南贬的幼子苏过的诗作欣赏有加。当时有个任都转运使的刘沔，曾默默地收集与编辑他的诗文二十卷，他阅后复信刘沔说：“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废弃笔砚，为瘖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剗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

（《答刘沔都曹书》）<sup>(3) 1430</sup> 正因为他对文学创作，自幼至老，均有热爱、推崇以至敬畏之心，所以他在十多年贬逐生涯中，写出许多杰作。在黄州，有赤壁三词赋，有沙湖薪水求田六词”<sup>(5)</sup>；在惠儋，有清丽哀婉的“朝云诗”<sup>(6)</sup>，有癯而实腴、质而实绮的“和陶诗”，还有比陶诗更陶诗的“仿陶诗”，如黄州的《东坡》、惠州的《纵笔》和儋州的《纵笔三首》、《被酒独行……三首》诸篇。

### 加强文化自觉

正因为苏轼素具文化天性，因此他在三州贬逐期间，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他的文化自觉。古代士大夫在仕途坎坷时，往往以更大的精力自觉地从事文化开发，苏轼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贬逐期间文

化自觉的主要表现，便是构建“孔颜乐趣”。所谓孔颜乐趣，指的是孔子与其徒颜渊等身处贫贱以至危厄，仍然相互尊重、理解、帮助，共同乐观应对贫穷困厄的客观环境。苏轼在仕宦早期曾自称：“轼每读《诗》至《鸱鸺》、读《书》至《君奭》，常窃叹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贵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及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上梅直讲书》）<sup>(3) 1385</sup> 苏轼贬黄后，徐州李昭玘作书求交，他答书云：“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见鄙，欲相从游，岂造物者专欲以此乐相厚耶？”（《答李昭玘书》）<sup>(3) 1439</sup>。他在三州贬谪期，仍同这些文人胜士交往。黄州时期，秦观、李廌未中举，参寥是和尚，都是自由之身，或远道而来，或就近频频相访。米芾当时在荆湖南路做小官，张舜民、王巩都是被贬逐者，他们都利用工作调动或往来贬所之际，过黄州访他。这使双方都得到很大乐趣。如参寥在黄州，时间住得很长，“京师士大夫以书抵坡曰：‘闻公与诗僧相从，真东山胜游也。’”（《冷斋夜话》）<sup>(1) 76</sup> 米芾则自称：“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苏画竹时，从地直起至顶，人称何不一节节画，他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他一画木、石，米芾便觉得此木此石，“如其胸中盘郁也。”（《画史》）<sup>(1) 78</sup> 张舜民至黄，与苏同游西山诸处。他带来了他于贬地所写的《渔父》，中有句云：“保甲原无籍，青苗不着钱。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意为秉江渔父身在青苗法之外。苏轼不以为然，作《鱼蛮子》答之：“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sup>(2) 1124</sup> 他则认为天下行“新法”后，任何边地均为法网所盖，任何边民难成漏网之鱼。王巩从岭外回来，可

能曾携宇文柔奴过黄。坡问宇文氏：“‘岭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sup>(7) 488</sup>他便据此写了《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赞扬宇文氏的坚贞与超脱。学官朱载上、隐士陈慥，或则官于黄冈，或则隐于岐亭，与苏轼更是常相往来。朱“有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称赏再三……遂为知己。”（《耆旧续闻》）<sup>(1) 76</sup>。而他青年时代所交的结好友陈慥，在黄州同他过从甚密。苏轼临去，陈慥一直送到九江。临别，苏曾亲书前后赠陈的诗为《岐亭五首》，并作引曰：“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临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独至九江。”（《岐亭五首》）<sup>(2) 1203</sup>苏轼晚年贬惠，“时事大变”，官场上人均不敢接待他，而上述文人胜士却不然。当时张耒是沿途一州的知州，独派两个“白直”，一直将他护送到惠州。黄庭坚时贬朗州，也在鄱阳湖口系舟等待他，两人在湖口盘桓数日始别。到了岭表海外，陈慥、参寥曾先后来信，一个要陆行来惠，一个要海行来儋访他，经他坚拒始罢。不是他们不知道道路艰险，而是这“孔颜乐趣”在促使他们这样做。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在苏轼还颠簸于道路时，黄庭坚已在荆州等待朝庭命令。他于承天寺读到苏轼“和陶诗”、叹息弥日，并作小诗题其后，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其实不仅苏陶风味相似，连苏轼周围这批文人，风味都是相似的，都是具有文化自觉的。并且，正因为坚持孔颜乐趣，他们方能如此特立独行，无所畏惧。

文化自觉除了表现于追求孔颜乐趣外，更表现于自觉钻研与传承古代经典。苏轼自幼用功读书，抵达黄州时他已 44 岁，仍然读书不辍。除了熟读《汉书》外，还钻研儒家经典《尚书》、《易经》和《论语》，并写出专著。他在《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一文中说：“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景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之计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sup>(3) 2073</sup>他自觉地承担了文化的传承，但每当想起自

己的困难遭遇，又不由嘲笑挖苦自己。在黄州曾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又往往自笑不会取快活，真是措大余业。”（《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二十一》）<sup>(3) 1482</sup>但调侃归调侃，他却始终认真地在做。他晚年在儋州写信感谢郑嘉会（靖老）：“（在海外）只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两借书籍检阅也。”（《与郑嘉会·三》）<sup>(3) 1675</sup>同时还写了诗：“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和陶赠羊长史》）<sup>(2) 2282</sup>他是把儒家经典的传承，视作神圣事业的。这只要看他对子由所著这类书的评价便可知：“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跋子由〈老子解〉》）<sup>(3) 2072</sup>他一向重视兄弟俩这一“研究丛书”，在黄州曾将己作的《论语说》献给朝中大佬文彦博，希望书能托伟人以传后（《黄州上文潞公书》）<sup>(3) 1379</sup>。在晚岁量移北上途中，从雷州至廉州逢大雨，一身携三书处天海之间，曾喟叹：“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叹息，吾何数乘此险也……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书合浦舟行》）<sup>(3) 2277</sup>继续北上，他写信回答在中途等候他的苏坚：“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与苏伯固四首·三》）<sup>(3) 1741</sup>路上经年余跋涉，他在真州得病，到奔牛埭时病情转重，向来迎他的世交、老部下钱济明说：“某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春渚纪闻》）<sup>(1) 242</sup>这些均足以说明他对自己这三部传承经典的著作，是十分重视的。

同时，苏轼也重视文化经典的普及，重视教育。在三州，他都有许多从学的弟子。以儋州为例，他到后不久即游城东学舍，“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和陶示周掾祖谢》）<sup>(2) 2254</sup>于是他醵钱为穷士黎子云造“载酒堂”，并亲自在堂中讲经授徒。在他被董必逐出官屋，而不得不在南污池侧自造桄榔庵时，因囊中羞涩，几十个学生，以王介石为首，躬身泥水之役，勤如家隶。（《新居》注）<sup>(2) 2312</sup>元符三年与建中靖国元年，他遇赦北上，一路上

有许多士子随船从学。“轼自海南还，过南安”、“羸粮而从轼者三百余里”（《南安军学记》）。<sup>(3) 3714</sup>

当然，这里须着重说明的是，苏轼在贬逐期加强文化自觉的最大表现，还不是上述自我构建孔颜乐趣，甚至也不是以一己之力传承儒家经典，而是将诗文、将文化、将文明带入当时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如中原的黄州、岭表的惠州与海外的儋州。在黄，他通过友人、鄂州知州朱寿昌，以公权力变化溺婴风俗，并由自己出面成立救婴会，张扬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此外又通过诗词文章《满江红》<sup>(7)</sup>

<sup>282</sup>、《书刘庭式事》<sup>(3) 2051</sup>，表扬董义夫新妻不以丈夫失官为患，和刘庭式不以盲妻为嫌的高贵感情，端正风俗。在惠，通过诗《荔枝叹》<sup>(2) 2126</sup>、文《以乐害民》<sup>(3) 2294</sup>，揭露文明社会中的野蛮：“钱惟演为洛守，始置驿贡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蔡君谟始加法造小龙团茶贡之。富彦国曰：“君谟（系士人），乃为此耶？”苏轼还建议广州太守王古，造土“自来水”，引蒲岩清水入城，挽救因饮浊水而伤于时疫的广州人。而更重要的则是他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引入当时的岭表（特别是“海外”），直接促进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在惠州即从事先进农具（秧马、水碓）的推广；到了儋州又通过自己的诗文，力促“海外”落后低下的生产力提升，向先进的农耕社会发展。他为此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反对“坐男立女”，提倡用所有的劳动力（其中又以男劳力为主），来共同开发农业。他反对海南人单一的“惊磨朝射，猛豨夜逐”，也反对单一的“民无用物，珍怪是直”（开采与交易沉水香），而提倡“利尔粗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蘽，南东其亩”（《和陶劝农六首》）。<sup>(2) 2256</sup> 第二是提倡将所有从大陆运入海南岛的牛，都作为耕牛（生产工具），而反对将它们主要用于祭神或换取沉水香。他说“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从大陆购入牛后）耕者与屠者常各其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但以祭鬼，无脱者。”（《书柳子厚牛赋后》）<sup>(3)</sup>

<sup>2058</sup> 他做的第三件事，则是提倡汉人与当地黎人团结和睦，他说：“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愤刼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和陶劝农六首》）。<sup>(2) 2255</sup> 苏轼其人，确非只会写诗填词的文人，他目光远瞩，视野宽广，常能立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高屋建瓴地从事各项工作，推动社会前进。他给岭表海外输入文化，输入

文明，使当地居民在这个过程中改善生活，取得幸福与尊严。宋代即已有人指出，他在边地的作为，“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梁溪漫志》）<sup>(1) 208</sup> 苏轼目标明确地这样做，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他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 固守文化自信

元祐期间，北宋朝廷之上，继熙丰年间新旧党斗争后，在旧党内又出现了洛、蜀、朔三派的互不相让。对前者，除从清末梁启超到“文化大革命”这六、七十年间外，学术界一般均认为旧党当年应当坚持斗争。对后者，自南宋起，大家就不明白他们在斗个什么。因为三派的主要当事人，都是当时与后世人眼中的正面人物。以蜀党苏轼与朔党刘安世为例，东坡是君子就不需再在这里论证了；而刘安世绰号“殿上虎”，是有名的敢于面折廷争的学者型名臣。建中靖国元年，他俩遇赦北上，在虔州（赣州）相遇，才成了好朋友。苏在次年便病卒于常州，刘则此后还活了许多年，到处讲学。他曾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元城先生语录》）<sup>(1) 246</sup> 这个朔派代表人物，直到苏轼这个蜀派代表人物已逝多年之后，方给予它正确评价。而东坡也当得起这一评价，他确是个富于政治自信的名臣。而他的政治自信，出于他的文化自信。除了本文前引的一些例子外，还有许多事能证明他自己的文化见解、文化成就极其自信。他在前后十余年的贬谪期间，不仅贬地人士，甚至远离贬地几百里甚至几千里路外的士子，也慕名到这三州来从学。如有个叫葛延之的，就“自江阴簪担万里，绝海往见”东坡于儋州。（袁宗道《次子瞻先后事》）<sup>(1) 224</sup> 在那里，琼州姜唐佐、潮州王介石等，都携家长期住下来从学。当地的士子及市井人，则更加虔诚。“好事者欲得子瞻墨妙，每趁其行游之际，设佳纸笔砚，书姓氏，填集案间，拱立以俟。子瞻见，即笑谓之曰：‘日暮矣。小书难竟纸，或欲参名佛偈，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欣跃而散。”（《韵语阳秋》）<sup>(1) 348</sup> 他元符三年北归，抵达梅岭南麓的南安，“士羸粮而从轼者三百余

里。”（《南安军学记》）<sup>(3) 324</sup> 当他继续北上，“舟次新淦，时人方础石为桥，闻东坡之至，父老儿童二三千人，聚立舟侧，请名其桥。东坡……遂就舟中书‘惠政桥’字与之，邑人始退。”（《独醒杂志》）<sup>(1)</sup>

<sup>234</sup> 当舟将至他此行的目的地常州，“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邵氏闻见后录》）<sup>(1) 237</sup> 其实沿途与常州人所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种文化见解，一种文化成就，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本身。

东坡对文化艺术的一些见解，当时就被视为真理，九百年来深入人心。举例而言，在文学方面有：一是写事作文，以意为主。他说：“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清波杂志》）<sup>(1) 224</sup>

二是言止于达，辞达即文。他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推官书》）<sup>(3) 1418</sup> 三是凡作文字，应“淡而实腴，质而实绮”，“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一首》）<sup>(3)</sup>

<sup>2523</sup> 四是作诗为人，均贵其真，“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以其真也。”

（《书李简夫诗集后》）<sup>(3) 2148</sup> 五是诗文风格，不重于外在的文字，而重于内在的精神。“仆曾问‘荔枝何所似’，或曰‘似江瑶柱’，坐客皆笑其陋，应者怃然，仆亦不辩。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晌言合也。”（《荔支似江瑶柱说》）<sup>(3) 2363</sup> 苏轼在艺术方面的见解则有：评王维诗画则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sup>(3) 2209</sup> 评吴道子画则云“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跋吴道子地狱变相》）<sup>(3) 2213</sup> 均一言论定，九百年来颠仆不破。他评黄荃画雀，则认为鸟飞则颈脚皆展；评戴嵩画斗牛，则认为尾应缩入两股间（《书黄荃画雀》、《书戴嵩画牛》），提出须审于观物，务学而好问，且应该“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书戴嵩画牛》）<sup>(3) 2214</sup> 他更创立了“文人画”及其评判标准。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言其虽逸笔草草而却表现了所写对象的灵魂。（《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二》）<sup>(3) 2216</sup>

东坡对自己的文化成就，虽时有谦让之言，但其实颇为自信。他经常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他曾说：“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答毛泽民七首》）<sup>(3) 1571</sup> 他曾用这话来称赞谢民师：“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谢民师推官书》）<sup>(3)</sup>

<sup>1418</sup> 而他的《自评文》则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sup>(3) 2069</sup> 两者一致，所以他事实上是以座师（欧阳修）的话在评定自己的文章，并且深信不疑。他在评他最爱的陶诗时，曾说：“饥寒常在生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书渊明乞食诗后》）<sup>(3) 2112</sup> 这更是他的夫子自道。他知道自己各种作品的价值，所以常爱以此赠友人。在惠州时，老友晏秀从江南来访，“将去，坡曰：‘山中人见公还，必求土物，何以予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这个晏秀大概是大话说惯了，但苏轼却是务求实际，赶快纠正他说：“不如将几纸字去，每人与一纸。”（《跋所赠晏秀书》）<sup>(3) 2201</sup> 他在以自己书画赠穷士时，更心知肚明这些作品今后必为世所贵。《书赠宗人鎔》云：“宗人鎔，贫甚，吾无以济之。昔年尝见李驸马璋以五百千购王夷甫帖，吾书不下王夷甫，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书此以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价值如此，不亦钝乎？”<sup>(3)</sup>

<sup>2196</sup> 在给老友、吴兴贫士贾收信中，则云：“今日舟中无他事……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乃为作怪石古木一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还能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终君之世者，便以赠之。不尔者，可令双荷叶（贾妾）收掌，须添丁（贾子）长，以付之也。”（《答贾耘老四首·四》）<sup>(3) 1726</sup>

苏轼的为人与作品，在他身前即经几上几下的考验，曾几次被焚书、毁版、砸碑，但宋代士人百姓并不买朝廷的账。及他去世，“太学生侯秦、武学生杨选，素不识公，率众举哀，从者二百余人，饭僧于法云。”（《后山谈丛》）<sup>(1) 225</sup> 宰相蔡京与皇帝

赵信用公权力反击，三次树立“元祐党籍碑”，分置朝堂与各地行政、监司衙门。他们本以为这样可毁灭苏轼与作品，但事实却是，“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清波杂志》）

<sup>(1) 253</sup> 立元祐党籍碑一事，当时即遭遇种种抵抗。其中甚至有普通石工拒绝刻字的：一个叫安民的工人，被迫刻字后，却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一个叫李宗宁的，干脆拒刻。甚至像方士林灵素这样的人物，见了党人碑却稽首行礼。徽宗“怪而问之”，他答道：“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并作诗道：“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他接着封还皇帝在他入朝后赐给他的财物，私出国门而去。（《柳亭诗话》）<sup>(1) 255</sup> 崇宁大观间，遵圣旨已销毁的诗文书版，书画翰墨，却又重新出现，被大家抢购。其中皇帝、权贵们自己，就是主要抢购者。“至宣和间，上自内府搜访，一纸直至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月林堂’榜名三字。”（《长水日抄》）<sup>(1) 251</sup> 而同时，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则向社会公开宣扬自己与元祐党人的亲密关系。蔡京“行三舍法于天下，荣州地方官以王庠应诏”，王庠死活不肯，“时严元祐党禁，庠自称：‘苏轼、苏辙、范纯仁为知己；吕陶王吉尝荐举；黄庭坚、张舜民、王巩、任伯雨为交游，不可入举求仕，愿屏居田里。’”（《宋元通鉴》）<sup>(1) 251</sup> 朝庭对他也无可奈何。再过几十年，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相继为苏轼平反。天下士子间流引一句谚语：“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历史为苏轼证实他的文化自信。

### 注释

[1] 颜中其编：《苏东坡轶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3]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 袁行沛等编校：《陶渊明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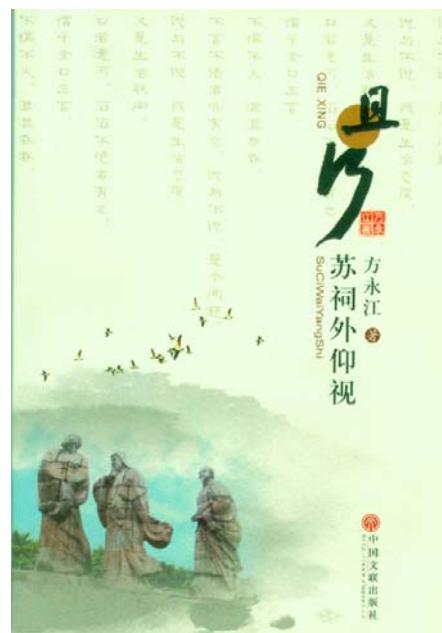
[5]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季刊），2010年第2期拙稿《谈东坡，〈南歌子〉三阙的系年》。

[6]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季刊），

2012年第3期拙稿《东坡“朝云诗”考释》。

[7] 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郑秉谦，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温州大学兼职教授、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书名：且行——苏祠外仰视  
作者：方永江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版  
开本：880mm×1230mm 1/32  
页数：148页  
定价：30.00元

# 北宋密州的灾荒与官方应对 ——基于苏轼知密州时期的考察

古 帅 乔云峰

**内容提要** 文章结合北宋密州的地理环境，对苏轼在密州救灾进行了考察。苏轼在上书朝廷力陈减免税收和禁官榷盐的同时，亲率百姓捕蝗并多次到常山祈雨，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效果不够理想，文章对其原因也进行了分析，对加深北宋时期地方官员进行灾荒救助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苏轼 密州 救灾

近一二十年以来，灾荒史研究不断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当前学界对于山东省灾荒史的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就研究区域范围和内容看，针对全省旱涝灾害与社会应对方面的研究较多。鲁西、鲁南地区是研究的重点区域，鲁东半岛地区<sup>[1]</sup>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里笔者选择对北宋时期密州灾荒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从研究的时段和区域上进一步加深对山东灾荒史的研究。

当前对于密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密州区域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对于苏轼知密州时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苏轼密州诗词方面，对苏轼密州救灾的研究关注较少。值得提到的是，在诸城地方文化研究专家李增坡先生的推动下，有些学者对苏轼知密州时期的政绩进行了考察和总结，其中涉及到苏轼在密州的救灾事迹。这里笔者拟结合北宋密州的地理环境，从灾害——社会的视角进一步加深对苏轼时代密州的认识。

## 一、北宋时期的密州

北宋全国分为 15 路，今山东境内分属京东路和河北路管理，至熙宁七年（1074），京东路

又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路以下设州、府、军、监。此时期的密州隶属于京东东路，治所在诸城，领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sup>[2]</sup>五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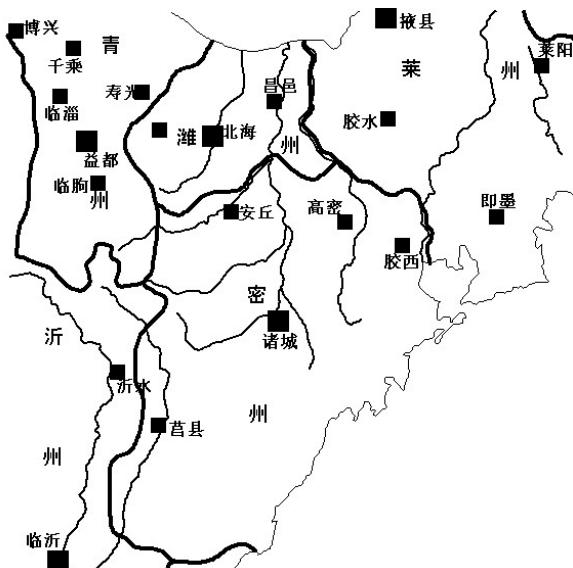


图 北宋密州及其周边形势  
(底图采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州境北部为潍河、胶水冲积的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较为肥沃；西南部山地面积较大，沐水南流注入沂河；东南部为相对窄狭的沿海低地平原，有一些短小的河流入海。境内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大致由东南沿海向西北逐渐减少，降水的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较大，旱涝灾害较为频繁。

北宋时期密州地区的旱蝗灾害事件统计表

时间（年）	事件	时间（年）	事件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	密州春旱秋水，害稼	真宗天禧元年（1017）	春二月，蝗蝻复生
太宗至道二年（996）	六月，密州蝗生食苗	仁宗天圣六年（1028）	夏五月，蝗
太宗至道三年（997）	八月，密州言蝗不为灾	仁宗皇祐四年（1052）	自正月至四月不雨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	秋七月，蝗	神宗熙宁六年（1073）	蝗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	夏六月，蝗	神宗熙宁七年（1074）	自秋至冬不雨
		神宗熙宁八年（1075）	春夏旱

资料来源：万历《诸城县志》卷九之《灾祥》；乾隆《诸城县志》二之《总纪上第一》。

宋初密州主户 14052，客户 22216<sup>[3] 卷二十四《河南道》368</sup>，至崇宁间密州人口已达 144567 户，327340 口<sup>[4] 2108</sup>，人口增长较快。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商业性的市镇也随之兴起。至元祐三年，在密州板桥镇置市舶司，板桥镇成为当时北方地区唯一的对内外贸易港口，不仅南北的商货在此中转，也是北宋对高丽贸易重要港口。据万历《诸城县志》记载：“高丽馆，在本县东关厢旧驿左，今废。宋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sup>[5] 卷八《古迹》78</sup> 高丽馆在密州的建置也反映出密州与高丽之间贸易的频繁和商旅往来之众。商贸交易的繁盛更促进了密州市镇的繁荣。

宋代山东是海盐的重要产区，煮盐业发达，密州涛雒场是当时京东东路重要的盐场，年产盐三万两千余担<sup>[6] 87</sup>。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诸城）县理东南百三十里滨海有卤泽九所，皆海潮侵荡，久成碱土，以土煮盐，多获其利。”<sup>[3] 372</sup> 宋代中后期私盐的兴起更刺激了煮盐业的发展，涛雒镇同时也成为因盐而兴的密州商业重镇。北宋结束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生产，此时期密州的农田水利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潍水故堰，在（诸城）县东北四十六里，蓄以为塘，方二十余里，溉田万顷，陂水散流，下注夷安泽。”<sup>[3] 372</sup> “夷安泽，在（高密）县北二十里，东西百余里，灌田万余顷，民犹赖之，是多豪富。”<sup>[3] 380</sup> 密州水利事业的发展可见一斑。

## 二、苏轼知密州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来到密州，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离开密州，在密州知州两年有余。苏轼刚入密州境地，即“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sup>[7] 1395</sup> 蝗灾是伴随旱灾而来，当时的密

州“自今岁（1074）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如此的旱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以致“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苏轼甚至产生“明年（1075）春夏之际，寇攘为患，甚于今日”<sup>[7] 754</sup> 的忧虑。从上面看，由饥荒导致盗贼增多更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再加上密州“风俗武悍，特好强劫”<sup>[7] 1398</sup>，更加重了强盗为害扰乱社会的程度。

那么面对这样的灾荒，当时密州的其他官吏是如何看待的呢？“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积蓄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sup>[7] 754</sup> 这样做导致“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sup>[7] 754</sup> 面对这样严重的灾荒，采取通常性的赈灾措施看来是于事无补的。更为令人气愤的是，当蝗灾来临之时，“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sup>[7] 1395</sup>，不知是出于对灾荒严重程度的无知，还是担忧自己的宦迹升迁刻意隐瞒灾情而不赈灾。

## 三、苏轼密州的救灾

苏轼在熙宁变法中因政见不合，触怒了变法派的执政者，被迫离开朝廷。他先是到杭州任通判，而后知密州。当时苏轼的政治处境并不安全，更何况他是从繁华的江南来到较为凄凉荒落的密州，“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sup>[8] 129</sup>，苏轼消沉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失意的心情在苏轼离开海州赴密州的路上所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表现的较为充分：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擒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

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sup>[8]125</sup>

“世路无穷”而“劳生有限”，胸有万卷“致君尧舜”但不被重用，当时苏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传统社会士大夫长期受到儒家忠君报国、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面对密州严重的灾荒，苏轼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更何况“他总是深深感激仁宗对他的举拔和神宗在变法初期对他的信任，而时时思报君恩于万一。”<sup>[9]407</sup>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在密州采取了很多措施应对灾荒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一）上书朝廷，减放税收

苏轼作为密州知州，既是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员，又承担着征缴给国家赋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多重使命。就个人来看，密州乃至京东、河北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灾情，苏轼主张用国家调控的方式，对地方财政征收项目依照当地丰歉程度和国家需要作出调整，在灾荒年份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征收，以保证地方赈灾的需要。<sup>[10]98</sup>

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申诉到：

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今来二麦元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欲乞河北、京东逐路选差臣僚一员，体量放税，更不检视。<sup>[7]754</sup>

宋代政府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灾害救助程序，主要包括诉灾、检放和抄扎三部分，其中检放包括检查灾情和确定放税分数两层含义。<sup>[10](236~237)</sup>而京东地区出现如此大范围的旱灾而致“千里无麦”、“无根苗可检”，所以苏轼希望朝廷直接“选差臣僚一员”“体谅放税”。苏轼甚至进一步考虑到：

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将夏税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便纳见钱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俟至秋熟，并将秋色折纳夏税。<sup>[7]754</sup>

只有减缓赋税，小民才“不致大段失所”，强盗才不会迅速增多，社会才能更趋于稳定。

灾荒的产生首先是由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引起的，像密州的这次灾荒就是由于长期的降水减少而引发，长期的干旱又导致蝗虫激增为灾，旱蝗叠加，旱灾的严重程度自不待言。但是灾

荒之所以如此严重，背后的“人祸”之灾不容小觑。对于密州乃至整个京东地区的大范围灾荒，“人祸”一方面来自由灾而起的盗行滋生，另一方面来自政策的不合理。苏轼认为根源在于后者。就像上文所说的在检放税收方面在“无根苗可检”的情况下，“官吏守法，无缘直放”，只会加重百姓逃移，甚至良民为盗的社会混乱形势。反过来强盗为害更加重了灾荒背后的“人祸”成分。苏轼在密州上书朝廷力陈盐法弊端同样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 （二）力陈盐法弊端，建议禁官榷盐

京东地区是宋代海盐的重要产区，密州的涛雒场是京东地区的重要盐场之一，政府在此设置场务经营盐场，是为官榷食盐，严禁私人贩卖食盐。但是对于河北、京东地区来说“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更何况“近年盐课日增”，“至熙宁六年，增至四十九万九千余贯。”原本京东地区应有的盐政生态是：“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阴销盗贼。”这样不管是朝廷还是百姓都能从食盐的产销中获利，社会秩序也会相对稳定。但是随着苏轼知密州时期盐税的急剧增长，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生态平衡状态，再加上旱蝗灾害并起，更促使社会混乱，灾情加重。就密州而言，虽然“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朝廷和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从盐课的增长中获利，百姓则“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sup>[7]755</sup>

面对这样的形势，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禁止官方榷盐，适当地允许百姓贩盐。其实早在苏轼之前的密州知州蔡齐，就曾于密州发生旱灾时“请弛盐禁”，并“因岁旱，除公田租数千担”<sup>[12]卷二《总纪》429</sup>，所以苏轼上书朝廷提出减免税收和禁官榷的建议是有历史根据的。对于禁止官方榷盐来说，苏轼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仍官给印本空头关子，与灶户及长引大客，令上历破使逐旋书填月日姓名斤两与小客。限十日内更不行用，如敢借名为人影带，分减盐货，许诸色人陈告，重立赏罚。<sup>[7]755</sup>

这样放税后势必存在“盐税大亏”的隐忧，但苏轼看来未必如此，他继续议论到：

今小商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盐商的积盐)，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损益相补，必无大亏之理。……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sup>[7]756</sup>

在苏轼看来，有限度地减免小商小贩的盐税不仅有助于百姓度过灾荒，盗贼为患程度也会随之减轻，大盐商的食盐销路也更加畅通，国家的盐税收入也“必无大亏之理”。退一步看，“纵使(盐税)亏失，不过却只得祖额元钱，……苟朝廷捐十万贯钱，买此两路之人不为盗贼，所获多矣”，即使是朝廷的盐税有亏损，能够换来河北京东地区的社会稳定也是值得的。再退一步讲，在严重的灾情面前，朝廷即使“特出一二十万贯见钱，散与人户”，其结果也只能是“人得一貫，只及二十万人，而一貫见钱，亦未能济其性命”<sup>[7]756</sup>，良民为盗的局面也就得不到控制，最终还是加重灾荒中的“人祸”成分，危及朝廷的统治。

### (三) 率民捕蝗

面对严重的灾荒，苏轼一方面上书朝廷，寻求自上而下的政策救助，另一方面，苏轼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治理灾荒，带领民众捕蝗和常山祈雨就是其中的两项重要行动。对朝廷和地方州县来说，为了鼓励民众灭蝗，根据民众交给官府所捕蝗子的多少发放一定的米粮给以奖励，即“州县募民捕蝗，每掘得其子，以斗升计，而给米多寡有数焉”，并将捕得的蝗虫和蝗子用“乘界炎火”和“荷锄散掘”的古法烧死或坑埋。经过努力，没用多长时间苏轼就带领民众“得蝗子八千余斛”并窖于县前。如果按“率以一升完一亩”的比率来算的话，则能使80多万亩农田免收蝗灾的破坏，这样看来还是取得一定的成效的。虽然灾民捕蝗能够“得米济饥还小补”，苏轼募民捕蝗所获也不算少，但是官府的救灾米粮必定是有限的，更何况密州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干旱，捕蝗也不能抵挡住持续干旱带来的饥荒。“从来蝗旱必相资”<sup>[13]623</sup>，若要抵御旱蝗，还是要靠降水的增加来减缓旱情，到常山祈雨也就成了苏轼密州救灾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 (四) 祈雨常山

旱灾祈雨的习俗由来已久，唐代政府对于祈雨有明确规定：“旱甚，则修雩，秋分以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若州县，则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sup>[14]92</sup>宋朝政府更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旱灾祈雨体系，面对连年严重的旱灾，作为一州知州的苏轼也亲率百姓到常山祈雨。

常山，“直州之南二十里而近，地志以为祈雨而常应，故名曰‘常山’。”在苏轼之前不久的密州知州吴奎就因天旱而祈雨常山，“皇祐四年，自正月不雨至于首夏”，当时吴奎携其他官员在常山神祠读祝辞后，“越晨，浓荫四合，徐徐泛晒。……润境周匝，群物苏醒，类久病之

顿愈，妖娆融结，茂郁如也。”<sup>[5]</sup>卷十一《杂著》125

吴奎祈雨成功，同时也兑现了之前“三日雨，足当新其庙”的承诺，重修了常山神祠。

苏轼知密州时期正值严重的旱蝗灾害，他多次到次到常山祈雨。苏轼第一次到祈雨当在熙宁八年四月，当时苏轼“谨以四月初吉，斋居蔬食，至于闰月辛丑”，并许下“若时雨沾洽，蝗不能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的承诺，这次祈雨的效果如何呢？“即退之三日，时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不独生。”<sup>[7]1917</sup>这在苏轼所作的《次韵章传道喜雨》也能得到证明。然而“一雨之后，弥月不继。百里之外，蝗生如初”。苏轼再次来到常山祈雨，并承诺“若时赐需泽，驱攘虫灾，以完我西成之资，岁秋九月，当与吏民复走庙下”。这次祈雨后，当年（1075）十月“岁得中熟”，苏轼重修常山神祠庙宇并写谢雨文。自熙宁八年五月苏轼第二次祈雨常山后，“虽尝一雨”，但“不及肤寸”，<sup>[7]1932</sup>所以苏轼于熙宁九年五月再赴常山祈雨，同年七月，皇帝下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自苏轼第三次祈雨常山后，“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囷籜。麦田未耕，狼顾相目”，<sup>[7]1917</sup>旱情依然十分严重，苏轼遂又于熙宁九年的七月和十月再赴常山祈雨，并在最后一次祈雨时以少劳之礼祭告于常山神庙。

大气降雨受自然规律控制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是很难改变的，祈雨不过是旱灾中宋代地方政府的一项必然举措，“虽然客观上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但当蝗灾发生时，对神灵的祈祷，也就成了人们信念上的支撑，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能在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中得到一丝慰藉，可以起到安民心、国祚，以固根本的作用”<sup>[15]292</sup>，苏轼多次祈雨常山，虽然效果不大，但是对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四、余论

总体看来，面对密州严重的旱蝗灾害，作为密州知州的苏轼，带领地方官员和百姓做出了积极的应对，一方面苏轼大胆上书朝廷减免税收、禁官榷盐，另一方面他亲自率领群众捕蝗，并到常山祈雨。除此之外，苏轼还凿雩泉、修筑扶淇河堤，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灾荒，同时面对日益增多的盗贼，苏轼“明立够赏”，推行治盗的新方法。但是，从苏轼的密州救灾的效果来看，上书朝廷提出的建议并没有被实施，他率领百姓捕蝗和多次到常山祈雨虽然对于旱灾的缓解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相对熙宁七年至

熙宁九年的三年持续旱蝗灾害收到的成效仍然是较小的。鉴于此，我们或许不能过高地赞誉苏轼的密州治绩。

苏轼密州救荒之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不久，虽然此时苏轼自身的政治处境较为危险，但他仍多次上书朝廷，其中还有涉及新法中手实法弊端的书文，他忧国忧民、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了留给密州人们的巨大财富。同时，苏轼当时的政治处境和熙宁变法社会背景很可能导致苏轼上书减免税收、禁官榷盐的失败，所以，对苏轼这位特殊的密州知州来说，他的密州救灾或许不具有普遍性，但这对于我们了解王安石变法期间地方社会的灾荒救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当时的密州号称为“山东第二州”，但与繁华的杭州相比，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即使这样，即使是在严重灾情影响之下，苏轼仍能保持一种乐观超然的精神，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救灾，他这种精神对救灾无疑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后世救灾富有教益。时至今日，苏轼的这种精神依然激励着密州人民奋勇前进！

### 注释：

[1] 习惯上今天的鲁东地区主要包括烟台、威海、青岛的大部分和潍坊的大部分，从北宋密州的地理位置和辖域范围看，境内大部分属于今天的鲁东地区，小部分属于鲁南地区，苏辙也曾有“东鲁遗风今犹在，十万家尽读书”的诗句，据此，笔者认为今天将北宋密州辖境划归为鲁东地区更为妥当。

[2] 胶西县，隋开皇十六年（596）析黔陬县置胶西县，其范围相当于今高密市东部、胶州市西北部；唐武德三年（620）复置胶西县（属高密郡），唐武德六年（623）并胶西入高密县；北宋元祐三年（1088）析高密、诸城2县东境置胶西县，属京东东路密州，其范围相当于今胶州市与胶南市北部。

[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光绪金陵书局本。

[4] （元）脱脱著：《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京东路，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5] （明）陈烨著：《诸城县志》，载诸城市档案馆编《诸城历代方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6] 张熙惟著：《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7]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8]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9] 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10] 张喜琴著：《苏轼救荒思想述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1] 郭文佳著：《论宋代灾害救助程序》，《求索》，2004年第9期。

[12] （清）宫懋让著：《诸城县志》，载诸城市档案馆编《诸城历代方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3]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4] 张健斌著：《唐代的祈雨习俗》，《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

[15] 郝文著：《试论明代山东蝗灾中的政府行为》，《农业考古》，2012年第1期。

（古帅，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乔云峰，山东省诸城市超然台管理处主任）

# 从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看北宋海外贸易法令的问题 ——基于新旧史料的探索

彭林泉

**内容提要** 苏轼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海外贸易法令之所禁，这些法令具有加强国家安全，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一面。同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也表现了一个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苏轼对海洋安全的高度关注，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这也是过去苏轼研究当中未曾关注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 苏轼 《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北宋海外贸易法令

《苏轼文集》中《奏议》部分有一篇《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这篇文章包涵了若干北宋各个时期海外贸易法令编敕，对研究苏轼的思想和北宋海外贸易法令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之前的苏轼研究中，多数是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文学思想，并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看待，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篇文章。对文章所反映的问题则关注更少，亦未能从中看出苏轼奏议的前瞻性和全局意识，以及当时海外贸易法令的问题。本文拟将这篇奏状和新发现的《天圣令·关市令》及日本《朝野群载》中泉州商人李充于北宋崇宁年间出海经商的关凭作一个对比，并结合既有史料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 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及海外贸易中暴露的商人违法交易和国家安全问题

《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是一篇全面论述北宋海外贸易法令政策的文章，其中还有若干编敕，由于本篇大部分都涉及到海外贸易法令，现在将这篇文章全文抄录如下：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检会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戬公案，为徐戬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公私并不知觉，因此勾合密熟，遂专擅受载彼国僧寿介前来，以祭

奠亡僧净源为名，欲献金塔，及欲住此寻师学法。显是徐戬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来本僧搔扰州郡。况高丽臣属契丹，情伪难测，其徐戬公然交通，略无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闽、浙之民，杜绝奸细。奉圣旨，徐戬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

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货，并是大辽国南挺银丝钱物，并有过海祈平安将入大辽国愿子二道。本司看详，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闻奏，乞禁止。近又于今月初十日，据转运司牒，准明州申报，高丽人使李资义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于去年六月内，请杭州市舶司公凭往高丽国经纪，因此与高丽国先带到实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余布袋前来。本司看详，显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国交构密熟，为之乡导，以希厚利，正与去年所奏徐戬情理一同。

见今两浙、淮南，公私骚然，文符交错，官吏疲于应答，须索假借，行市为之忧恐。而自明及润七州，旧例约费二万四千六百余贯，未论淮南、京东两路及京师馆待赐予之费，度不下十余万贯。若以此钱赈济浙西饥民，不知全活几万人矣。不惟公私劳费，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渐可忧。皆由闽、浙奸民，因缘商贩，为国生事。除已具处置画一利害闻奏外，勘会熙宁以前《编敕》，客旅商贩，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违者，并徒二年，船物皆没入官。窃原祖宗立法之意，正为深防奸细因缘与契丹交通。自熙宁四年，发运使罗拯始遣人招来高丽，一生厉阶，至今为梗。《熙宁编敕》，稍稍改更庆历、嘉祐之法。至

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敕，惟禁往大辽及登、莱州，其余皆不禁，又许诸蕃愿附船入贡，或商贩者听。《元祐编敕》亦只禁往新罗。所以奸民猾商，争请公凭，往来如织，公然乘载外国人使，附搭入贡，搔扰所在。若不特降指挥，将前后条贯看详，别加删定，严立约束，则奸民猾商，往来无穷，必为意外之患。谨具前后条贯，画一如左。

《庆历编敕》：“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若往余州，并须于发地州、军，先经官司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欲往某州、军出卖。许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结罪保明，委不夹带违禁及堪造军器物色，不至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出给公凭。如有违条约及海船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船物并没官，仍估物价钱，支一半与告人充赏，犯人科违制之罪。”

《嘉祐编敕》：“客旅于海道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至登、莱州界。若往余州，并须于发地州、军，先经官司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欲往某州、军出卖。许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结罪，保明委不夹带违禁及堪造军器物色，不至越过所禁地分。官司即为出给公凭。如有违条约及海船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船物并没官，仍估纳物价钱，支一半与告人充赏，犯人以违制论。”

《熙宁编敕》：“诸客旅于海道商贩，于起发州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往某处出卖。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结罪，保明委不夹带禁物，亦不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出给公凭。仍备录船货，先牒所往地头，候到日点检批凿公凭讫，却报元发牒州，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

元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札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其发高丽船，仍依别条。）”

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敕节文：“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船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诸商贾由海道贩诸蕃，惟不得至大辽国及登、莱州。即诸蕃愿附船入贡或商贩者，听。”

《元祐编敕》：“诸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并具人船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物货内不夹带兵器，若违禁及堪造军器物，並不越过所禁地分。州为验实，牒送愿发舶州，置簿抄上，仍给公据。方听候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

市舶司。即不请公据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罗、登、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

右谨件如前。勘会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挥，最为害事，将祖宗以来禁人往高丽、新罗条贯，一时削去，又许商贾得擅带诸蕃附船入贡。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戬、王应升、李球之流，得行其奸。今来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庆历、嘉祐《编敕》施行。不惟免使高丽因缘猾商时来朝贡，搔扰中国，实免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之患。谨录奏闻，伏候敕旨。”<sup>[1] 889-891</sup>

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反映当时海外贸易法令政策的文章，该文较长，需要分若干层次，对其中的编敕也需要仔细考订。

第一段，针对泉州商人徐戬与高丽“公然交通，略无畏忌”的犯法行为，苏轼要求实行比较严厉的惩罚，以杜绝东南沿海奸细。但是从刑法处置上看，他也并没有判处徐死刑，笔者认为，这样的量刑尺度还是失之宽松，并不能起到杜绝此类犯罪的作用。

第二段，是针对泉州纲首徐成的申诉状反映商人王应升假借高丽公凭用船前往敌国（辽国）做买卖，被抓获，查获船上的货物全部是辽国的货物。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商人李球到高丽经商后，为了牟利从高丽走私货物的事件，所以作者希望借此制定相关的法令杜绝有关犯罪。

第三段，系针对两浙淮南地区经济乱象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针对福建、浙江的不法之徒依靠商贩勾结契丹一事，提出：修订熙宁以前《编敕》，禁止商贩前往高丽、新罗和登州莱州界，否则舶货没收入官府，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法令对犯人刑事处罚较轻，而民事处罚较重。之后，作者呼吁根据过去唐朝编敕，重新修订相关的法令，加强对私通外人交易的处罚。

以下各段分别论述各个时期的编敕，这些编敕是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法令的重要资料。首先，《庆历编敕》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若往余州，并须于发地州、军，先经官司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欲往某州、军出卖。许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结罪保明，委不夹带违禁及堪造军器物色，不至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出给公凭。如有违条约及海船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船物并没官，仍估物价钱，支一半与告人充赏，犯人科违制之罪。”这份编敕实际上就是规定出于国家经济安全考虑客商由海路经商的话，不准前往高丽、新罗及登州、莱州边界（因为很容易和辽国进行非法交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如果要前往其他地区，必须到出发的地方所在州（军）

的官府进行投状然后由市舶司开出公凭，记录货物的名称、件数，以及出卖目的地，并找三个当地人下保证书，在确保不得夹带违禁物品和军器，不得越过禁地后，官府即发放公凭。如果有违反相关法规或者海船没有公凭，被人揭发抓获后，所有船上货物由官府没收，并对货物进行估价，然后将货物价值的一半赏给告发者。有关这份编敕的内容，可以在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当中找到互证，比如在最新发现的史料《天圣令·关市令》宋七条可以找到互证，“(禁物)如不合将应禁之地，为人纠获者，皆二分其物，一分赏纠人，一份入官。若官司于其部所捉获者，不在赏限，其物没官。”<sup>(2)</sup>可以与庆历编敕互证。当然，两份材料中对禁物的处罚办法略有不同。而日本古籍《朝野群载》记载了一张北宋崇宁四年（1105）由明州市舶司发给泉州商人李充去往日本渡海经商的公凭，其中开篇云：“提举两浙市舶司：据泉州客人李充状，今将自己船一只（笔者按：怀疑有衍字），请集水手，欲往日本国，转买回货，经赴明州市舶物抽解，乞出给公验前去者。”然后讲述自己船上人和货物的情况：“自己船一只，纲手李充，梢工林养，杂事庄权，部领吴弟。”然后又将第一、二、三甲上船员姓名共约60人记录了下来。另外，该公凭还记载了货物名称，以及船上的器具情况，并称：“刻本州物力户郑裕、郑敦仁、陈佑三人委保，本州岛令给杖一条，印一颗。”（这一条针对的是禁物出关，包括陆上关津、海关（市舶司）后相关的处罚措施。）<sup>(2)</sup>较《庆历编敕》更加生动详细地解释了其中的有关规定。下文还将详细论述。

第二份《嘉祐编敕》和第三份《熙宁编敕》，《嘉祐编敕》云：“客旅于海道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至登、莱州界。若往余州，并须于发地州、军，先经官司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欲往某州、军出卖。许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结罪，保明委不夹带违禁及堪造军器物色，不至越过所禁地分。官司即为给出公凭。如有违约及海船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船物并没官，仍估纳物价钱，支一半与告人充赏，犯人以违制论。”《熙宁编敕》云：“诸客旅于海道商贩，于起发州投状，开坐所载行货名件，往某处出卖。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结罪，保明委不夹带禁物，亦不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给出公凭。仍备录船货，先牒所往地头，候到日点检批凿公凭讫，却报元发牒州，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州界商贩者，各徒二年。”这两份编敕内容和前一份大致相似，也是规定海商禁止进入的地区，并规定如果往其他州县经商，必须先到官府投状并开出贩卖货物的证明，找三名有“物力”的居民担保不夹带违禁物品和兵器，这样官府才可以发放公凭。如果违约或者海船没有公凭

被人告发查获，船物全部由官府没收，并估算货物的价值，将其中一半赏给举报人，犯人则要按违犯法令制度处理。如果擅自由海道进入界河及往北进入高丽、新罗和登、莱州界经商，要判处两年徒刑。

接下来这两段当是引用了《元丰市舶条例》中的部分内容：“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其发高丽船，仍依别条。）”

“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船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诸商贾由海道贩诸蕃，惟不得至大辽国及登、莱州。即诸蕃愿附船入贡或商贩者，听。”有关这一条例的其他内容，又散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书中，<sup>(3) 252~255</sup>特别是《宋会要辑稿》有大量记载，章深先生曾经根据这些内容，总结《元丰市舶条例》内容如下：第一，除了广州、明州和杭州以外，其他地方禁止放行外贸商船，第二，凡是前往南蕃地区的商船，一律在广州舶司放行，凡是前往高丽、日本的商船，一律在明州市舶司放行，不是广州市舶司放行前往南蕃的商船或者不是明州市舶司放行的前往高丽、日本的商船，以违背皇帝敕令论罪，即使逢大赦或者官员离任也不能减轻刑罚，此即本奏状中所述内容。第三，外国商船返回时，必须到原来放行的市舶司进行纳税贸易。第四，“各市舶司负责管理各贸易区域内的外国朝贡船舶、贡使及其活动，贡船、贡使也应在主管市舶司的设置地点登岸、离港”。第五，各国进贡的物品需就地变卖，不再送往京师。第六，两广沿海前往海南岛的船舶必须向广州市舶司领取出海凭证。第七，“违法撤职的官员，贬谪、管制和充军的犯人，不得随商船赴海外。”第八，“市舶司最高长官改称‘市舶提举’，由本路转运副使兼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不再兼任市舶使。”<sup>(4) 98~100</sup>其观点基本可信。从以上可以看出，元丰市舶条例对商船的活动和货物买卖，公凭蕃坊这些内容，确实是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这也是苏轼希望制定相关海外贸易法令所参照的条例之一。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元丰八年的条文比元丰三年的那一条在对商人海外贸易规定上有所减轻，这也是勘会中诟病最大的地方。

最后一份是《元祐编敕》：“诸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并具人船物货名数所旨去处，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物货内不夹带兵器，若违禁以堪造军器物，并不越过所禁地分。州为验实，牒送愿发舶州，置簿抄上，仍给公据。方听候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即不请公据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罗、登、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内容与前几份编敕类似。

文章最后一段是勘会结果，“元丰八年九月十

七日指挥，最为害事，将祖宗以来禁人往高丽、新罗条贯，一时削去，又许商贾得擅带诸蕃附船入贡。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戬、王应升、李球之流，得行其奸。今来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庆历、嘉祐《编敕》施行。不惟免使高丽因缘猾商时来朝贡，搔扰中国，实免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之患。”这实际上反映了在王安石变法所倡导的“祖宗之法不足训”的影响下，新党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相关的海外贸易法令，对本国商人和外国的勾结以及海外经商携带蕃人乘船入贡的行为，其处罚力度实际上是大为放松，结果导致内外勾结问题严重，经济安全受到影响。本篇是作者于元祐年间在杭州担任知州时所作，时正值高太后和旧党执政时期，无论是作者还是当时的朝廷，都是站在旧党的立场，因此其对新党过去错误政策的修正是显而易见的。

这份奏状暴露了当时宋代海外贸易中时常出现的商人违法同敌国交易，危害国家安全问题，是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法令的重要文献。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作为一个地方官，对国家的海防安全表现出了高度关注，并希望国家能够制定相关法令政策，杜绝海商和敌国之间的勾结，促进海外贸易经济正常发展，这一点，也是前人研究不够的地方。

## 二、苏轼奏折和其他相关新旧史料体现了宋代海外贸易法令的不足：民事处罚较重而用刑相对宽松

从苏轼这份奏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海外贸易法令的冰山一角，即宋代颁布这一系列海外贸易法令，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对商人出海经商也有不少严格的限制，这一点和前代都不同。很明显这是因为进入宋代以后，北部边境受到辽国的侵袭，而当时不少商贩前往高丽日本经商，不过是借这个幌子私通辽国。因此海外贸易法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格禁止商人由海道进入辽国进行交易。同时，对相关的违法者和举报人赏罚分明的态度，也是宋代海外贸易法令制定的一个特点。不过总的来看，民事处罚较重而刑事处罚较轻，这是海外贸易法令制定中的问题，它对震慑官商勾结现象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并使得海外贸易秩序一度出现混乱，铜钱的外流屡禁不止，国家的安全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结合新发现的《天圣令·关市令》和李充出海关凭，更能看出以上特点。

《天圣令·关市令》宋七条云：“诸有私将禁物至关，已下过所，关司捉获者，其物没官。已度关及越度为人纠获者，三分其物，二分赏捉人，一

分入官。若私共化外人交易，为人纠获，其物悉赏纠人。如不合将应禁之地，为人纠获者，皆二分其物，一分赏纠人，一份入官。若官司于其部所捉获者，不在赏限，其物没官。如纠人在禁物乡应得赏者，其违禁物准直官酬。其所获物应入官者，年终申所司。其获物给赏分数，自有别敕者，不拘此限。”

<sup>(2)</sup> <sup>306</sup> 根据刘馨珺《唐宋的关界》一文考订，“市舶司是蕃商的海界”，<sup>(5)</sup> <sup>248</sup> 可见，宋代的市舶司还是海上的“边关”，承担了查验禁物的功能。因此本条令文不仅适用于宋代的陆上边关，也适用于市舶司，故以此条令文对照苏轼的奏议看当时海外贸易法令的问题是可行的。

本条令文是针对化外人的，所谓的化外人也包括那些宋朝周边国家的蕃人，本条指出“如果有人在‘禁物乡’纠举违法贸易，因而应该获赏者，依官方价格计算所获违禁物的价值，在依法令规定酬庸纠举人。”<sup>(5)</sup> <sup>236</sup> 令文需分层分析，第一层是说如果禁物进入关（市舶司）已经在过所（关凭）上登记并被守关者查获的，禁物全部为官府没收。第二层讲述的是如果私自和化外人交易，被人查获，被查获的物品全部赏给纠举人，将此条令文和《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对照后发现，其中的《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也有类似的内容，“如有违约及海船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船物并没官，仍估物价钱，支一半与告人充赏，犯人科违制之罪。”违约，也包括私共化外人交易的问题。可见，两条史料可以互证，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代海外贸易法令对举报人和违法者赏罚分明的态度。

另外，我们可以将上文提及的李充去往日本渡海经商的公凭和《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及前面的《天圣令》令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该公凭第一部分规定了商人出海贸易时，船员的组织、结构，船内的货物、器具。本段正可以和上文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的编敕进行史料互证，因为两者都规定了商人到海外经商，必须开出公凭记录货物的名称、件数，以及出卖目的地，并找三个当地人下保证书，确保没有禁物之后，市舶司才能下发公凭。而李充这份公凭则较苏轼的编敕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更加形象、具体。

其后则是全面讲述当时海外贸易的规定，相应的违法行为以及刑罚，“诸商贾于海道兴贩，经州投状，州为验实，条送愿发舶州，置簿抄上，仍给公据，方听行，回日，公据纳住舶州市舶司。即不请公据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登、莱州界者，徙二年（不请公据而未行者减贡（？）算）。”这一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商人如果在海上贩运货物，必须由所在州进行投状，由当地核实了以后，将相关内容发放给相应的市舶司所在州，由政府部门通过以后，方可允许他们出海经商。回来的时候再由相应部门安排住在所停泊之州的市舶司。如果

不向政府部门申请而擅自行动，或者擅自乘船从海道进入宋辽边界的河流或者前往登州、莱州州界的话，判处流放二年。可见，当时宋朝对擅自乘船闯入边界的违法行为，其处置是相当严厉的。然后是进一步作具体说明：“往大辽国者徒三年，仍奏裁。并许人告捕，给船物半价充赏（内不请公据未行者，减擅行之半，其已行者，给赏外，船物仍给官）。其余在船上虽非船物主，各杖八十以上，保人并减犯人三等。”这条规定了对告发擅自乘船前往敌国边境嫌疑犯的人的奖赏措施，可以看出，当时就如何防范商人擅自渡海闯入敌国边界已经制定了一套比较细致的规定。这一点与《关市令》宋七条也可以作为互证。当然从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看到，法令对相应的违法者量刑相对较轻，甚至失之宽大。

接下来这段勘会提到：“……今欲除北界、交趾外，其余诸蕃国未尝为中国害者，并许前去，惟不许兴贩兵甲器杖及将带女口，奸细并逃亡军人，如违，应一行所有之物没官，仍检所出因内外声明说。”此段勘会也和《天圣令·关市令》宋七条形成史料互证对比，表明如果携带禁物出关被守关人发现，禁物会被全部没收，可见宋代海外贸易法令对违法者的民事处罚确实是比较严厉的。

最后一部分勘会，也有可以和苏轼奏状和天圣令互证的内容：“诸商贾贩诸蕃间……应抽买辄隐避者，纲首、杂事、部领、梢公（令亲戚管押同）各徒二年，配本城，即雇募人管押，而所雇募人情人避免，及所情人，准比邻州编管。若引领停藏，负载交易，并贩客减一等，蕃国人不坐。即在船上私自犯，准纲法坐之。纲首、部领、梢工、同保人不觉者，杖一百以上，船物（不分纲首、余人及蕃国人，一人有犯，同住人虽不知情及余人知情并准此）给赏外，并没官（不知情者以己物三分没官）。诸海商舶货避抽买，舶物应没官……诸海商冒越所禁国者，徒三年，配千里。即冒至所禁州者，徒二年，配五百里……”对这一部分进行分层处理后，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规定如果逃避应有的抽解、博买，则对纲首、杂事、部领、梢公等人的刑罚，《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都有类似的规定：《庆历编敕》言：“如有违条约及海船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嘉祐编敕》也说：“如有违条约及海船无公凭，许诸色人告捉，船物并没官”其中违禁当亦包含此类。第二部分规定如果“引领停藏”，或者进行超载的交易买卖，贩卖旅客，则罪减一等，外国人不判刑，同时，除了需要犒赏的物品以外，船上的货物一律由官府没收。如果海商货物逃避抽解博买，则舶货由官府没收。这些，在上文提到的编敕和《关市令》中，也可以得到互证。关凭最后一部分规定，“冒越所禁国者，徒三年，配千里。即冒至所禁州者，徒二年，配五百里。”

很显然，在《熙宁编敕》和《元祐编敕》可以发现类似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北宋，如果擅自进入禁地经商，需要判刑两年并发配五百里，这一规定，从熙宁到崇宁基本没有变化，同时可以看出关凭还体现了宋代海外贸易法令又一大特点——保护外国人的权益并对外国人处罚相对宽纵，而且总的来看，重民事处罚轻刑事处罚在这里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体现。

因为上述原因，北宋的这些海外贸易法令虽经颁布，却不能起到彻底杜绝官商犯罪的作用，后果之一就是大量铜钱外流。仅举一例，即与苏轼同时代的张方平在《论钱禁同法事》一文中，提到：“今自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蔽，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sup>[6] 411</sup>铜钱竟然与外国共用，可见外流到了何等地步。到了南宋，市舶官员面对丰厚的海外贸易利润，和外商勾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铜钱的外流也更加严重，此处不赘述。

### 三、结论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由于受到辽国的不断侵扰，陆上贸易受到较大影响，一些沿海商人为了牟利，假借走海道到高丽经商贸易之名去辽国经商，此为苏轼所察觉。在苏轼等人的呼吁下，北宋在制定海外贸易法令时，将国家安全摆到了突出的位置，特别是对擅自到宋丽、宋辽之间的界河界海地区的贸易加大了处罚力度，对携带兵器、妇女进入高丽的现象采取了相对严格的民事处罚，对举报者给予奖赏。但总的来看，由于量刑失之宽大，所以并不能起到杜绝犯罪的作用，这也导致了后来的官商勾结和铜钱外流现象逐渐加重。综上所述，苏轼在这篇奏议中表现了杰出的政治才能，所以苏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恪尽职守并且具有前瞻性的优秀的朝廷命官。

### 注释

- [1]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2]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3] 曹家齐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 [4] 章深著：《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兼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 [5] 刘馨珺著：《唐宋的关界》，《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论集》（上），台北：元照图书出版公司。
- [6] （宋）张方平著、郑涵点校：《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彭林泉，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专委、高级检察官）

# 再议苏轼葬郏探因

乔建功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苏轼致子由的书信中关于葬地一段话进行阅读和分析研究，提出苏轼之所以葬郏，主要因为这里是他们兄弟二人在困顿无奈中计议已定的族茔。流传已久的“形胜类似峨眉家乡”之说违背历史事实，实不足取。

**关键词** 苏轼 葬郏 再探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苏学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苏轼葬郏探因的目光逐渐转向苏轼致子由书信中关于葬地一段话的论述。这标志着苏轼葬郏探因终于从主观臆测的泥淖中跋涉出来，开始步入实事求是科学的研究轨道。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仅根据这一段话分析苏轼葬郏原因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现已查明，关于苏轼葬郏一事他们兄弟二人曾来往三封书信进行商讨，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苏轼致子由第八简。为便于阅读和分析研究，现将其全文录之如下：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赉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座。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窑一两月，方遣迈去注官，迨去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徇俗也。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

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千万勿念，保爱！保爱！今托师是致此书。

这封信在《苏东坡全集》致子由的尺牍中排位第八，故史学界称之为苏轼致子由第八简。从其开头得知这是回答苏辙，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函。复函中大量篇幅向弟弟陈述不能北上赴许，而将南下常州居住的原因，期间似乎漫不经意间说道，“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勿徇俗也。”这寥寥 37 个字前无因后无果，毫无关联地混迹于烟波浩渺的苏学海洋之中，长期使人不明就里，被人忽略而过。但如果把它和苏轼葬郏联系起来考虑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字资料。

我们不妨把苏辙二月二十二日的书信权称为他们兄弟二人来往的第一封书信，那么苏轼致子由第八简就是第二封信，第三封信应是《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苏辙所说的“公始病，以书嘱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遗憾的是，第一封和第三封书信早已散佚于历史的烟云之中，关于葬地的详细讲述已无从考查。但所幸的是第二封信（致子由第八简）尚存“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勿徇俗也”的答复，第三封信也留下了“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的遗言。能否利用这些尚存的“雪泥鸿爪”，推测复制出苏辙二月二十二日（第一封信）致书哥哥是如何讲述安葬八郎妇黄氏的，无疑成了苏轼葬郏探因的主要瓶颈。不妨一试。

苏轼行文历来惜墨如金，言简意赅。苏轼这寥寥 37 个字是在特定前提条件下，富含逻辑推理的肯定式答复，其中蕴含着大量的信息，需要我们仔细咀嚼和品味。

首先必须弄清一个误解。长期以来有人把“八郎妇能用，吾无不可用也”理解为“八郎妇

能用，我何尝不能用呢！”以此说是苏轼愿意和侄妇同用一块葬地。这是望文生义的毛病。如果这样理解就是苏辙为苏轼一人选择葬地的情况了，就是兄弟二人各领一族葬地了。这样理解于情、于理、于文都说不通。轼、辙二人“对床夜语”的拳拳兄弟之情终生不渝，世所公认，有大量文字可资证明。苏辙岂能为哥哥一人选择墓地？这里的“吾”在古代汉语中可作“我”，也可作“我们”讲，在这里完全有理由理解为“我们”。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为“八郎妇能用，我们何尝不能用呢！”在此基础上，根据葬地这段话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说得相当明白。

其一，葬地有两块可供选择，一块是自家已有的，一块是需花千缗钱再买的。其二，苏辙对自家已有的葬地并不看好，主张暂厝八郎妇于此。另有一地风水甚好，但要价千缗，苏辙拟经济宽裕买下，作为他们兄弟二人的百年归宿之地。其三，苏轼主张八郎妇能用自家已有的葬地，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呢！坚持不必再花钱另买葬地了。另外，从第三封信中的“以书嘱辙曰：

‘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可知，苏辙二月二十二日的书信中已经向苏轼言明，自家已有葬地的地理方位在汝州郏城的嵩山脚下。

根据以上信息推断，苏辙二月二十二日的书信开头肯定是言词恳切地劝兄长来许比邻而居，桑榆老境好有个照应。在讲到如何安葬八郎妇时应是这样叙述的：

死于龙川的八郎妇黄氏去世已近两年，灵柩运回，近日打算安葬之。有人推荐一地，风水甚佳，但要价千缗。欲先葬八郎妇于汝州郏城嵩山脚下的自家田地里。你我都已入奔七的风烛残年，眼见回蜀无望，拟来日经济宽裕买下那块风水佳地，作为你我二人百年之后的归宿之地，进而辟为苏氏族茔。可否，望训示。只有苏辙这样叙述的榫头，才会有苏轼那样回答的卯眼，只有这样才能榫卯相合，文理相通，径情相随。

五月苏轼接到弟弟来信这样的叙述，便立即回信才有“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勿徇俗也”那样的答复。不幸的是苏轼一语成谶，六月就病倒，七月便谢世。病危时“以书嘱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仍是心疼弟弟，重申不要另买葬地。就这样兄弟二人在困顿无奈中为省下千缗钱反复计量，最终苏辙遵从兄长意愿，遂成苏轼葬郏史实，将郏城上瑞里的自家田地辟为苏氏族茔。

需要注意的是，苏轼在回信答复时尚未染疾，兄弟二人都健康如常，尽管苏轼关于葬地的答复中没有提到“族茔”两字，但老年人在健康

正常的情况下，商讨百年之后的归宿之地，实际就是商讨族茔之事。事实上郏城上瑞里的确是苏家流寓在外的族茔。资料证实，所谓苏轼葬郏除了安葬苏轼和闰之夫人外，同时安葬的还有迨妇欧阳氏和八郎妇黄氏。开始这里就是族墓的形式。之后，苏家祖孙五代有文字可考的就有20多人先后埋葬在这里。这里从筹划计议到逐步实施，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名副其实的苏家族茔。

不难看出，苏轼之所以葬郏，主要因为这里是他们兄弟二人在困顿无奈中计议已定的族茔。但有人担心“无奈”两字会给葬地——郏县脸上抹黑，有损于郏县形象。其实堂堂一邦形象，怎能因区区“无奈”两字所损，岂非杞人忧天！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人生的最低谷选择了郏城，郏县的山山水水敞开无私的胸怀，热情地接纳了他们。正像苏辙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祭告嫂嫂说“虽非故乡，亲族不暇，勿畏勿惊”，充分表明了郏县人的淳朴和善良。常言道“患难之交贵似金”。郏县人民视三苏坟为“传家宝”，细心呵护，爱戴有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千百年来历经沧桑，此情此意比金子还贵重，比白玉还纯洁，同那子虚乌有的“形胜类似峨眉家乡”之说相比，岂不是要惆怅得多、圣洁得多吗？殊不知，流传已久的“形胜类似峨眉家乡”之说非但不能使人信服，还时常遭人诟病，难以自圆其说，使人感觉虚假和失望，更重要的是，此说违背历史事实，曲解坡翁之意，明显有贬低苏东坡“乐不思蜀”之嫌，实不足取。悠悠千载，白云苍狗，历史终归是历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我们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共同找回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乔建功，河南郏县财政局退休干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 苏东坡与荆楚民歌的情缘和嬗变

饶学刚

**内容提要** 苏东坡从小就对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与楚文化、楚风、《诗经·南风》、屈原民歌体“楚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早就接触了竹枝歌、下里巴人、鸡鸣歌、四面楚歌、扬歌、渔父词、猪肉歌、回文诗等荆楚民歌，并进行了研究和仿作。从中可以看到荆楚民歌对他创作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 苏东坡 荆楚民歌 创作影响

苏东坡从小就沐浴在民间文化的海洋里。乳母任采莲、保姆杨金蝉、道士张易简、老尼朱姥姥，都是他学习民歌和民间故事的启蒙老师。尔后读书、做官、流放，下到州县，过问农事，祭祀求雨，参与民间节日歌舞会和花会，与农民、樵夫、渔翁、郎中、和尚、道士、乞丐、民歌手、说唱艺人结为知音，写作了不少时俗诗文，如青词、歌词、教坊词（乐语）、祭祀乐歌、释教赞偈（佛经讲唱文学）等。尤其对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他24岁守孝返京路过忠州时，听唱、研究和创作《竹枝歌》；36岁任杭州通判时，学唱并写作吴越儿歌《陌上花》；45岁贬黄州时，考查当地“鸡鸣歌”，编写民歌体《猪肉颂》；58岁任定州知府时，参与民间的“秧歌”活动，写作《秧歌》；63岁贬海南时，学唱“黎歌”“调声”，写作《瑞鹧鸪》。

本文侧重探讨一下东坡与荆楚民歌的情缘和嬗变。

楚，古国名，战国七雄之一，亦称荆楚、荆蛮。楚国鼎盛时期，东北到今山东南部，南到今云南北部，西到今川东重庆，西北到今陕西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东北部。现在人们一般限认楚地为湖北、湖南全部，四川、河南、安徽、江西、江苏等部分地区。

东坡与楚文化、楚风有着不解之缘。他自年青时赴京考试与出仕朝廷，回家服丧与返京续任，被贬黄州与改谪汝州，几出几进楚文化摇篮中心区域——巴渝荆襄与鄂东黄州。他钦慕在楚地上出生的人民诗人屈原，“艳色照江水”（《昭君村》）的明妃王昭君；在楚地上建功立业的汉代军事家孙权、周瑜、诸葛亮，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刘禹锡；热爱“雄冠荆楚”（《与滕达道书》）的名城、风物、古迹及其美丽动人的传说、民间歌谣。其间，他特别看重的是：《诗经·南风》与《楚辞·离骚》为荆楚文学的双璧代表作，登上先秦文艺高峰。可谓高

唱楚歌，独领“风骚”。

## 东坡与“竹枝歌”、“下里巴人”

“竹枝歌”，又名“竹枝、竹歌、竹枝子、竹枝词和竹枝曲”。民间群声合唱形式，伴以歌舞、短笛。“‘竹枝’本出巴渝……有和声。七字为句。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又和云‘女儿’。后元和中，刘禹锡谪其地，为新词，更盛焉。”<sup>[1]</sup>

元代陈基《竹枝歌》唱道：“‘竹枝’已听巴人调，桂树仍闻楚客歌。”

为什么“竹枝歌”称为“巴人调”“楚客歌”？

“楚”两次灭土著氏族“巴”后，“巴人”就成为“楚客”了，即“客有歌于郢中者”<sup>[1]</sup>的“客”。“楚客”唱的“竹枝歌”也自然便是“巴人调”“楚客歌”。所以“竹枝歌”便是巴人老巢川东、鄂西和湘西的山歌、俚谣、祭祀歌、田歌。北魏郦道元说：竹枝歌是巴东三峡山歌。<sup>[2]</sup>宋代郭茂倩说：“‘竹枝’本出于巴渝”。<sup>[3]</sup>黄庭坚说：“‘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sup>[4]</sup>马辉青说：“‘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sup>[5]</sup>《达州风俗》载：“巴之风俗……邪巫击鼓以祭祀，男女皆唱‘竹枝歌’”；《夔州府志·开县志》载：“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湖北通志·宜昌志》载：“夷陵元夕连袂唱竹枝歌、采茶歌”。

忠州是“下里巴人”的发祥地，也是“竹枝歌”的发祥地。不难发现“竹枝歌”和“下里巴人”互为滥觞关系或亲缘关系。

鲁迅先生指出：“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流传下来的。”<sup>[6]</sup>最早对民歌“竹枝词”进行“采录”和成功“润色”的“文人”，便是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竹枝九首》序道：“岁正月，余来建平（今重庆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俗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歎，知变风之自

焉。”<sup>[7]</sup>序文讲了仿作“竹枝”时间和地点、儿童演唱情景、“竹枝”风格。既有吴声的韵味，又有《诗经·淇澳》的遗风，还有楚歌的激越。探其源流，则来自《巴歎》谣。自此，刘禹锡成为唐及唐以后文人依据《巴歎》民谣，效仿屈原，写作民间“竹枝歌”的推手。

宋神宗嘉祐四年（1059）冬，东坡守孝返京路过忠州时，看到民间“破甑蒸山麦，长歌唱‘竹枝’”（《白帝庙》），突发创作灵感，写作《竹枝歌》，推出了“竹枝歌，本楚声”的新观点。

《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者之所见有足怨者与？夫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此亦楚人之意相传而然者。且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固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故特缘楚人畴昔之意，为一篇九章，以补其所未道者。

……

水滨击鼓（竹枝）何喧阗（女儿），  
相将扣水（竹枝）求屈原（女儿）。  
屈原已死（竹枝）今千载（女儿），  
满船哀唱（竹枝）似当年（女儿）。<sup>(8) 24</sup>

东坡为什么说“竹枝歌，本楚声”？

东坡在忠州写《竹枝歌》，即在楚地咏史怀古。序文说“竹枝歌”是缘于楚人纪念娥皇、女英，哀悼屈原，思念怀王，怜惜项羽。咏的是楚地、楚人、楚事、楚物、楚俗、楚情、楚意。自然，“竹枝歌”就属于“楚声”了。难怪苏辙说“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sup>[9]</sup>难怪黄伯思说“竹枝歌”也可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sup>[10]</sup>难怪刘尚荣说：“不料两百多年后，巴语变成楚言，‘竹枝’近乎荆楚小调了”<sup>[11]</sup>。

### 东坡与“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源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sup>[12]</sup>

嘉祐四年（1059）冬，东坡守孝返京路过多发历史事件的三峡荆襄，面对历史陈迹无限感慨。对楚汉相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做过评价，并写进《竹枝歌》里。

三户亡秦信不虚，一朝兵起尽欢呼。

当时项羽年最少，提剑本是耕田夫。

横行天下竟何事，弃马乌江马垂涕。  
项王已死无故人，首入汉庭身委地。

富贵荣华岂足多，至今惟有冢嵯峨。<sup>(8) 25~26</sup>  
故国凄凉人事改，楚乡千古为悲歌。

东坡忆说当年楚国虽弱，但有暴力灭秦信心。尽管项羽是凡夫俗子，但他正值风华正茂。谁料他英雄一时，

终丧乌江。富贵荣华人生消逝，仅留坟冢，“故国凄凉人事改”。原因何在？“楚乡千年为悲歌”——“四面楚歌”。

楚汉相争时，项羽和刘邦就为争夺帝位，进行长达四年的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率领汉军将项羽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沱河北岸）。为了瓦解项羽的军心，他搞了个“四面楚歌”计，让楚地士兵齐声大唱楚歌。项羽自知大势已去，在突围前夕，不得不和爱妾虞姬决别，悲哀地唱起《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sup>[12]</sup> 虞姬随之唱起《和垓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sup>[12]</sup>项羽这位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竟也发出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哀叹，演出一曲令人肝肠寸裂的“霸王别姬”悲剧。

熙宁四年（1071），东坡赴杭州通判任，游览安徽濠州定远二龙乡，凭吊虞姬墓。只见残阳伴美人孤坟，却不见当年西楚霸王豪气，无限伤感，写下《濠州七绝·虞姬墓》：

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

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郑荣系项羽忠臣）<sup>(8) 287</sup>

“楚乡千古为悲歌”——“四面楚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歌？东汉学者应劭说：“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sup>[13]</sup>“鸡鸣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歌？东坡先生说“鸡鸣歌”，“土人谓之山歌”。（《书鸡鸣歌》）

首位考定“四面楚歌”者是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作家蔡东藩。他叙述了“四面楚歌”的产生过程：“究竟这歌声从何而来？乃是汉营中张子房（刘邦的军师张良），编出一曲楚歌，教军士至楚营旁，四面唱和，无句不哀，无字不惨，激动一班楚兵，怀念乡关，陆续散去。”描绘了“四面楚歌”的声韵：“旋复有一片歌音，递响进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仿佛九皋鹤唳，四野鸿哀。”<sup>[14]</sup>其“四面楚歌”内容是：

九月秋凉兮四野飞霜，日月征战兮终归刘邦。  
白发老母兮盼断肝肠，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  
弟兄想见兮跺足拭掌，姐妹思念兮雨泪千行。  
故交好友兮登门看望，窗兄窗弟兮问短问长。  
一旦交兵兮枪尖而亡，骨肉为泥兮同战沙场。  
何不思故兮各奔家乡，居家团圆兮永得安康。

### 东坡与鸡鸣歌

元丰三年（1080）二月，45岁的东坡，受谤被贬，来到楚文化的腹地鄂东黄州。第二年二三月间，农事始作。他见到当地群聚讴歌的农事气象，听到婉转如鸡鸣的田歌，倍感亲切。即景寻源生发，写下《书鸡鸣歌》，推出“鸡鸣歌”是“山歌”的新见解。

余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反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鄙野耳。《汉官仪》：“宫中不畜鸡，汝南出长鸣鸡，卫士候朱雀门外，专传鸡鸣。”又应劭曰：“今《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曰：“后汉固始、鲖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颜师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说，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sup>[15]2089</sup>

“鸡鸣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山歌”呢？

东坡说“鸡鸣歌”与庙堂的祭祀之歌相似。人们祭祀天地、神祇和祖先，靠管理漏刻（时间）的“宫人”（亦称“鸡人”、“鸡鸣卫士”）传报旨意。庙堂长达几重，多人接报，不得不拖高音，前呼后应，如鸡鸣尔，造成庄重威严之势。他还引用应劭、《汉官仪》、《晋太康地道记》等的论述为证。宋代，“鸡鸣歌”回到民间，成为山歌。

笔者沿着东坡的思路轨迹，进一步考证了山歌“鸡鸣歌”实为江南山歌中的“薅草山歌”、鄂东畈腔——田歌（秧歌）；从而首次推出山歌“鸡鸣歌”一类田歌（秧歌）之源流：《诗经》上所载西周时期的情恋之歌“鸡鸣歌”——汉魏乐府“相和歌”“鸡鸣歌”——宋代山歌“鸡鸣歌”——当今田歌（秧歌）“鸡鸣歌”。同时，我又沿着东坡考证荆楚“竹枝歌”、“鸡鸣歌”的轨迹，大胆推出荆楚民歌源流之主脉：楚先民原始歌——《诗经》南风歌——屈原“楚辞”——汉魏乐府民歌“相和歌”“楚歌”——南朝乐府民歌“西曲歌”——唐宋时期“竹枝歌”、“鸡鸣歌”——今日荆楚山歌、渔歌和情歌。

今天湖北团风、英山、罗田的畈腔（高腔山歌），浠水的“哦嗬腔”就是宋代“鸡鸣歌”的遗风。

### 东坡与《炖肉歌》（《猪肉颂》）

元丰五年四月，黄州春夏田间，遍地麦黄。为了庆贺这个好年岁，平日和东坡交往、帮助耕种的农家，邀请他去喝酒。他顺便学会了一种烹调猪肉的技术。人们竞相仿制，并戏称为“东坡肉”。东坡还仿效民歌作了《猪肉颂》：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sup>[15]597</sup>

在炖肉、写《炖肉歌》之前，东坡经历了政治、生活、生死的大考验。身处逆境，仍吃得好、睡得香，乐观、风趣、幽默，真是一位乐天派。他还从平淡的炖肉中体味出人生的精彩。做事如同炖猪肉，要精益求精，善待时间；要物美价廉，贵在自美，好在自适。

这首民歌体诗，俗得出奇，充满了农家风、田土味，逼真地反映出东坡那幅“无荣无辱无官守，得净得闲得

自由”<sup>[16]</sup>的平民形象。他不愧为一位运用民间口语创作的好歌手。

### 荆楚民歌对东坡文艺创作的影响

无论在荆州，还是在黄州，东坡接触了荆楚民歌，诸如山歌、小调、畈腔、儿歌、渔歌、宗教歌。具体说来，他接触了竹枝歌、巴人歌、鸡鸣歌、扬歌、渔父词、猪肉歌、回文诗等。他善于吸取民间歌谣的美好思想，敏捷想象力，纯真群众口语，自由活泼表现形式，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把某些诗词改造成为通俗、明快、昂扬的民歌体，大大扩展了诗词的内容与境界。如，有小调风味的《竹枝歌》，四季调风味的《四时词》，盘歌风味的《琴颂》，山歌风味的《东坡羹颂》，儿歌风味的《油水颂》，童话风味的《五禽言》，张打油风味的《食豆粥颂》，顺口溜风味的《猪肉颂》，绕口令风味的《於潜僧绿筠轩》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鲁迅先生指出：“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sup>[17]</sup>

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至荆州之前，东坡作的散文诗《屈原庙赋》，注意运用屈原民歌体“楚辞”的句式，将“兮”这一富有南方语言特点的语助词嵌进句中。把“兮”改为今日的“啊”唱起来，则有高远空旷的呼唤效果。

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sup>[15]2</sup>

嘉祐五年（1060）正月，东坡自荊州赴京师途中作的《息壤诗》，再现了楚人祖先祝融的“息壤”社会生活，注意运用了《诗经·南风》四言句式。

帝息此壤，以藩幽台。有神司之，随取而培。帝敕下民，无敢或开。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帝茫不知，谁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无是坟者，谁取谁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sup>[8]59</sup>

元丰三年（1080）五月，东坡作的《皂罗特髻》词，注意运用民歌的词语反复重叠的手法。7次反复重叠运用“采菱拾翠”，突出强化东坡对歌女采菱、拾翠的思念、赞美之情。堪与“采莲子”的“举棹”、“年少”，“竹枝”的“竹枝”、“女儿”类比。

采菱拾翠，算似此佳名，阿谁消得。采菱拾翠，称使君知客。千金买、采菱拾翠，更罗袖、满把珍珠结。采菱拾翠，正髻鬟初合。真个采菱拾翠，但深怜轻拍。一双手采菱拾翠，绣衾下抱著俱香滑。采菱拾翠，待到京寻覓。<sup>[18]817</sup>

（下转第50页）

# 宋代赣南的橘与茶

李云彪

**内容提要** 苏轼曾两次游历赣南，遗留 38 首诗。本文通过研读这些作品发现诗中提到的“千头橘”和“蕉坑”茶，对于研究宋代赣南橘与茶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苏轼 赣南 橘与茶 意义

苏轼曾两次游历赣南，虽然时间短暂（三个多月），但题诗寄慨，遗留 38 首诗。<sup>(1)</sup> 其中，《留题显圣寺》是苏轼于 1101 年 1 月过南安军南康县显圣寺时所作，全诗如下：

渺渺疏林集晚鸦，孤村烟火梵王家。  
幽人自种千头橘，远客来寻百结花。  
浮石已干霜后水，蕉坑闲试雨前茶。  
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sup>(2) 2417</sup>

诗中提到的“千头橘”和“蕉坑”茶，对于研究宋代赣南橘与茶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 一、橘子

在早期的史料中，就有赣南柑橘的记载。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道：“南康郡南东望山，有三人入山，……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饱。”<sup>(3) 413</sup> 南朝宋刘敬叔在《异苑》中也记载道：“南康归美山石城内，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实，任意取足。”<sup>(4) 605</sup> 这反映出赣南种植柑橘具有悠久的历史。

宋代，赣南是重要的橘子产地。苏轼两次路过赣南，对当地橘子的种植情况有所了解。除《留题显圣寺》外，苏轼还有二首诗提及赣南的橘子。一首为《赠王子直秀才》：

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  
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  
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  
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sup>(2) 2118</sup>

“王子直秀才”为王原，字子直，号鹤田山人，赣县人。苏轼南贬过虔州时，王原与郡人赖仙之、王正彦“并在苏门，相与无间”<sup>(5)</sup><sup>419</sup>。据《东坡志林》记载<sup>(6) 22</sup>，绍圣二年（1095）一月，王原访苏轼于惠州合江行馆，留七十日而去。三月末，当王原启程回虔州时，苏轼作

《赠王子直秀才》、其子苏过作《赠王子直》相赠。1101 年 3 月，苏轼坐船北归，与王原相逢于赣江上。当时，王原正好送苏辙北归而返，这令苏轼十分感动，作诗留别：“米尽无人典破裘，送行万里一邹游。解舟又欲携君去，归舍聊须与妇谋。闻道年来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头。剩买山田添鹤口，庙堂新拜富民侯。”（《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sup>(2) 2448</sup> 由此可知，苏轼与王原的交情非浅，所以用“橘千头”来形容王原的居住环境，应该比较可信。

另一首为《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

大邦安静治，小院得闲游。  
赣水雨已涨，濂泉春未流。  
同烹贡茗雪，一洗瘴茅秋。  
秋思生尊榼，寒衣侍橘洲。  
扬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楼。  
老景无多日，归心梦几州。  
敢因逃酒去，端为和诗留。  
旧篋藏新语，清风自满舟。<sup>(2) 2429~2430</sup>

据《苏轼年谱》记载，1101 年，“虔守霍大夫”为霍汉英，字子俟。<sup>(7) 1378</sup> 但是，据《宋两江郡守易替考》记载，1101 年任虔州知州的是鲁伯能，而霍汉英任虔州知州则是在绍兴十八年（1148）至绍兴十九年。<sup>(8) 377、382</sup> 两处记载不相一致，存疑待考。虽然“虔守霍大夫”是谁存在争议，但并不影响该诗对赣南橘子种植的认识。在诗中，苏轼用“橘洲”来比拟赣南，虽然有点夸张，但从侧面反映出宋代赣南种植橘子比较普遍。对此，有学者指出，柑橘是宋时赣南“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sup>(9) 101</sup>。

## 二、茶叶

在《留题显圣寺》和《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两首诗中，分别提到了当时赣南的两种茶，一种叫“蕉坑”（亦称蕉坑）茶，另一种叫“贡茗雪”。史籍中，关于“贡茗雪”的记载缺乏，但关于“蕉坑”茶的记载较多。在苏轼的影响下，蕉坑茶始见重于时，

“焦坑从此贵新茶”。<sup>(10) 16801</sup> 关于焦坑茶的口感，据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焦坑’产庾岭下，味苦硬，久方回甘。”同时，周辉对焦坑茶的评价不高，“后屡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为重。‘包裹钻权幸’，亦岂能望‘建溪’之胜！”<sup>(11) 152~153</sup> 其实，周辉对焦坑茶的评价比较中肯，因为宋代赣南茶叶的整体品质不高。

台湾学者黄致茵在《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一书中，论述了唐代江西产茶的情况：“（江西）几乎全区都产茶，唯虔州、信州无”。<sup>(12) 123</sup> 唐以降宋，赣南不产茶的格局开始改观，产地有瑞金、赣县、大庾、南康和上犹。<sup>(13) 5316</sup> 不过，北宋时期赣南制茶技术落后，当地的买茶价和卖茶价在江西都是最低的（见表一和表二）。

表一：江南西路各州军的买茶价<sup>(14) 293</sup>

地名	买茶价
临江军	片茶每斤 198 文；散茶 13 文
袁州	片茶、绿英号每斤 187 文；玉津号 143 文；金片 110 文
兴国军	片茶不及号每斤 60 文 5 分；两府号 45 文；散茶 14 文 6 分
抚州	散茶每斤 29 文
洪州	散茶上号每斤 19 文 8 分，中号 18 文 7 分，下号 16 文 5 分
筠州	散茶每斤 16 文 5 分
建昌军	散茶每斤 12 文足
虔州	片茶每斤 8 文
南安军	散茶每斤 3 文

（注：（1）无吉州的买茶价。（2）《宋会要辑稿补编》和《宋会要辑稿》均写“虔州”为“处州”；写“建昌军”为“建国军”，疑误刊。（4）关于兴国军的买茶价，《宋会要辑稿》记作“兴国军片茶不及号每斤六十五文”。）

表二：江南西路各州军的卖茶价<sup>(13) 5313</sup>

地名	茶价
抚州	散茶每斤 39 文
袁州	退茶每斤 38 文足；茗子（每斤）29 文足；第一等 28 文足；第二等、第三等并（每斤）23 文足
临江军	散茶每斤 38 文足
兴国军	散茶下号每斤 37 文
洪州	散茶下号每斤 35 文
建昌军	散茶每斤 35 文足
筠州	散茶每斤 27 文足
南安军	土产每斤 26 文，又诸州供般者，洪州下号粗黄、袁州退茶，每斤并 40 文。
虔州	泥片每斤 18 文
吉州	并诸州供般，洪州每斤 35 文足、虔州（每斤）28 文足、袁州（每斤）35 文足、（每斤）粗黄 30 文足

南宋时期，赣南种茶规模逐渐扩大。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志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赣州瑞金和赣县的茶产量为 10400 斤，南安军三县的茶产量为 4150 斤。乾道年间（1165~1173），赣州茶产量为 7400 斤，南安军茶产量为 3500 斤。<sup>(13) 5316~5318</sup> 在史籍中，有其它地区茶产量的记载可供对比。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志记载，江西其它州军茶产量如下：隆兴府 2819425 斤、江州 1465250 斤、袁州 90683 斤 2 两、抚州 21726 斤 12 两 4 钱、吉州 10780 斤、建昌军 9580 斤、筠州 8316 斤、临江军 6603 斤。可见，江西总茶产量为 4632550 斤 14 两 4 钱，而赣南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另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都卖茶岁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额钱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其中，嘉祐六年（1061），“无为军租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受纳潭、筠、袁、池、饶、建、歙、江、洪州，南康、兴国军片散茶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额钱五十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受纳潭、袁、池、饶、歙、建、抚、筠、宣、江、吉、洪州，兴国、临江、南康军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sup>(15) 445</sup> 对以上几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虽然赣南种茶规模在宋代逐渐扩大，但茶产量少。

不过，有些学者提出宋时虔州茶“居首”的观点。<sup>(16)</sup> 究其出处，来自于《宋史·食货志》的相关记载：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其出虔州、袁州、饶州、池州、光州、歙州、岳州、辰州、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sup>(17) 4477</sup>

虽然在片茶产地中，“虔（州）”是首先提出来的，但由此就认为虔州片茶在宋代“居首”则是片面的。第一，如前文所述，赣南的买茶价、卖茶价和茶产量在江西都是最低的。第二，关于宋代片茶的茶价，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sup>(17) 4478</sup> 相对于全国片茶茶价，虔州片茶每斤 8 文、南安军散茶每斤 3 文，赣南片茶茶价是非常低廉的。正是因为茶价低廉，所以赣南在宋代没有具体的茶额，“只纳折税茶，充本处食茶出卖”。<sup>(13) 5310</sup>

虽然赣南茶叶的品质整体不高，但当地的茶磨却是非常有名。茶磨是宋人饮茶的必备工

具，赣南盛产茶磨，其良品出自小逻村的“掌中金”。据南宋庄绰《鸡肋编》记载，小逻村在上犹县北70里的石门保，此地坚石堪作茶磨，其良品“须石出水中，色如角者为上”，佳者号“掌中金”，“价直五千足”。用掌中金磨茶，“四周皆匀如雪片，齿虽久更开断”。距小逻村东南三十里有个叫童子保大塘村的地方也产茶磨，“其石亦可用”，但比掌中金稍逊一筹。<sup>[18]</sup><sup>109</sup>

关于上犹石门的茶磨，《舆地纪胜》亦有记载，“茶磨以石门之石为之，苍口缜密，镌琢得所，以磨盘与轮同璞者为佳。其最，谓之舀石，犹砚之旧坑也。脉红如线，极鲜明不过三两线，今亦难得。土人又以白脉者为银线，黄脉者为金线云。”<sup>[19]</sup><sup>1539</sup>

###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曾两次游历赣南，对赣南社会比较了解。苏轼有三首诗提及赣南的橘子，并用“橘洲”来比拟赣南，这反映出宋代赣南种植橘子比较普遍。同时，虽然在苏轼的影响下，焦坑茶始见重于时，但是宋代赣南的茶叶整体品质不高，不仅产量少，而且价钱低廉。

### 注释

- [1] 李云彪：《苏轼游历赣南时间考》，载《苏轼研究》2014年第1期。
- [2]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3] （晋）干宝撰：《搜神记》卷十七。转引自王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4] （南朝·宋）刘敬叔撰：《异苑》卷二。转引自王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5] 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志》，1988年。
- [6] （宋）苏轼撰：《东坡志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7]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 [8] 李之亮撰：《宋两江郡守易替考》，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
- [9] 许怀林著：《江西通史·北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 [10] （宋）王庭珪：《次韵刘升卿惠焦坑寺茶用东坡韵》。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二五册卷一四六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11] （宋）周辉撰：《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 [12] 黄政茵著：《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年。

[1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4] 此表据《宋会要辑稿补编》制成，见（清）徐松辑；陈智超整理：《宋会要辑稿补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或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312页。

[15] （宋）沈括撰、胡道静等点校：《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6] 李海根在《赣州古城》一文中提出：“北宋产名茶的州军有十州一府二军，虔州居首。”谢万陆在《千年风流》一书中提出：“唐时，赣南属县便大都已开始种茶，到宋则蔚为大观，至明清更相继涌现出一批名茶。”见赣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赣州》，1994年8月第1版，第4页。谢万陆著：《千年风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17]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8]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9]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第三十六《江南西路·南安军·景物》，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李云彪，赣南师范学院科技学院文法系助教、四川大学硕士）

# 苏迈安葬在宿州萧县的缘由考辨

王龙海

**内容提要** 本文经考辨，纠正了安徽眉山堂《苏氏族谱》和历代传言的错误，证明了苏迈埋葬在萧山县五眼泉的原因，不是因为原配吕氏（吕陶的女儿），而是因为继室石氏（石昌言的女儿）。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苏、吕、石、黄的家族世交。

**关键词** 苏迈 萧县 缘由 考辨

苏迈是苏轼、王弗的长子，也是苏家唯一出生在眉山纱縠巷三苏祠的后人。1119年，苏迈去世后，并没有埋在四川眉山修文镇的祖坟或土地乡的“三苏坟”（苏洵、程夫人和王弗埋在此），也没有埋到河南平顶山市郏县小峨眉山“三苏坟”，而是埋在了安徽宿州萧县皇藏峪五眼泉（也称无艳泉），确实不合常理。

## 一、苏迈投靠吕陶说不成立

根据刘继增《探觅安徽萧县苏轼长子苏迈墓地》、苏兆龄《苏轼长子葬在徐州城南》等对此的解释是：苏轼当初在徐州任知州前，苏迈和同乡吕陶的女儿成亲，并在徐州城南吕陶家苏家湖（当时属徐州管辖）生活。后来年迈退休，来萧县投靠隐居的丈人吕陶。因此苏迈死后，就埋葬在这里了。其实，吕陶从未在萧县隐居过，苏迈致仕后去投靠的是另有他人。主要依据有四个：

一是吕陶并未在萧县工作、居住过。吕陶（1028~1104）是仁宗皇祐进士，历任铜梁令、寿阳令、太原府判官。神宗熙宁三年（1070）举制科后，任蜀州通判、彭州知州。因反对朝廷榷茶，被贬监怀安商税。哲宗即位后，先知广安军，接着召为司门郎中、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元祐二年（1087），因洛蜀党争，出为梓州、成都路转运副使。元祐七年，调进汴京连升三级，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亲政后，接连被贬，从知陈州，到徙河阳、潞州。绍圣三年（1096）被列入元祐党籍，近70岁的吕陶再贬为提举潭州南岳庙。徽宗即位

后，境况略略好转，被调到家乡附近梓州任知州。崇宁元年（1102），吕陶退休，这年他满74岁，再也没有出过川，两年后在四川去世。因此说他退休后隐居萧县是错误的。

二是苏迈退休后不可能再去投奔吕陶。苏迈娶亲吕氏，在熙宁十年（1077）二月。苏轼、苏辙按例换届回京改派，但是新党惧怕贬官各地的大员们回京乱局，临时下令不准进城。于是苏轼、苏辙等人住在城外范镇的东斋（又叫东园）。

这年苏迈十九岁，学业也小有成就，长辈们的评价都不错。大家考虑起他的婚事，殿中侍御史吕陶和苏轼、范镇、张方平等私交好、政见合，而且同为蜀中老乡，都是坚决反对新党变法的。他刚好有个女儿待字闺中，相貌品行都不错。三月，苏轼就正式提笔向吕陶写信，代儿子求婚。吕陶对此当然满意，同意了两家结亲。

苏轼不久接到朝廷的新任命，四月到徐州任上。苏迈婚后携妻到徐州，和父母住在一起<sup>(1)</sup>。

次年（1078）八月，吕夫人生产，苏轼为孙子取名“瞻”<sup>(2)</sup>。1079年苏轼在徐州任满后，带着苏迈又离开了徐州。

1082年，吕氏在黄州去世。苏迈和当年的苏轼一样，自己带孩子。20年后，到1102年，苏迈把父亲苏轼埋在郏县，就在汝州（今平顶山市）守制，不可能去四川投靠吕陶。1104年苏迈除制，这时吕陶也在四川去世，所谓其“隐居萧县”没有时间条件。苏迈退休是在政和二年（1112），这时吕陶去世十多年了，苏迈不可能去四川投靠他的后人。

三是政治因素不容许苏、吕两家再次靠近。苏轼在元祐年间被当做蜀党的首领，倍受洛党、朔党、新党三党的攻击，吕陶是蜀党的二号人物，日子也不好过。在元祐党祸中，苏轼和吕陶同入党籍，连子孙也“永不任用”。吕陶、苏迈作为官场中被迫害的人物，他们是不会住到一起，给对手口实的。

四是苏迈投奔吕陶乃是误传。既然吕陶从未到萧县居住，苏迈也没有去投靠过他，那么这个说法又从哪里来的呢？笔者分析，主要出处是两个：熙宁年间苏迈曾在徐州城南的苏家湖居住，而萧县皇藏峪离徐州城南只有几十公里；萧县苏迈墓有史载、有实物证明，而且附近至今还有苏姓的村庄和大批苏姓后裔。因此，安徽眉山堂的苏家后人在修《苏氏世家》时，就很自然地推定：“政和三年（1113），55岁苏迈在苏家湖，常携孙到皇藏峪龙岗泉岳父吕陶隐居处居住。至1119年己亥宋徽宗宣和元年三月十五日，苏迈卒于龙岗泉，终年六十一岁。遵苏迈遗愿，葬徐州城南小龙岗东无艳泉主穴龙头之上。”而这一说法被后人一再引用，以至于成了定论。

## 二、苏迈投奔的是石昌言后人

眉山苏家和石家、程家世交颇深。当年苏序（苏轼的爷爷、苏洵的父亲）和石幼安（康伯）的爷爷（石昌言的父亲）、程文应（程夫人的父亲）等关系亲密，同为眉山官宦家庭，号称“三老”。苏涣和石昌言、程濬为同窗好友，都中了进士。三家又互为姻亲，苏洵的姐姐嫁给了石昌言的弟弟石扬言，程夫人嫁给苏洵。苏轼到汴京考进士时，也多得石昌言及其好友梅尧臣、蔡襄、司马光、范镇等的帮助。苏迈晚年定居地宿州，投靠的正是继室石氏的娘家。

苏迈和石氏结婚时间，是苏轼贬官到汝州的路上。苏轼拖家带口，从黄州出发，同时把苏迈送到饶州德兴县去任县尉，苏轼和儿子在湖口告别。苏轼一路探亲访友，来到常州宜兴丁蜀镇，买田买房准备安家。1084年10月2日，苏轼坐船启程从水路到汝州任职。12月24日，到了泗州，苏轼再次上表请求定居常州。

几天后，苏轼一行到达宿州，寄居在好友石康伯家，并在宿州过完了春节。苏轼写了《南乡子·宿州上元》，看来心情还可以。苏迈的原配吕氏去世后，苏迈一直未娶。两家一合计，同意结亲。元丰八年（1085）正月，苏迈从德兴县辞职，来宿州完婚。

宿州位于中原腹地，漕运发达，交通便利，石昌言曾任宿州知州，他孙子石夷庚（字坦夫）也任过宿州度支，因此安家在这里是很好的选择。石昌言有两个儿子，长子石令伯曾任岳州平原县主簿，小儿子石康伯没有做官，父亲去世后，他就离开京城，定居在宿州。

石康伯父子喜好收藏字画，当然也收藏有文同、王诜、苏轼等当代大家的许多书画。苏

轼在黄州时，康伯来信请他为自己毕生收集的“石氏画苑”作序。苏轼不顾罪官的身份，破例给他写了《石氏画苑记》。

1103年，苏迈守制完后，并没有居住在宿州，也没有住在徐州苏家湖的记载，应该是到了宜兴丁蜀镇。因为二弟苏过在颍州定居，可以照看父母汝州的坟茔，宜兴的田产就只有他来打理了。

苏迈的仕途很不顺，第一个职务是饶州德兴县县尉，不过因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随后来到饶州任知州，为免被暗算，就借口结婚离职。1086年后，相继任开封府酸枣县令、雄州防御推官、河间县令。哲宗绍圣后，受元祐党祸连累，被罢官。直到1107年，苏迈才担任秀州嘉禾令，1112年后就不再工作了。

退休后的苏迈先是去祭拜了父母的坟墓，看望了苏辙、苏过，然后和石氏到宿州探亲。苏迈去世后，就近埋在萧县皇藏峪五眼泉。

因此苏迈年老退隐宿州，和吕陶家是没有关系的。

## 三、石家和黄庭坚等苏门子弟关系密切

“石氏画苑”在当时名声响亮，自然吸引了许多艺术家的垂爱。除了苏家子弟，石家的人还和陈师道、黄庭坚、米芾等往来频繁，《石氏画苑》，其中明确称赞：“苑中最爱文与苏，情亲不独生同间。”

石康伯1087年去世后，儿子石夷庚继承了画苑，他曾在亳州、宿州等地做官，也是书画收藏家。元祐二年，痴迷书法、奇石的米芾得知画苑有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后，就用六幅张萱的画、徐浩的两幅字帖与他交换。

黄庭坚与石夷庚有深交，他在熙宁二年（1069）就给石夷庚和诗《次韵坦夫见惠长句》<sup>(3)</sup>。宦途往来间，黄庭坚必定会抽空去宿州的石氏画苑，既探访故人，也借鉴、学习名家书画。黄庭坚贬官四川宜宾（古称戎州）时，当时泸州江安县令石谅是石夷庚的堂弟，同为石扬休后人。黄庭坚的儿子和石谅的女儿成了亲。因为这层关系，石谅族侄石长卿还专门到戎州向庭坚求学，得到黄庭坚的器重。元符三年六月，黄庭坚作诗《送石长卿太学秋补》。

上海图书馆发现的《凤墅帖》中的就有黄庭坚为儿子黄相谈婚论嫁的《介卿帖》：“介卿少公十七弟：寄惠虢石研屏、笔研匣皆雅物，愧无以为报也。庭坚比为小子相定娶江安知县石谅通直之女，附庙后成纳，便携之归耳。石君有文学，能官，与人有始终，家世在眉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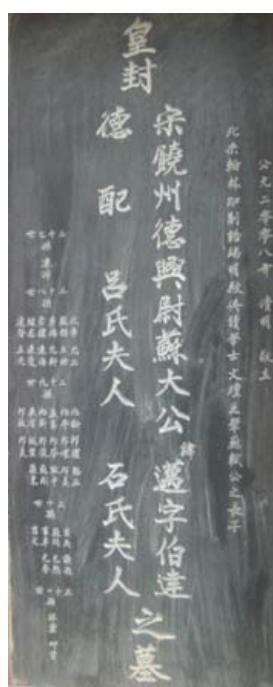
君无眉体者也。公见爱如兄弟，故详及耳。庭坚顿首。鲜自源不忧饥寒，而忧斋堂之未基，此所谓措大者耶？”“十二月发戎州，过江安，为石信道挽留，遂作岁于此。石谅……女嫁山谷之子相，是岁十二月成亲。”（《与杜拙翁书》）

苏辙还来信，关心黄相的婚事。这时黄相已结婚，所以黄庭坚就回复《与苏子由书》：“小子娶石谅之女。蒙齿记，感激！感激！”

元符三年（1100）夏天，在结束贬官后，黄庭坚利用长江涨洪，不能行船的空隙，到眉州探亲，也看望了眉州苏家、王（弗）家、石家等许多友人。在石家他见到了珍贵的《自叙帖》，更为意外的是，还见到苏东坡在黄州写的《寒食诗帖》，并在其后题跋，此贴作为苏黄唯一墨宝而流传至今。

黄庭坚“东归”是在岁尾年头。从《诸上座帖》跋“元符三年十二月癸卯，将发戎州。江南黄庭坚自僰道蒙恩放还，元符三年十二月道出江安，江安宰石信道以亲亲见留作岁”<sup>〔4〕</sup>。其间，“建中初，鲁直自僰道还，过邑，宰石谅同游此亭（偶住亭，在江安县之北），书《琴操》，后改渡泸亭。”<sup>〔5〕</sup>

黄相和夫人石氏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分别取名黔、然、栖、醮（一作照）、焘、羔。其中，黄黔字楚老，官司理参军，迁居万载；黄然以祖荫补吏部员外郎，官漳州法曹、四川提刑；其余则无封赠，居修水各地。今天在江西修水的黄庭坚纪念馆，石氏小姐仍然被画家描绘得楚楚动人。



### 注释

〔1〕 传言当时苏轼让苏迈夫妇住在徐州城南泗水（今黄河故道）边的苏家湖，笔者查找资料，没有确凿的记载。徐州城边的这个苏家湖显然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萧县的苏家湖。

〔2〕 “筭”就是竹编的盘子，多用来盛饭、瓜果。以后苏轼、苏辙的孙辈取名，就都选竹字头的字了。

〔3〕 《黄庭坚全集·外集·卷十六》载有该诗：“公才富比沧海官，明珠珊瑚凡几库。惠连宰上麦纤纤，喜公犹得春草句。”

〔4〕 见黄庭坚《泸州中坝葛氏竹林留题》。

〔5〕 见《蜀中名胜记·江安县胜览》。

（王龙海，眉山铝硅产业园区管委会公务员）

# 苏轼省略成语浅谈

向加富

**内容提要** 苏轼成语运用匠心独运，或派生、变体，或规范、创生，或沿用、省略，皆恰到好处。笔者从苏轼全部著作中撷取省略成语 169 条，对其出处、渊源、词义变化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期对苏轼作品中的省略成语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学习苏轼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关键词** 苏轼 省略成语 浅谈

苏轼步入诗坛的时候，他的前辈欧阳修、梅尧臣所倡导的反对西昆派缺乏实际内容、诗风浓艳艰涩的诗体革新运动正在开展。欧、梅“学韩退之”，以文为诗，“学唐人平淡处”，主张平淡。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含蓄和文采上稍显逊色，“平”得没劲，“淡”得无味。苏轼在《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中慨叹：“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他广泛地向前代、前辈学习，与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一起前进；他以横溢的才华，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他以创造性的、丰富的艺术实践，显示了宋诗的力量；他用笔墨抒发情怀、呼风唤雨，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热情和才干书写辉煌篇章，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开创了一代文风。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博大、思想之深刻令人叹为观止，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彪炳千秋于文学之林。

纵观苏轼诗词文赋，伟博古达，行云流水，妙语如珠，姿态横生，极富特色。成语运用更是匠心独运，或派生、变体，或规范、创生，或沿用、省略，皆恰到好处。笔者不揣冒昧，从苏轼诗、词、文、赋和碑、铭、颂、赞、尺牍等全部著作中撷取成语 1800 余条。其中，规范成语 60 条、创生成语 178 条、省略成语 169 条，其余为沿用、变体和派生成语。据笔者所知，沿用和变体成语在目前市售辞书中可以查阅；规范、创生成语，绝大多数无法查阅；省略成语在一般辞书中均未立目，根本查不到。

这些省略成语只有大方之家才能理解，对于初学苏轼诗词的青少年来说，无疑是拦路虎。

苏轼诗词文赋中出现的省略成语有：诗集 128 条、词集 6 条、文集 31 条、赋 4 条，共 169 条。

## 一、二字省略成语

### (一) 词目及出自篇章

傲霜（《赠刘景文》）；抱璞（《梦中作寄朱行中》）；冰玉（《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薄技（《新滩》）；布韦（《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首·一》）；才难（《乞擢用林豫札子》）；蹭蹬（《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昌歈（《仁宗皇帝御飞白记》）；超轶（《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二》）；车尘（《与颍州运使刘昱启》）；晨星（《祭范蜀公文》）；迟暮（《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见寄，次其韵二首·二》）；充闾（《贺陈述古弟章生子》）；出蓝（《与朱康叔二十首·一·四》）；垂顾（《答李端叔十首·七》）；莼鲙（《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莼鲈（《送吕昌朝知嘉州》）；戴星（《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啖蔗（《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刀锯（《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倒屣（《次韵景仁留别》）；低唱（《赵成伯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厄陈（《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恶剧（《白水山佛迹岩》）；鹖荐（《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发握（《次韵景仁留别》）；匪石（《闻潮阳吴子野出家》）；风灯（《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珪璋（《小饮西湖，怀欧阳叔弼兄弟，赠赵景贶、陈履常》）；海蜃（《游径山》）；黄耳（《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故居》）；挥麈（《赠治易僧智周》）；击壤（《集英殿秋宴教坊词致语口号》）；嗟来（《和陶乞食》）；金钗（《满庭芳·香叆雕盘》）；金母（《斋日致语口号》）；金乌（《太皇太后阁六首·一》）；惊俗（《送蔡

冠卿知饶州》); 惊涛 (《念奴娇·赤壁怀古》); 旧游 (《郁孤台》); 卷鞯 (《送宋构朝散知彭州迎侍二亲》); 开张 (《江神子·密州出猎》); 尿驾 (《和陶桃花源》); 苦李 (《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 跨灶 (《与陈季常十六首·十六》); 懈汗 (《答李方叔十七首·十三》); 浪迹 (《老人行》); 饕酒 (《和陶始经曲阿》); 留髡 (《闻李公择饮傅国博家大醉二首·一》); 漏尽 (《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 卢胡 (《石芝》); 履舄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 次子由韵二首·一》); 芒背 (《与司马温公五首·三》); 末学 (《与朱振二首·一》); 木肠 (《次韵滕大夫三首·沉香石》); 木奴 (《忆江南寄纯如五首·二》); 南柯 (《九日次定国韵》); 裳汗 (《与彦正判官一首》); 爬梳 (《次韵子由送蒋夔赴代州学官》); 盘错 (《乞擢用林豫札子》); 泊系 (《与何圣可一首》); 便腹 (《宝山昼睡》); 耆年 (《轼欲以诗易画, 晋卿难之……次前韵, 拜解二诗之意》); 泣玉 (《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 复次韵答之》); 千奴 (《食柑》); 千岁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琴鹤 (《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二首·一》); 清酌 (《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倾城 (《作书寄王晋卿, 忽忆前年寒食北城之游, 走笔为此诗》); 譬咳 (《黄州还回太守毕仲远启》); 穷陋 (《与司马温公五首·三》); 篷篠 (《赠袁陟》); 却扫 (《予昔作〈壶中九华诗〉……乃和前韵以自解云》); 三顾 (《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 二君先以诗见寄, 次其韵二首·二》); 三馀 (《二月十九日, 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 食槐叶冷淘》); 山水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上宾 (《正旦于福宁殿……荐神宗皇帝斋文》); 舐犊 (《思子台赋》); 首丘 (《到惠州谢表》); 水火 (《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 题柱 (《复改科赋》); 涕滂 (《潮州韩文公庙碑》); 铜狄 (《子由将赴南都……既以自解, 且以慰子由云·二》); 刺繁 (《贺孙枢密启》); 韦布 (《石芝》); 五鼎 (《送程建用》); 物化 (《和陶形赠影》); 喜抃 (《与司马温公五首·一》); 相宾 (《孔毅父妻挽词》); 向隅 (《立春日, 病中邀安国, ……二首·一》); 行潦 (《哭刁景纯》); 奄忽 (《答黄鲁直五首·四》); 阳侯 (《飓风赋》); 羊枣 (《屈到嗜芰论》); 一丘 (《辩才老师退居龙井, ……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 一瞬 (《前赤壁赋》); 薏苡 (《次韵和王巩六首·五》); 鹂退 (《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 银钩 (《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 破陈酒戒》); 鱼贯 (《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 鸢肩 (《次天字韵答岑岩起》); 猿鹤 (《郁孤台》); 糟糠 (《梁贾说》); 颓坠 (《和陶东方有一士》); 针毡 (《迁居临皋亭》); 炙手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置锥 (《次

韵晁无咎学士相迎》); 中馈 (《余主簿母挽词》); 属纩 (《陆龙图挽词》)。

## (二) 举例探源

**【抱璞】bào pú** 《梦中作寄朱行中》: “舜不作六器, 谁知贵玙璠? 哀哉楚狂士, 抱璞号空山。”“抱璞”为正体成语“荆山泣玉”的变体, “抱璞荆山”的省作。源自《韩非子·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 玉人曰: ‘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yuè, 古代砍掉脚的酷刑。)其左足。及厉王薨, 武王即位, 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 又曰: ‘石也。’王又以和为诳, 而刖其右足。武王薨, 文王即位, 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荆山)之下, 三日三夜, 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 使人问其故, 曰: ‘天下之刖者多矣, 子奚哭之悲也?’和曰: ‘吾非悲刖也, 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 贞士而名之以诳,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 遂命曰‘和氏之璧’。”“抱璞荆山”唐房玄龄等《晋书》: “明公辅亮皇室, 恢维宇宙, 四门开辟, 英彦鳬藻……而泓抱璞荆山, 未剖和璧。”璞: 含玉的石头。抱璞: 怀抱含玉的石头, 表示贤能之士怀才不遇于世或反遭诬枉。

**【蹭蹬】cèng dèng** 《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 “我生本艰奇, 尘土满釜甑。山禽与野兽, 知我久蹭蹬。”“蹭蹬”为正体成语“蹭蹬终身”的原作, 亦为沿用成语“蹭蹬穷波”。晋木华《海賦》: “或乃蹭蹬穷波, 陆死盐田。李善注: ‘蹭蹬, 失势貌。盐田, 海边也。’后多用来比喻困顿或失意。至清, 陈康祺规范为四字成语。《郎潜纪闻初笔·田文镜恶科目中人》: “先生立朝刚鲠, 其屡起屡蹶, 皆为维持国体, 不独怜才爱士之私心, 虽蹭蹬终身, 未竟其用, 而至今百年论定, 视田(文镜)、李(卫)二公何如也?”蹭蹬: 遭遇挫折。比喻困顿, 失意。“蹭蹬终生”, 指人一生中屡遭挫折, 一直处于困顿失意的境遇中。

**【昌歜】chāng chù** 《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臣官在太常, 职在太史, 于法得书。且以为抱鸟号之弓, 不若藏此笔; 宝曲阜之履, 不若传此书; 考追蠡以论音声, 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 存昌歜以追嗜好, 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昌歜”为“昌歜羊枣”的省略。“昌歜羊枣”由“昌歜”“羊枣”两个典故合成, 为苏轼规范成语。《吕氏春秋·遇合》载: “周文王喜欢吃昌歜。又, 《孟子·尽心下》: ‘曾晳(曾参的父亲)嗜羊枣(君迁子的果实, 俗称羊矢枣、黑枣、软枣)而曾不忍食羊枣。’指人的嗜好古怪, 各人有不同的癖好。与俗语‘香油调苦菜, 各人心头爱’的意思相同。(注:

昌歎，即菖蒲菹，以菖蒲的根茎切成段制成的腌菜或酸菜。菹：腌菜。)

**【鹗荐】** è jiàn 《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宅相开府公，久为苍生起。如何垂老别，冰盘馈苍耳。亲嫌妨鹗荐，相对发微泚。”“鹗荐”为正体成语“鹗膺秋荐”的原作。汉孔融

《荐祢衡表》：“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跞……鵠鸟累伯（《文选》作‘百’，音义均同），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鹗：本指性凶猛的鱼鹰。后以“鹗”比喻才能出众的人。膺：当，承受。秋荐：亦作“秋贡”。“鹗荐”，指举荐人才。后来用“鹗膺秋荐”指举人经地方（唐宋时为州府，明清时为省。）举荐而承应的秋季在京都的选拔考试。

**【挥麈】** huī zhǔ 《赠治易僧智周》：“断弦挂壁知音丧，挥麈空山乱石听。斋罢何须更临水，胸中自有洗心经。”“挥麈”为正体成语“挥麈而谈”的省作。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王夷甫容貌整丽，妙手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又，唐陈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序》：“曾因暇日，得造吾师，每亲挥麈之谈，颇广窥斑之见。”麈尾：驼鹿（俗名四不像）之尾。用为拂尘，因称拂尘为麈尾，省作“麈”。魏晋六朝时，士人喜好玄言，每清淡时挥动麈尾以助谈。后用“挥麈而谈”指悠闲而高雅的谈论。

**【开张】** kāi zhāng 《江神子》（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开张”为正体成语“天骨开张”的省作。晋陈寿《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清河郡内有一骐骥，拘絷后厩历年，去王良、伯乐百八十里，不得骋天骨，起风尘。”又，三国诸葛亮《出师表》：“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至唐，杜甫《天育骠图歌》：“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四字成文为“天骨开张”。天骨：上天赋予的雄伟骨干。多指骏马的躯干。开张：本指开扩，转指恢宏，开阔雄浑。形容骏马姿态雄伟，气度恢弘。后也比喻诗文字画等风格雄健，气势恢弘，这里指心胸开阔，胆气雄壮。

**【尻驾】** kāo jià 《和陶桃花源》：“躬耕任地力，绝学抱天艺。臂鸡有时鸣，尻驾无可税。”“尻驾”为正体成语“尻轮神马”的变体省作。《庄子·大宗师》：“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郭象注：‘浸，渐也，夫体化合变，则无往而不因，无因而不可也。’成玄英疏：‘尻无识而为轮，

神有知而作马，因渐渍而变化，乘轮马以遨游，苟随任以安排，亦于何而不适者也。’”尻：古书上指屁股。驾：指乘车。原意是，以臀部（屁股）为车，以精神为马，任意遨游，后表示随心所欲地神游于无何有之乡，也用来指超脱尘世的精神境界。

**【匏系】** páo xì 《与何圣可一首》：“结发求道，笃老不衰，世间有几人而匏系于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叹不已。”“匏系”为正体成语“匏瓜之系”的省作。《论语·阳货》：“（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何晏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系一处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当东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系滞一处。’刘宝楠正义：‘皇疏（皇侃《论语义疏》）又载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时理务，为人所用，岂得如匏瓜系天而不可食耶？”……今案：‘匏瓜，星名，见《史记·天官书》，此义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当如可食之物，与匏瓜异也。当东西南北者，言人当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匏瓜之系’，表示羁留于一地，不得返乡或升迁。也指羁滞于一方的人，比喻被弃置于闲散之地，不为时所用，也比喻多余而无用之物。

**【山水】** shān shuǐ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雪霜侵鬓发，尘土污冠袂。赖此三尺桐，中有山水意。自从夷夏乱，七丝久已弃。”“山水”为正体成语“高山流水”的紧缩语。《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指以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为内容的琴曲，多用以表示知音、知己难得，也用来比喻乐曲的高妙。

**【物化】** wù huà 《和陶形赠影》：“细察我与汝，相因以成兹。忽然乘物化，岂与生灭期。”“物化”，语出《庄子·刻意》：“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亦为正体成语“奄忽物化”的省略成语。《古诗十九首》：“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李善注：化，谓变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随物而化也。）”奄忽：急遽，倏忽。物化：指死亡。多指突然死去。

## 二、三字省略成语

### （一）词目及出自篇章

拔茅茹（《谢中书舍人启》）；拜下风（《过巴东县不有莱公遗迹》）；笔如椽（《光禄庵二首·一》）；冰玉姿（《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

塘》);长鲸吸(《赠狄崇班季子》);长头儿(《迨砚铭》);乘桴意(《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雕肝肾(《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一》);东家丘(《木山》);遏行云(《减字木兰花·庆姬》);范叔贫(《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赋一篇，示志举》);方外士(《戴道士得四字代作》);腐鼠吓(《和刘道原寄张师民》);个中人(《李顾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贾余勇(《次前韵再送周正孺》(指《送周正孺知东川》));管城颖(《和黄秀才鉴空阁》);广武叹(《甘露寺》);貉一丘(《过岭二首·一》);鹤乘轩(《次韵王郁林》);花信风(《常州太平寺观牡丹》);画蛇足(《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一》);回文锦(《书刘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笔画〉》);喙三尺(《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一》);棘端猴(《次韵王都尉偶得耳疾》);冀北空(《和刘道原见寄》);翦桐戏(《九月十五日迩英讲〈论语〉……又进诗一篇，臣轼诗云》);金石契(《留别叔通、元弼、坦夫》);九回肠(《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决雌雄(《贾谊论》);哭途穷(《寒食雨二首·二》);鲈鱼鲙(《乌夜啼·寄远》);鹿覆蕉(《次韵刘贡父所和韩康公忆持国二首·一》);马牛风(《次韵孙巨源寄涟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见寄五绝·一》);莫予毒(《和王晋卿》);泣牛衣(《追和戊寅岁上元》);秋风客(《过莱州雪后望三山》);畎亩中(《范文正公文集序》);三岁艾(《次韵袁公济谢芎椒》);生髀肉(《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四》);食鸡肋(《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一》);试牛刀(《送欧阳主簿赴官韦城四首·一》);四大空(《代黄檗答子由颂六月三十日》引);通有无(《过云龙山人张天骥》);屠龙手(《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兔三窟(《过岭二首·一》);退飞鶡(《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五车书(《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五侯鲭(《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二》);相濡沫(《和王晋卿》);悬磬室(《子由生日》);彝伦叙(《集英殿春宴教坊词致语》);应故事(《策略五》);雍门弹(《甘露寺》);有余欢(《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占贾鶻(《滕达道挽词二首·二》);终老计(《迁居》);斫轮手(《嘲子由》);总角岁(《崔文学甲携文见过……示志举》);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二》);醉踏歌(《赠梁道人》)。

## (二) 举例探源

**【长鲸吸】cháng jīng xī** 《赠狄崇班季子》：“指呼索酒尝，快作长鲸吸。半酣论刀槊，怒发欲起立。”“长鲸吸”为正体成语“长鲸吸

川”的省略成语。杜甫《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李适之)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鲸吸：像鲸鱼喝水一样。喝酒像鱼喝水一样。形容狂喝纵饮、豪饮，也兼指酒量很大。

**【乘桴意】chéng fú yì**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乘桴意”为正体成语“乘桴浮海”的变体，也作“乘桴浮”。《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乘桴：乘着小筏子。意：意念，意志，意趣。乘着小筏子漂浮的意趣。比喻浪迹湖海，避世高蹈，不混同于世俗。(按：鲁叟，指孔子。)

**【雕肝肾】diāo gān shèn** 《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一》：“诗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知君也厌雕肝肾，分我江南数斛愁。”

“雕肝肾”是正体成语“雕琢肝肾”的省略成语，原或作“雕琢肝肾”。唐韩愈《赠崔立之评事》：“劝君韬养待征招，不用雕琢愁肝肾。”雕：指过分地修饰文字，指穷苦思索，反复琢磨，如同精雕细刻一样。肝肾：心肝、肾脏，借指思维器官。形容写作时穷思苦索，反复锤炼，刻意求工。

**【鹤乘轩】hè chéng xuān** 《次韵王郁林》：“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误辱使君相杖拭，宁闻老鹤更乘轩。”“鹤乘轩”为正体成语“乘轩之鹤”的倒装省作。《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又，唐元稹《授刘悟检校司空幽州节度使制》：“幕吏擅权，挠政行私，亏恩剥下，过为箠楚，妄作威棱。不均飨士之羊，徒养乘轩之鹤。”轩：古代一种有帷幕而前顶较高的车，借指禄位。“鹤乘轩”，比喻滥窃禄位，也比喻窃据禄位而无能为力的人。

**【棘端猴】jí duān hóu** 《次韵王都尉偶得耳疾》：“君知六凿皆为赘，我有一言能决疣。病客巧闻床下蚁，痴人强觑棘端猴。聪明不在根尘里，药饵空为婢仆忧。”“棘端猴”为正体成语“棘端造猴”的省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治工言王曰：‘……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问之，果妄，乃杀之。治人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原意是，在酸枣树枝刺儿的尖端雕刻出猕猴的形象，后用来比喻在无从着手施展其技

巧的困难条件下创造出奇迹，比喻巧夺天工的技艺。也比喻技巧虽高超绝伦却于世毫无补益。亦比喻虚妄不实的事物。

**【翦桐戏】** jiǎn tóng xì 《九月十五日迩英讲〈论语〉……又进诗一篇，臣轼诗云：“绣裳画袞云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戏。日高黄伞下西清，风动槐龙舞交翠。”翦，也作“剪”，“剪桐戏”即“翦桐之戏”。《吕氏春秋·重言》：“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援梧叶”，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作“削桐叶”。汉刘向《说苑·君道》作“剪桐叶”。后来用“剪桐之戏”指帝王把封侯赐爵为儿戏，从而弄假成真，泛喻居上者出于戏言而作不切实际的允诺。

**【泣牛衣】** qì niú yī 《追和戊寅岁上元》：“一龛京口嗟春梦，万炬钱塘忆夜归。合浦卖珠无复有，当年笑我泣牛衣。”“泣牛衣”为正体成语“牛衣对泣”的省作。《汉书·王章传》：“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书上，果下狱死。妻子徙合浦，采珠致产数百万。”牛衣：草或乱麻的编织物，用来给牛御寒或遮雨，意为睡在牛衣中相对哭泣。形容夫妻共同忍受贫困生活的折磨，也泛指家境贫寒、无以为生的窘况。

**【退飞鶠】** tuì fēi yì 《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别君二十载，坐失两鬓青。吾道虽艰难，斯文终典刑。屡作退飞鶠，羞看干死萤。”

“退飞鶠”亦可作“鶠退”。《乔太傅见和复次韵答之》：“未遭甘鶠退，并进耻鱼贯。”“退飞鶠”为正体成语“六鶠退飞”的异体成语。《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农历每月初一）。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鶠退飞，过宋都。”鶠：也作“鶠”，一种善于高飞的水鸟。原意为，鶠鸟高飞，遇风而退，是灾难的先兆。表示显露灾异的征兆，也指局势逆转或陷入失意不利的境地。比喻蒙受灾难和厄运，处境艰危或仕途不利。

**【雍门弹】** yōng mén tán 《甘露寺》：“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古今共一轨，后世徒辛酸。聊兴广武叹，不待雍门弹。”并见《书太

白广武战场诗》：“聊兴广武叹，不待雍门弹。”

“雍门弹”为正体成语“雍门之琴”的省作，原作“雍门鼓琴”。汉刘向《说苑·善说》：“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田）文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夫以秦、楚之强，而报雠于弱薛，譬之犹摩萧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应作‘初’）终，而曲成。孟尝君涕浪汗增歔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弹：弹奏，拨弄（琴弦）。原意为，雍门子周弹奏琴曲，以哀感沦亡的悲音感召规谏而使人警惧痛悔。泛指以弹奏琴曲而发人警悟或引起伤感慨。后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哀伤曲调或言辞。

**【走章台】** zǒu zhāng tái 《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二》：“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走章台”为正体成语“走马章台”的省作。汉班固《汉书·张敞传》：“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章台：原指长安城中一条妓馆密集的街道。意为骑马经过章台街，此指到京城赴任，或做官于京师，后用来泛指冶游、追欢买笑的场所，妓院的代称。

综上，苏轼省略成语主要分布于诗词中，这是因诗词受字数、平仄和韵脚等韵律限制所致。其特点，寄意深远，言简意赅，兴象超迈，遣辞用字精，用典不泥涩。酣畅淋漓地挥毫泼墨于大笔之下，突显出了行云流水之畅达美。似非食人间烟火之语，足见语言大家驾驭文字之功力，值得慢慢咀嚼，细细品味。

（向家富，四川省雅安市退休教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 “文传墨迹留碑上，山列青屏入座中”

徐培富

**内容提要** 苏轼在密州两年，创作诗 126 首、词 18 首、文 62 篇，计 206 篇，平均每 3 天左右就有一个作品问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他在密州的作品入手，探索他在密州创造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 苏轼 密州作品 文化价值

去年是苏轼知密州九百四十年，北宋神宗熙宁七年至九年(1074~1076)，苏轼从杭州通判，来密州任知州，短短两年时间的所思所为，是一般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不曾做到的。他创造了数个第一：第一次出任地方行政首官(太守)；第一次过比较艰苦的生活，食不饱腹，杞菊充饥，环城拾孩；第一次用词悼亡，深情怀念结发妻子；第一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超然思想；第一次高度赞美密州的山川大地；第一次在超然台上过中秋，吟出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达到了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把一大堆头衔加在苏轼身上，他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sup>(1) 9</sup>

但在我看来，苏轼首先应该是个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等几个主要领域都辛勤耕耘，勇于创新，出类拔萃。在密州两年，他创作诗 126 首、词 18 首、文 62 篇，计 206 篇，平均每 3 天左右就有一个作品问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主要从他的作品入手，探索他在密州创造的文化价值。

## 一、祈雨救灾，常山作证，与民休戚与共

祈雨，又叫求雨，原来是指因久旱而求神降雨，祈求农业丰收的巫术活动。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记载，反映了农民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渴望风调雨顺、养家糊口的一种期盼行为，真切地反映了人类“地上没有天上求”的原始朴素思想。

苏轼知密州期间，正赶上严重的蝗灾、旱灾，除了号召百姓抗旱救灾外，他曾多次率领官员与百姓到常山东北角的雩泉祈雨，多数情况还灵验。他在《雩泉记》中描写道：

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临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楼观，彷彿可数。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寝食，无往而不见山者。其神食于斯民，固宜也。东武滨海多风，而沟渎不留，故率常苦旱。祷于兹山，未尝不应。民以其可信而恃，盖有常德者，故谓之常山。熙宁八年春夏旱，轼再祷焉，皆应如响。乃新其庙。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名之曰雩泉(祈雨用的泉)。<sup>(2) 378</sup>

每次祈雨，苏轼都充分准备，撰写祝文，祝文是祭祀鬼神或祖先的文辞。现在能看到的祝文有六篇，包括《祭常山祝文五首》、《祭常山神祝文》。其中，《祭常山祝文五首》<sup>(2) 1917</sup>写于宋熙宁八年(1075)四月，当时苏轼与百姓是如何向神请求的呢？本文是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动之以情，感化神灵。“哀我邦人，遭此凶悍。流殍之余，其命如发。而飞蝗流毒，遗种布野。使其变跃飞腾，则桑柘麦禾，举罹其灾，民其罔有孑遗。”这是用百姓的悲惨处境唤醒神的怜悯心。接着道：“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谓神求无不获，克有常德，以名兹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这是唤醒神的自尊心。二是

明之以理，求神尽责。“洪维上帝，以斯民属于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属于守土之臣。维吏与神，其职惟通。殄民废职，其咎惟均。”(神)若曰：“岁之丰凶在天，非神之所得专。”吏将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则谁任其责矣。”这是恳求神灵尽责。三是晓以利害，为民请命——“若时雨沾洽，蝗不能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这是向神许之以利，但是若灾情加剧，则“神且乏祀”，这是向神答之以害。人与神的对话，同人与人的对话没有多少差别，文中的人与神是平等的。本文内容坚定有力、语言凝重典雅，句子长短不一，语气奔放舒展，带有雄辩色彩，颇能代表苏轼祝文的特色。

现摘录篇幅较短的第三首(篇)，让读者体会一下北宋时密州的祈雨文化。《祭常山祝文五首·三》：

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如行远道，百里一宿。苟无舍馆，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囷簏。麦田未耕，狼顾相目。道之云远，饥肠谁续。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灵应响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获，厥愆在仆。洗心祗载，敢辞屡渎。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飨。<sup>(2)</sup>

1918

在熙宁八年（1075）四月作的《次韵章传道喜雨》，诗题下苏轼自注云：“祷常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饮咸苦。

今年春暖欲生蠚，地上戢戢多于土。<sup>(3)</sup><sup>622</sup>

章传道，名传，闽人。苏轼通守杭州时有诗与之唱和。他年长于苏轼，曾任密州州学教授。熙宁七年（1074），密州一带大旱，蝗灾严重，十二月苏轼上任密州知州，率领百姓抗旱灭蝗。“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补。”

“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苏轼身先士卒，根据灭蝗多少，对百姓实行激励政策。

祈雨成功，心情愉快。“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乐职》几时作？试向诸生选何武。”汉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中和》，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乐职》，谓百官万姓乐得其常道也。苏轼写过许多政治讽刺诗，往往夹杂着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此篇则无，诗人更关注的乃是人民的苦难，悯农之心彰显无遗。

祈雨在现代人看来属于迷信，觉得近似荒唐。但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面对天灾人祸，

地方官与老百姓似乎也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于是祈雨就成为了当时皇帝、官员以天下苍生为念，为百姓谋福的重要活动。

## 二、狩猎明志，祈望重用，愿意为保卫边疆而纵马驰骋

狩猎又叫捕猎、打猎，是狩猎生活的一个重要过程。原始社会的人类为了获取食物，不得不想方设法猎取野兽，以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当农业与畜牧业足以满足人类生活的时候，狩猎活动就有了多方面的意义，苏轼率众人狩猎就属于后者，且看《祭常山回小猎》：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sup>(3)</sup><sup>647</sup>

此诗写于熙宁八年（1075）深秋十月。是年，密州遭逢大旱，苏轼与同僚前往常山祈雨，归程途中，绕道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习射会猎，显示了诗人深埋心底的爱国激情。

这是一道七言律诗。首联点题，勾勒出了狩猎仪卫的威严情貌与打猎队伍的整肃场面：那些手持皂旗的仪仗卫队正走在青盖车前头开道，威风凛凛，加上附近的老百姓，列队布出了包围长阵，显示出浩浩荡荡之势。

颔联对仗工整，用词准确。“弄风”对“趁兔”，尤以“马立”“鹰飞”的动态形象，刻画出狩猎场面的紧张、威武和热烈。“骄马”之“骄”，刻画出健马的体壮神骏，“苍鹰”掠地而飞，紧贴着地皮追捕野兔，写出猎鹰的勇猛与训练有素。

颈联写狩猎归来的兴致风采，在紧张热烈的围猎活动结束之后，诗人回望着翠峰山峦间升腾着的白云，俯看着那红叶满尘的征衣，在顾盼自得中，抒发出诗人内心的壮志豪情！

尾联则直抒胸臆，一泻千里。诗人以晋朝书生将军谢艾自况，倾吐了他意欲驰骋边疆，为国效力的宏愿。“圣明”指皇帝或朝廷，“白羽”，是儒将所持的白毛羽扇，在阵中摇动，有如诸葛亮的指挥若定。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后期，外患频仍，边垂时乱。作为有“致君尧舜”宏志的苏轼，以晋代曾任西凉簿的书生将军谢艾自比，意欲驰骋疆场。

全诗气势雄壮，激情满怀，形象飞动，是苏轼七律中的佳构。他在写出了这首短诗后，意犹未尽，又挥笔写成了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sup>(4) 136</sup>

上片写会猎情景。“老夫”，是词人自指，苏轼时年四十岁，而自称“老夫”，颇有狂野之气，也有对官场互相倾轧的不满。

下片写由行猎引发的豪情壮志。“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是用《汉书·冯唐传》中的典故。苏轼以冯唐自比，表达愿为国家安定西北边境而驰骋疆场，扫平边患，造福百姓。

这首词具有里程碑意义，是苏轼第一首以豪放为风格的词作，所写内容与传统题材不同。此后几天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三首·三》<sup>(2) 1560</sup>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从中可见苏轼有意于别立一家的创作心态。

从作品中看出，苏轼当年在密州打猎的地点主要是常山下、黄茅冈，还有城东的铁沟河附近（《和梅户曹会猎铁沟》一诗可以为证）。

### 三、密州过节，心境不同，令人唏嘘不已

以前过春节，老百姓叫忙年。因为一入腊月，各家各户都忙着办年货了。农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日”，大家要用小米、小麦、绿豆、大豆、赤豆、豌豆、花生米等杂粮加大枣，熬煮“腊八粥”。接下来是“辞灶”，农历腊月二十三，又称“过小年”，相传是灶君天庭赴会的日子。当天傍晚，每家于灶君位前供奉麦芽糖、果品及水饺等，祈求灶君“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家家清理卫生，粉刷墙壁，以示辞旧迎新。除夕户户贴对联、挂门笺、糊窗纸、粘窗花、挂年画。午后，挑满过年水，备好过年柴，家家灶房烟雾缭绕，炸、炒、煎、煮菜肴，调馅包水饺。傍晚，家中摆好供品，男子率儿孙到十字路口或村头，迎财神，接家堂。事毕，在大门口置放“拦门棍”，以防邪魔鬼祟入宅。全家人围坐一起，吃糖果、瓜子，水饺，欢度除夕之夜。

然而，宋熙宁七年（1074）的除夕，苏轼却无心欣赏过年的热闹场面，官场的倾轧是一个原因，再就是正处在病中，请读他的诗作《除夜病中赠段屯田》：

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  
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

……  
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  
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

……  
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  
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

<sup>(3) 607</sup>

这是苏轼到密州上任后的第一个除夕，当时蝗旱交加，民不聊生。段屯田，名绎，字释之，为屯田员外郎，京东东路提点刑狱。龙钟，衰老态。三十九岁本不算老，但苏轼当时觉得自己未老先衰，当时百姓也有“人过三十多半辈”的说法。下面描述的都是凄冷的景象，没有半点过年的气氛：“日斜时”、“病相伴”、“萧条”、“寒夜”等等，此生就是暗淡的“灰中炭”，体弱多病，来日无多，行将熄灭。这是苏轼初到密州，面临自然灾害的压力与变法派的排挤，再加上疫病的折磨，因而产生了一种悲凉厌世的心境。至于“归田计已决”，也是特定心境下的一时冲动，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苏轼当时是受佛、道观念的影响，但儒家入世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仕途不顺，生活艰难，但苏轼并没有步屈原后尘，投江自尽；也没有象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种豆南山下，这恐怕与他后来在密州形成的超然思想有很大关系。

再看《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sup>(4) 129</sup>

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时值正月元宵节。上片写杭州元宵节景况之盛，灯火辉煌，月光皎洁、美人如画；下片写密州元宵节，山城冷落无声，也使人显得哀哀无神。隐隐可以听到吹箫击鼓之声，那是农家在祭祀神灵。街上灯火稀疏、霜飘落下。天空中阴云密布，似乎正酝酿着一场冬雪。对比中既看出南北风情的不同，也显出词人初到密州的独特心理感受。

五天之后，苏轼又写了一首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sup>(4) 131</sup>

这是一首悼亡词，悼念的是自己的元配夫人王弗，写于熙宁八年（1075）正月，距爱妻去世整整十年。亡妻王弗聪颖贤惠，见识过人，

生前与苏轼伉俪情深，是苏轼仕途生活中形影不离的“贤内助”。特别是劝告苏轼说话、作诗要注意，在官场不能满嘴“放炮”。词以《记梦》为题，以“梦”为中心，分梦前、梦中、梦后三层娓娓道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全词朴实无华，虚实相衬，形意生动，词风凄婉悲怆，属婉约词的代表作。

以前只有悼亡诗，而用词悼亡——深情怀念自己的结发妻子，苏轼又开悼亡词之先河。

又《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sup>(4) 161</sup>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中秋节在密州超然台上饮酒赏月作。苏轼熙宁四年离开都城汴京，辗转外郡，到此时已经五年。爱弟苏辙在齐州李常幕府任掌书记，也已七年没有见面了。政治上不得意，又怀念久别的亲人，只能对月抒怀。

词的上片写因赏月而引起的奇思妙想。字里行间流露出想超脱飞升而又矛盾的心绪。“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该词读来琅琅上口，上下贯通，人见人爱。除了其字面表象，更重要的是其深刻的内涵。“明月”不明，“青天”不青，天上人间一个世道。朝廷里是什么情景，现在很难说。我不是不想“居庙堂之高”，但官场险恶，勾心斗角，令人心寒；只得在清冷的月光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做个地方官。现在还不能遁入空门，念佛修道。词的下片写望月所触发的离思别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只好随遇而安，很有哲理。兄弟二人相隔不远尚不能见面，更不论其他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指美好的皎月，祝愿天下人平安健康，不管相隔千里万里，都能欣赏明媚的月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苏轼在词中把天上与人间、自然与社会、朝廷与地方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怀才不遇、随遇而安的超然思想，更复杂，更丰富，非经历仕途坎坷的人不能道也！此时的苏轼，已届不惑之年，其思想基础仍然是儒家的经世济时、积极入世占主导，但不排除佛教、道教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曾找来佛教经典研读，也曾与常山等处的道人有过往来。在文学创作上，本

词具有里程碑意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废。”说法未免绝对，却道出了苏轼这首词的杰出地位。

这是一首久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因赏析文章很多，此处不赘述。概括地说，儒释道集东坡先生于一身，相互作用融会成了超然思想。他的自勉对联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纵使万般寻路无，不堕野地随人居。”这种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为官者和读书人，也延伸到老百姓的心目中。2007年诸城市斥巨资在原址重修超然台就是一个实证。如果在超然台上，立一尊苏轼中秋赏月的塑像，岂不妙哉！

#### 四、以诗会友，以酒待客，展现文人雅士的风流倜傥

苏轼爱酒，酒量却不大，主要是作为待客、会友的引子，喜欢那种浓厚高雅的气氛，似醉非醉的感觉。正如《立春日，病中邀安国》<sup>(3) 663</sup> 小序所言“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禹功同来。仆虽不能饮，当请成伯主会，某当杖策倚几于其间，观诸公醉笑，以拨滞闷也”。其一云：“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

“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有满堂欢。”其二又曰：“齐居卧病禁烟前，辜负名花已一年。”即使如此，苏翁仍邀朋唤友，以酒相待，雅兴使然，乐此不疲。

理政之余，有时喜欢到别人家里小聚，想喝酒时酒已尽，心中不免怅然，于是也写一首诗，而且引经据典：《成伯家宴，造坐无由，辄欲效颦而酒已尽，入夜，不欲烦扰，戏作小诗，求数酌而已》：

道士令严难继和，僧伽帽小却空回。

隔篱不唤邻翁饮，抱瓮须防吏部来。<sup>(3) 2528</sup>

诗中提到的成伯，曾为丹棱令、临淮通判，此时为密州通判。“道士令”，悦神乐中所谓离而复合者。杜诗云：“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抱翁”：《庄子·天地》有“抱瓮而出灌”。此处活用典故，以瓮指酒瓮。“吏部”：见《晋书·毕卓传》，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上二句中，“邻翁”、“吏部”均用来自喻，苏翁对酒的喜爱可见一斑。

同事好友工作调动，当然要设酒饯行，更要写诗送别：《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sup>(3) 682</sup>。乔太博：名叙，字禹动。太博：太常博士之简称。左藏：即左藏库使，属两班诸

司使，为武臣迁转之阶。乔由太常博士换左藏，乃由文阶而改武职。诗中云：“今年果起故将军，幽梦清诗信有神。”“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夜来新。”以故将军李广喻指乔太博，通过“痛饮”，做诗，表达对好友的送别深情。

再看《薄薄酒二首·一》：

薄薄酒，胜茶汤；  
粗粗布，胜无裳。  
丑妻恶妾胜空房。  
五更待漏靴满霜，  
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  
珠襦玉柙万人祖送归北邙，  
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  
百年瞬息万世忙，  
夷、齐、盗跖俱亡羊，  
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sup>(3) 687</sup>

这首诗，前三句说的颇似大实话：“薄酒”，“粗布”，“丑妻恶妾”，我想起了祖辈说的一首民谣：“穷人家里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与苏翁所云大同小异，描述的都是老百姓的生活。以下从三个角度对不同的人生做了比较，在比较中表现出人世的哲理：“五更待漏”的大臣，每天早朝，等待时间长了，靴子上结满了霜，非常辛苦；“三伏日高”下的陶潜，夏日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晋书·陶潜传》），十分惬意。第二个层面：穿着“珠襦玉柙”的王公贵族，死后虽有“万人相送”到北邙山墓地，但终究不见天日，化为朽土；而披着“悬鹑百结”破烂衣衫的贫汉、田夫，不忙时向日曝背，快乐无比——活着的穷人比富翁好。第三个层面：生前与身后的比较，各声与实利的对比。“生前富贵，死后文章”，这是文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伯夷、叔齐为商孤竹君之二子，让位不受，逃至周。武王灭商，二仕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被孔子称为“古之贤人也”；而盗跖传说是春秋末大盗，《庄子》却记载：“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因此，在苏轼看来，“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让各种名利穷达，在对酒当歌中都化作历史的尘埃吧！这也是苏轼“超然思想”的另一种表现。

### 五、妙笔生花，化平淡为神奇，为密州的山川大地增光添彩

苏轼知密州两年，勤政之余，多次登临境内的庐山、常山、九仙山等，还亲自主持设计，为这片热土增加了许多人文景观：熙宁八年五月，修常山庙；夏秋，筑扶淇新堤；年底，葺北台（超然台）。九年三月，建快哉亭；六月，作山堂；秋，构盖公堂。而且每兴一处，他都有感而发，饱蘸激情，留下了许多壮丽的篇章，至今广为传诵。他在《超然台记》<sup>(2) 352</sup>中写到：

“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现，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棱，忽然如城廓，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下面选几处与苏轼有关的景点略作介绍：

#### 盖公堂

盖公堂座落在密州署衙东侧黄堂之北，今诸城市人民政府院内。北宋熙宁九年（1076）苏轼创建。

苏轼知密州，闻知盖公为乡人，慕其“贵清净而民自定”的治国思想，遂于州衙之中创建盖公堂以资纪念，并为之作记。他在《盖公堂记》<sup>(2) 346</sup>中说：“吾为胶西守，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庶几复见如公者，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敝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据清乾隆《重修诸城县志》载：“堂中有照壁，摹陆探微画狮子而自为之赞，所云‘置之高堂护燕儿’也”。但苏轼所建盖公堂至明朝已不复存在。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二月，知县颜悦道于县治内旧东厂东隙地内又建后盖公堂，共三间，并于堂之东建水心亭，今亦不存。

#### 西园、西斋

均位于州治西之超然台前。北魏永安二年（529）增修北城时，于北城墙上筑东西二台。苏轼知密后，将西台“稍葺而新之”，取名“超然”。台下有一旧园，苏轼修台时，又将荒芜的旧园予以修整，“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因园在州治西侧，故称“西园”。园之西有斋，有轩，则称“西斋”，“西轩”。园中假山堆积，广植花木，有松、竹、桑、枣、榴等，园内翠竹掩映，榴花似火，花木幽香，环境优雅，景色宜人。这就是苏轼起居、会客、写诗赋文之处。有时病魔缠身，他就在此园疗养几日。

他深爱园之美，更爱园之幽静。他曾作《西斋》诗以赞之。著名的《超然台记》即写于西斋。西园东侧有一块闲地，被用作菜圃，苏轼种植各类蔬菜，并在一侧掘池养鱼，还自酿秫酒，邀集友朋，饮酒赋诗。正如他在《超然台记》中所写：“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 卢山、马耳山

卢山，原名故山，是苏轼知密州期间经常登临和赞咏的境内名山之一。位于城区东南三十里。山呈东西走向，主峰海拔382米，属七千万年前燕山运动影响形成的褶皱山地。由于风化剥蚀，山上悬崖陡峭，怪石突兀，苍松葱郁。从城里远眺，群山相连，峰峦叠翠，颇为壮观。苏轼知密州后不久，就被卢山的雄姿胜景所折服，多次邀约文友登临游览，写成了美丽诗篇。如“东望峨眉小，卢山翠作堆。”（《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sup>(3) 618</sup>。熙宁八年，在一次游卢山时，与同僚互相唱和，作诗《游卢山次韵章传道》<sup>(3) 619</sup>，抒发了他不受约束的“野性”，表达了“超然物外”的情志。为了表达对卢山的喜爱之情，还特意写了《卢山五咏》<sup>(3) 620</sup>诗，将卢山的名胜卢敖洞、饮酒台、圣灯岩、三泉水、障日峰等，一一赞咏。其中的卢敖洞，又称卢山洞。秦朝博士卢敖，为避秦始皇暴政而隐居此洞，山亦因此而更名。传说在晚年，卢敖于此洞中绝食修炼，后成仙飞升而去。

马耳山，位于诸城市南50里，海拔706米，为鲁东南第一高山。地势险要，迤逦数十里。主峰双石并举，状如马耳，故名。春秋战国时，齐国为防楚而修筑长城，至此即以山之悬崖峭壁作为城墙。山之西有长城“黄草关”，为南北通道的主要关隘。山之东麓石人山顶即砌石为台，长城向东蜿蜒似一条巨龙直达东海。马耳山还能测量天气阴晴，将要下雨，洞中生云，围绕着马耳双峰，人称“马耳山戴帽，大雨就来到”。

苏轼深爱马耳山，它那挺拔向上的雄姿，不易被湮灭的倔强气质，给了苏轼莫大的启发与鼓舞。他在《雪后书北台壁二首》<sup>(3) 604</sup>中惊喜地写道：“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这不仅是对山的赞美，也是发自内心的抒情与言志。

### 扶淇河

扶淇河之“扶”，苏轼《满江红》词中作“郏”，《水经注》与明、清两代《诸城县志》均作“扶”，当代行文亦有作“扶”者。据《水经注》记载，水有二源：东源水为扶河，又名注辅河，发源

于五莲县之凤凰山北麓。西源水为淇河，发源于诸城境内之寨山北麓。二源在诸城城南三里庄汇合，称扶淇河，然后北流穿城而过，至城北入潍河。

苏轼知密州期间，于熙宁八年夏秋之间发动百姓，在东武城南红土坡下顺扶淇河筑长堤，雍扶淇水入城，并在堤上栽红植绿，美化环境。他在《满江红》<sup>(4) 155</sup>中写道：“东武南城”，新堤就，郏淇初溢。微雨过，长林翠阜，卧红堆碧。”东武南城建有流杯亭，址在扶淇河边，按古代风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苏轼邀文人墨客，于环曲水滨欢聚宴饮，祓除不祥，称“曲水流杯”。这天满城百姓争相观看，热闹非凡。元丰八年（1085），苏轼再过密州，在《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sup>(3) 1381</sup>的诗中写道：“郏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濑鸣玦环。愿公谈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湾。”希望太守霍翔在扶淇河上游修一条石坝，将两河之水拦蓄起来，以利于民。

1958年，诸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搞水利建设，在扶河与淇河交汇处修拦河大坝，建设了一座蓄容5436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有效灌溉面积4万多亩。后改作城区饮用水源，至今城区人民生活生产用水尚赖于斯。1993年治理改造中下游的扶淇河，整修堤岸，栽柳种绿，建成扶淇河公园，成为百姓游玩垂钓的场所。苏轼当年的愿望，900年后才变成了现实。

### 铁沟河

铁沟河，在今诸城城东5公里处，因河岸坚硬如铁，故名。发源于密州街道大王门南岭凤凰山，纵向北流，至北石桥村注入潍河，全长13公里。

该河地处丘岭之间，两侧起伏不平，远望似海中波浪一般。这就是苏轼诗中所写的“城东坡陇何所似？风吹海涛低复起”<sup>(3) 601</sup>。铁沟河虽小却很有名气。因距城较近，城里的一些文士贤达，厌倦城内喧嚣生活，而到环境静雅的铁水岸边定居，放浪田野，以文会友，结社赋诗。北宋熙宁年间，苏轼好友乔叙曾在铁水附近居住过。所以苏轼在闲暇时，经常来此会友，看望乔叙，并作诗《铁沟行赠乔太博》<sup>(3) 601</sup>，诗云：“城中病守无所为，走马来寻铁沟水。铁沟水浅不容辀，恰似当年韩与侯。”另外，还与梅户曹会猎于铁沟东岭，并作诗《和梅户曹会猎铁沟》。

往事越千年，超然台上看。回忆苏轼不平凡的一生，令人感慨万千。现代诗人臧克家（诸城籍）生前曾写过一篇缅怀苏轼的文章，题目叫做《仰望苏东坡》，读罢令人震撼。写成此文，却觉非“仰望”二字不足以表达后人的敬佩之

情。他在《有的人》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苏轼属于后者。活着的是他的思想，是他的爱民真心，是他留下的文化财富！

### 注释：

- [1] 林语堂著：《苏东坡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3]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徐培富，山东省潍坊工商职业学院教授）

---

### （上接第32页）

元丰五年(1082)春，东坡作的寓言体词《二虫》，注意运用民歌的类比手法。他将貌似共性的“水马儿”、“鸚鵡堆”陈列在一起，寓喻为在恶劣环境下，诗人仍不随波逐流，不随风转舵的坚定精神。

君不见，水马儿，步步逆流水。  
大江东流日千里，此虫趯趯长在此。  
君不见，鸚鵡堆，决起随冲风。  
随风一去宿何许，逆风还落蓬蒿中。  
二虫愚智俱莫测，江边一笑无人识。<sup>[8]1109</sup>

### 注释

- [1] (明)胡震亨著：《唐音癸签》(第十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 [2] (北魏)郦道元著、叶扬等译：《水经注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 [3] (宋)郭茂倩编：《杂谣歌辞·乐府诗集》(卷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4] 郑永晓著：《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 [5] 马樨青著：《竹枝词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6] 鲁迅著：《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7] (唐)刘禹锡著：《刘梦得文集·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8]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 (宋)苏辙著：《栾城集·竹枝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0] 黄伯思著：《翼搔》(序)，上海：上海广益书局排印本。

[11] 刘尚荣著：《亦诗亦词话竹枝》，《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2]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3] (东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4] 蔡东藩著：《前汉演义》(第三十一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15]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6] 王季思著：《元曲选·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7] 鲁迅著：《鲁迅全集·论旧形式的采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8]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饶学刚，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我参与苏轼行踪考的原委

李常生

**内容提要** 我期望撰写出一本比较精准的苏轼传记，因此经过仔细考虑，于2008年展开全面性的苏轼行踪考。这项研究期望遵循苏轼行经、停留的所有地方，包括点、线、面等，以期彻底了解苏轼，融入苏轼一生的生活情境当中。2013年，我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正式研究、遵循、探访苏轼一生的行踪，为我撰写不同于前人、全面精准的《苏轼传》而做准备。

**关键词** 苏轼 行踪 追循 文献 探索

2000年前后，法国《世界报》评选一千年 来世界十二位伟人，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成就。苏轼不可替代的创造性天赋，使他远远超越了同辈作家，甚至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七家，处于宋代文坛的巅峰地位。

我的祖籍是河北沧州，1949年生在江苏常州，在台湾长大成人。自幼，我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哲学思想。在台湾读大学（本科教育），我研究的是企业管理；研究所中，专业是环境规划。毕业后，我曾在台湾、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大陆的多个城市经营房地产。但是长期以来，我却对文、史、哲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大学时代，我读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后，随即对于苏轼的人品、才华、学识、肚量及乐观的个性充满崇敬。几十年来的无数次思考孕育出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篇较为完整、精准的《苏轼传》，将苏轼的一生，包括行踪、交友、思想、养生之道与文学创作等，完整呈现给世人。借此表达我个人对苏轼的崇高景仰与尊重。

2004年，我进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攻读博士，2008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又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学院任教。期间我又仔细思索，最终还是认为

应该坚定信念，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全力撰写《苏轼传》，以完成自己人生的最重要愿望。因此，自2008年起，我开始利用空闲遵循苏轼行踪，作为研究苏轼的准备工作。

## 一、研究缘起与目标

林语堂所撰写的《苏东坡传》，通俗易解，大笔挥洒出苏东坡的灵魂，是优秀的作品。然而经过几许沧桑，过了六十岁以后，我在持续阅读上也感觉到下列几个困扰：第一，由于林语堂撰写《苏东坡传》时的年龄约为四十岁出头，年龄太轻，因此林著尚不能完全把握住苏轼的许多思想状态，包括其宗教、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特点，尤其他身上因年龄增长与官职调遣贬谪而发生的微妙变化。第二，林语堂之作是在美国使用英文撰写，再经人转译成中文的，因此就缺少了中文独有的文学与历史韵味。第三，林语堂未能走过苏轼所行经的道路，因此不容易精准地掌握苏轼经历过的人文情境等。

## 二、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原因，在撰写这一种全新的苏轼传记前，我必须掌握几个方向与原则：第一，在撰文前必须亲自走一遍苏轼行走过的所有地点。这包括其居住地、旅游地，以及连接这些地点的路线——这都是苏轼所亲自经过的。另外，全面性的历史地理文献还包括苏轼作品中所述及的大量地点。第二，我本人必须再读一个历史学的博士，以期利用历史地理与文学地理的专业技术，以及学校的平台，推进遵循苏轼行踪这一事业。

我于2013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专研北宋史与苏轼史。因苏轼所生长的时代环境，正值北宋的文明发展高峰期。因此在研究苏轼史的同时，必须配合研究整个的北宋史，包括

各重大事件的发生等。苏轼编年史因而也涉及了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性的苏轼研究，也包括苏轼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 三、遵循苏轼，标示出地点

我自 2008 年开始，即陆续前往苏轼所生活、游历过的十六个重要州府，寻找其遗迹地。这些地方包括眉山、汴京、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郏县等地。2013 年入学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后，我随即展开正式的、再度的遵循上述十六个州府中有关苏轼行踪的考察工作。新的考察又添加了苏轼活动的路径，主要包括：自眉山沿岷江、长江至汴京，自眉山出剑门，再经凤翔至汴京，运河（含汴河）与颍水、长江沿线，最后的南行与北归路线等。

依我行走遵循的经验，一个州府往往要走上三、五次才能全面了解各地的实际状况。其中重要的困难处在于许多地区的地形、地貌已经改变。比如镇江、扬州沿长江地区，自宋代以来，由于长江的摆动，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相同的海州沿海地区，也已向外海移出数十里；黄州地区的沿江地貌也早已有巨大的变化。

在研究上述十七个州府时，为了还原宋代时的地形地貌，必须将宋代的城郭“套”到今天的地图上，自行描绘新的。在绘制地图时，必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扰。有些地区可以从地方志办公室中找到相关概略数据，有些地区即使是地方志办公室，也不易还原到宋代时期的城郭范围。

经过再三苦思与研究，若要撰写苏轼传，如未能理解苏轼所行走过所有地方，很难真正理解到苏轼这位伟人一生的故事，包括他的思想、文采，甚至朋友之间的关系与制药、制酒的技术，或者养生之道。因此，我遵循苏轼行踪的原则是，苏轼及相关人物提到苏轼所行走过的地方，小至一座亭台楼阁，我都尽量找到其原址或者后人将其所迁徙的新址，并绘出地图，甚至标示出经纬度。

因为所有的文献数据是依照编年史来整理的，我在整理过程中参照并融汇了苏轼的诗、词、文等的写作背景，这样研究起来就格外亲近与熟悉。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寻找，我深切地感受到，中秋节站在超然台仰头看月时，去掉时间，我是与苏轼站在一起的，我们在心灵上相互对话。

### 四、遵循苏轼行踪途中的惊喜

#### （一）陆续填补了历史地理与文学地理的缺憾与不足

自古以来，碍于交通的困难，鲜有学者全面、系统地走过苏轼行经的所有路线。这次，我以研究学者的立场，从历史地理与文学地理的角度，严谨地考证苏轼行踪，弥补了苏轼文学乃至整个历史学的缺憾，为后继学者提供可持续性研究的参考依据。而现有交通，包括飞机、高铁以及各种新型交通工具，更有助于此一目标的实现。

#### （二）更清楚苏轼行进走过的路线

原有文献多是以苏轼及宋代相关文人的诗词文中的描述为依据去判断苏轼行进走路线，其中地点、时间的精准性往往出现问题。经过了将近四年的遵循，我更能清楚地了解苏轼所行进走过的路线，弥补了许多缺憾。

#### （三）发现了许多苏轼书法石刻

如密州九仙山、定州曲阳县均得见山水间的苏轼书法石刻，令人震惊。而在凤翔东湖、黄州赤壁、儋州东坡书院等地碑林中屡见独一无二的苏轼书法石刻，也能让人欣喜。广东肇庆在去年底也发现了苏轼书法“崧台第一洞”五个大字刻在七星岩洞上，并有“眉山苏轼”四字刻于题尾。

#### （四）串联了各地苏轼研究会，增大了此项研究的广度、深度

中国内陆，苏轼所居住或与苏轼有密切关系的眉州、黄州、海南、密州、定州、常州、郏县、颍州、徐州、惠州等地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苏轼文化研究会，有许多学者全力在研究当地苏轼的行迹、文学与思想等。但是研究苏轼的学者，多半未曾走过苏轼所行进走过的路线。

由于各地区学者研究各地区的苏轼文化，因此从整体来看，就有不易合拢的趋势。我走完苏轼所行经的全部路线，则可串联各地苏轼的研究成果。且在研究当中，各地研究会往往疏忽了苏轼在行程中的文史研究，这也是我发现的问题之一。苏轼在六十六岁逝世，其中近十年是在旅途中，多半人疏忽了行程中的苏轼文化研究。另外如杭州、湖州、汴京等地，因缺乏苏轼文化研究会，一直成为苏轼文化研究的一大死角。

#### （五）逐渐了解到各地传说中的谬误

各地都有苏轼传说故事，但往往经过现场实地考察，再比对苏轼的诗文词集和各地区的地方史志，可以发现许多传说是后人编造出来的。苏轼所行经路线附近的州县，其地方志中

往往亦可发现有苏轼行踪纪录，但事实上，苏轼并未经过该地，相关记载只是后人传说与假设出来的。

#### （六）厘清原有史书以及相关文集的疑问之处

经过现场严格的比对，以及时间的推算，我发现古书如《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中相关的稗官野史，各方志、各代《苏轼年谱》及历次苏轼文学作品校注当中都有错误，我的研究也能澄清谬误。

#### （七）发现各地苏轼遗迹的保护与破坏情况

从保护苏轼遗迹或标示苏轼遗迹来观之，各地方相关部门的处理均难以令人满意。目前眉州、儋州、黄州、密州、杭州等地区都有苏轼的专有纪念馆或展示馆，展览物品大同小异，缺乏特色。至于小地区与苏轼有关的遗迹保护都极为粗糙，另以儋州东坡井而言，我前后去过三次，第二、三次均发现井旁的石碑等，一次比一次少，这反映了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严重不足。

#### （八）深入了解苏轼相关诗文的背后意义

苏轼许多诗、文、词的撰写，都与各地地理与人文环境有关。因此查访过原址以后，再比对相关作品，更容易了解苏轼当时的心境变化，也比较能够深入了解苏轼相关诗文词的背后意义。

#### （九）深入发掘苏轼哲学、宗教、文学思想的转化原因与阶段

苏轼的哲学、宗教、文学思想的转化，因各地的环境、时代背景、地方风俗、官升贬谪等因素而有所变化，其原因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待各处考查完毕，再论及诗文词集，进而辅助以历代的稗官野史中的材料，相互比对中则容易深入发掘苏轼哲学、宗教、文学思想的转化原因与形成的阶段。

#### （十）访问各地苏轼研究学者，分享研究经验

眉州、黄州、海南、密州、定州、常州、郏县、颍州、徐州、惠州等地，都有专研苏轼文化的学者。我在考察中，得以与之分享经验、交换心得与新见，大家切磋共进，共同为苏轼研究做出努力。

### 五、结论

我因为要想写一本有关苏轼传记的书，而展开了全面性的苏轼行踪考。又因为行至各处，进行了与苏轼有关的点、线、面的、多次的实

地考察与文本研究，我获得了许多学术研究上的心得。在研究中，我借助自身的学科优势，充分发挥了“历史地理”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技术，这是颇值得与各位同仁分享的。

从“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观点上窥知，依我遵循苏轼行踪的经验，若只读万卷书而未能行万里路，则学术研究上必有缺失，必然难得全貌，难免遗憾。

而如果想要全面了解苏轼，更是需要走一趟苏轼所到之处，方能融入苏轼的人生际遇与情境当中。但是碍于现实，绝大部分的人受制于金钱、岗位职责及时间压力，都无法办到。依照我遵循苏轼的经验，即使想要理解苏轼所写一首诗文或词，若未能到过文中提到的现场，就很难理解其文中的灵魂意境。我很荣幸能陪苏轼一起走过一生，去除时间因素，我与苏轼其实是并肩而行、同声而读的。

（李常生，工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在读，曾任教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 役法之争

赖正和

**内容提要** 本文叙述了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在役法上的分歧，指出：站在民众利益的立场上制定役法，是苏轼始终关注的焦点。此外，作者还对一直以来一些书籍、文章中对苏轼在役法方面的立场、态度、表现的不当观点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苏轼 役法 争论 民众利益

役法，就是规定乡户给官府服劳役的法律。差役，就是乡户听从官府差遣、役使，为官府无偿服务。

唐代把差役称作色役，宋代则称作职役。职役的名目大致分为四类：一类叫衙前，其职责是负责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粮仓、管理州郡长官的厨事等；二类叫里正、户长、乡书手，其职责是负责督催赋税；三类叫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其职责是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四类叫耆长、弓手、壮丁，其职责是替官府逐捕盗贼。衙前、里正由第一等乡户（最富有的人户）轮流承当；户长、乡书手由第二等乡户（富有程度比第一等乡户差些，余类推）轮流承当；其余的职役由第三等、第四等乡户轮流承当。第五等乡户最穷，不承当职役。承当职役的人户除了为官府无偿服劳役之外，还要花销不少私人钱财，例如运送官物的运费都由服役人户负担，官物损耗、丢失亦由服役人户赔偿；因水旱灾害农业歉收或农户逃亡而收不到赋税，里正、户长等要代为交纳；服役期间所有花销概由服役户自己承担；另外还会常常遭小官吏敲诈……

职役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让农民吃尽了苦头。苏轼初入仕途担任凤翔签判的时候，就曾在写给韩琦的书中大诉职役给凤翔农民带来的苦难，并且强调“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苏辙也说“民被差役，如遭寇虏。”韩琦亦说：“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韩绛曾说：“害农之弊，无过差役。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

重费。”他还说他听说京东有父子两人，将轮到服衙前役的时候，父亲告诉儿子说，我死了，我们家才没有条件服衙前役，你们才能免受冻饿。随后父亲果真自缢了。他还听说江南有将祖母出嫁、与母亲分居，以求避免服役的。这种违背人理、不忍听闻的悲惨事件，是差役逼出来的。因此，有良心、有见地的官员都主张改革差役法，苏轼自然是其中的一员。苏轼动用签判的小小职权修订了衙规，减轻了凤翔府服衙前役乡户的负担。他还请求朝廷取消里正、衙前这两个职役。

王安石实行免役法（也叫雇役法），也是对差役法的一种改革，但他的着眼点在于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苏轼在熙宁年间批评免役法，并不是要维护差役法，更不是反对改革差役法，而是反对王安石借推行免役法加重百姓的负担。苏轼担任密州知州的时候，神宗皇帝提出一种新的役法，那就是“给田募役法”，苏轼积极推行这一役法。但半年之后，因大臣反对而停止施行。苏轼从在凤翔做签判，到担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都免不了要执行役法——在凤翔执行的是差役法；在杭、密、徐、湖诸州执行的是免役法；在密州还执行过给田募役法。可以肯定，苏轼对各种役法必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必然站在民众利益的立场上分析认识各种役法的长短利弊。他明白差役法害民最深，认为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也有不少弊端，只有给田募役法稍能便民。因此，他从登州回到东京的当月，就按与范纯粹的约定，草拟了《论给田募役状》。

苏轼在《论给田募役状》中首先提出，神宗皇帝在施行免役法之初，规定为防备灾伤而加收的免役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可是相关部门加码执行，通计天下所收免役宽剩钱高达四分、五分。到现在免役宽剩钱积累了三千余万贯石。<sup>[1]</sup>臣认为这一大笔钱出自百姓，理当用于百姓。所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应当把这笔钱用于役法之中。

这笔钱如何用于役法之中呢？苏轼主张用这笔钱来买田，再用田来招募服役者——这就是给田募役法。他说，熙宁年间曾经施行给田募役法，就是用收归官方的田和用免役宽剩钱买来的民田招募服役的人，大略与边境用田招募弓箭手的做法相同。臣知密州的时候曾经亲自施行这种役法，对百姓有利。但是不到半年就停止施行了。臣听说这种役法本是先帝提出来的，然而大臣们想速见变法成效，而且想将免役宽剩钱挪作他用，所以纷纷驳难这种役法，使这种役法不能继续推行。

苏轼根据自己亲行给田募役法的实践经验，总结出这种役法有五大好处：一、朝廷如果依旧实行免役法，每招募一名服役人，就能省下雇用一名职役的钱，省下来的钱积累多了，又用来买田招募服役人，如此坚持下去，只要几年工夫，花在雇用职役的钱就会大大减少，政府也就可以大大少收百姓的役钱；朝廷如果依旧实行差役法，每招募一名服役人，就可以少派一名职役，职役逐渐少派，农民负担自然宽松。二、应募的服役人与弓箭手一样，全家的衣食费用都靠耕种官田来供给，平时不敢轻易犯法，出现紧急情况也不会逃亡。三、现在谷物价钱很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卖田常常苦于卖不出去，价格也被压得很低。如果官方买田，田和谷物的价钱都会提高，农民生活可以稍稍改善。四、现在钱币大多积累在官方，政府和百姓都常常为钱重物轻而苦恼。如果官方把钱拿出来买田，就可以使钱、物轻重稍稍均衡。五、施行给田募役法，百姓享受到它的好处，就会明白当年先帝收取免役宽剩钱是为百姓打算，对这笔钱的怀疑、诽谤就会消除，朝廷的恩德也就会显现出来。

苏轼同时也指出施行给田募役法要防备两种弊病：一、贪婪狡诈的小官吏跟少数百姓勾结，共同行奸，把贫瘠的田地卖给官方，雇用一名虚浮放浪的人出面暂时应募，一年半载就弃田逃走；二、少数百姓考虑不周，只看见眼前利益，不顾忌后患，听说官方买田募役，即争着把田卖给官方，以自身应募当服役人。这些人以为田产没有离开自己，又骤然得到一笔官钱，是一举两得。没考虑到应募之后，就要一直当服役人，甚至其子孙也要接着当服役人。朝廷要设法防止这两种弊病的发生，“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

苏轼接着说，现在朝廷打算以后不再收取免役宽剩钱，而收归官方的田地也不多，要全面推行给田募役法将不可能。现存的免役宽剩钱虽然有三千万贯石，但将近一半已经借支出

去作军费用了，臣今建议，从皇室仓库里拿出钱帛来付还，凑够三千万贯石，只在边境上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推行给田募役法，使这三路农民服役人数在五七年时间内减少大半，让农民富足起来，以防备发生紧急事件。这对国家的安全有无穷的好处。

苏轼计算，边境地方有器甲、战马的弓箭手，官方给田两顷半让其耕种，他就可以用身躯性命报偿官方。这样的弓箭手能够招募到，服役的招募一定不难。他估计，用良田二顷可以招募到一名弓手，用良田一顷可以招募到一名散从官。那么，现存免役宽剩钱三千万贯石用来买田就足够了。接着，他提出了十二条具体的实施措施。他希望朝廷详细讨论施行。

最后，苏轼批驳了两种言论。一种言论说给田招募服役人行不通。苏轼批驳说，富家将三二十亩田租给佃户，从中获利，而且如同奴仆般役使佃户。现在官方用两顷、一顷良田招募一名服役人，而且应募者只交税不交租，条件这么优越，绝不会没有人来应募。另一种言论是想留下免役宽剩钱以备他用。苏轼批驳说，免役宽剩钱本来就不该是常规赋税，也不是国家非用不可的。今天把这笔钱交给有关部门零敲碎打地支用，这就如火烧薪，日烧日少，直至烧完，终究办不成什么大事，取得长远利益。如果用来买田招募服役人，就如同私人变金银为田产，是长久万全之策。希望朝廷趁这笔钱还没有打散，用来买田募役。如果几年之后，这笔钱用完而没有办成什么事，那就太痛惜了。给田募役，真是先帝的本意。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保全之恩，今又蒙陛下越级提拔。臣每每想到这些，就感动得流泪，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先帝和陛下的恩德，因此冒昧地提出这项建议，希望朝廷采纳。

这份奏状写成之后，苏轼却没有交出。原因是他的给田募役主张，与执政司马光的意见不合。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日，神宗皇帝驾崩，司马光闻讯专程从洛阳赶到东京来吊唁，但吊唁即回洛阳，没有在东京停留。随后受命知陈州（今河南淮阳），路过京师入见哲宗皇帝，即被太皇太后高氏留下来担任门下侍郎（副宰相），这时已是五月下旬。当时司马光的名声非常之高，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把司马光看作贤人，认为他应该当宰相。太皇太后高氏非常倚重他，把他看作朝廷的柱石，一切大事都交给他谋划、处理，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初二日，左仆射（宰相）蔡确罢职，司马光升任左仆射。

在熙宁年间，司马光和苏轼都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立场相同，私交也厚。他刚担任门下侍郎一个月，就向太皇太后高氏推荐苏轼、苏辙。苏轼从登州回到东京，见知枢密院（即枢密院长官）章惇处处虐待司马光。司马光是个恂恂儒者，言辞谨慎，而章惇口齿锋利，言辞张狂，常常弄得司马光下不了台。苏轼与他们两个都是交好的朋友，就站出来调和两人的关系。他对章惇说，司马光现在声望很高。从前许靖徒有虚名，所以刘备轻视他。法正却劝告刘备说，许靖的虚名远播四海，如果不礼遇他，别人会认为我们看不起贤者。于是，刘备立即授予许靖司徒。<sup>[2]</sup>许靖尚且不可以轻视，对司马光就更不应该虐待。章惇认为苏轼说得在理，对司马光的态度才稍有缓和。

苏轼回到东京第一次与司马光见面，司马光就跟苏轼谈论当今要务，一条一条地讲他要做的事情。总的说来，他就是要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全部推翻，要恢复熙宁变法之前的一切做法。苏轼耐心地认真地听他讲完之后，说：您想做的各种事情，都是上顺天心、下合民意的，无可非议。只有役法一事，请不要轻易议定。因为司马光要推翻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轼才这么说。司马光心想，你苏轼当年不是也批评免役法吗？现在怎么这样说呢？他疑惑地问：为什么？苏轼解释道：差役与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在于搜刮民财，致使民间十室九空，钱都聚集到官方，民间却闹钱荒；差役之害在于百姓常为官方服役，不能专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些贪婪狡猾的小官吏还钻空子敲诈他们。这两害的轻重大略相等。现在用差役代替免役，就等于用这一害换另一害，百姓未必喜欢。司马光听了非常惊讶——他根本不知道差役之害与免役之害轻重略等，更不知道百姓会不欢迎差役法。他茫然地问：真像您说的那样，又该怎么办呢？苏轼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法前后互相承接，才容易办成事情；办事情循序渐进，百姓才不会受惊。他见司马光疑惑不解，就举例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兵和农合而为一，到秦始皇的时候，兵和农才一分为二。到唐代中叶，把府兵全部改变为长征之卒。<sup>[3]</sup>从此以后，民不知道如何打仗，兵不知道如何种田；农民出谷帛养兵，兵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办有利，即使是圣人复出也改变不了这种兵农分开的做法。他接着说：先帝同意推行免役法的本意是让农民出了免役钱后能够专力从事农业生产，虽有贪婪狡猾的官吏想敲诈他们，也找不到敲诈的机会。官方自行出卖坊场（官设的专卖市场）、河渡，将所得的钱用来雇募衙前，从而百姓没

有了因为服衙前役而破产的祸害。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做法，决不可以变更。但是，在推行免役法的过程中，也有不妥当的做法，需要改进：一、多收取免役宽剩钱，提供给其他方面使用。现在免役宽剩钱名义上按十分之二收取，实际上收取十分之五；二、争买坊场、河渡，提高不合实际的价钱，以增加收益。这两个弊端，都是王安石、吕惠卿搞的阴谋，不是先帝的本意。您如果保留免役法，而将这两个弊端全部去除，百姓一定喜欢，而且容易办成事情。您如果一律不准收取十分之五的免役宽剩钱，又准许百姓用布帛、谷米交纳免役钱，就能去除民间的钱荒之患。这样办，有利于天下百姓，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如果还有未尽之宜，我们再慢慢商议解决，也不为晚。可是，司马光听罢，大大地不以为然。

苏轼又找机会给司马光说：熙宁年间，曾经施行给田募役法，就是用收归官方的田和用免役宽剩钱买民田，招募服役人，大概与边境地区招募弓箭手差不多。我在知密州的时候推行过这种役法，先招募弓手，很受百姓欢迎。这种役法是根据先帝的意思设计的，可是推行不久，因为大臣有异议而罢停了。现在天下积累的免役宽剩钱大约有三千万贯石，其中一半被支作军费。这笔钱出自百姓，应该返还用于百姓。现在皇家仓库钱物堆积如山，您应当极力向太皇太后请求，从皇家仓库拿出钱来凑足三千万贯石。再用这三千万贯石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几年之后，这三路乡户服役人数可以减少一大半，百姓从而富足起来，才能够应付边境上的突发事件。这是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他没想到司马光听了，更加不以为然。

当时朝中头脑比较冷静、不太意气用事的人，也认为差役法伤害百姓很深，不能复行。例如，与司马光非常亲密的范纯仁（元祐元年闰二月任同知枢密院事）就在政事堂婉转地规劝司马光：治国之道，去除过分的做法就可以了。复行差役，必须仔细考虑。不然，会伤害百姓的。司马光听了，沉默不语。范纯仁又说：宰相的职责在于选拔使用人才，不必急于变法。希望您虚心采纳众人的意见，主意不必都由自己出。如果主意都由自己出，谄媚逢迎的小人就会乘虚而入。司马光还是默不作声。范纯仁只好退后一步说：假使您决心复行差役法，不妨先在一路作试验，看看效果如何再说。司马光还是不言不语。范纯仁走出政事堂，叹息道：这种态度就是不让人说话罢了！我如果只想讨人喜欢，不如少年时迎合王安石，早就大富大贵了。

始终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二月上书，论免役法有五害，请求朝廷恢复差役法。在司马光的坚持下，朝廷于二月初六日下令罢行免役法，复行差役法。二月十七日，司马光上书说，差役法刚刚复行，地方州县不可能不出现少许麻烦和骚扰。希望朝廷像金石一样坚决不动摇，即使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不妨慢慢更改，不要因为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就轻易损坏利民良法——差役法。不怕事的章惇针对司马光奏状疏漏之处，立即上书数千言，一点也不留情地一条一条地驳斥司马光。他还在太皇太后高氏面前跟司马光争论，态度非常豪横，冲动起来竟然在殿上大声咆哮：“他日怎么能奉陪你们吃剑！”章惇实在无礼，太皇太后高氏震怒了，刘摯和王岩叟又乘机弹劾他，他即被罢免知枢密院事，出知汝州。章惇原本是熙宁变法的重要人物，在元祐朝也认为在京东推行的治铁法、保马法和在福建推行的盐、茶专卖法必须改正，一天不改正就有一天的危害，但认为免役法与其他新法不一样，可以不必改。

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虽然早已赋闲，但依然关注着朝政。元祐朝廷频频废罢他创建的新法，他每次听了都不在乎，都不作声。当他在病榻上看到朝报报道司马光拜相了，慨然说了一句：“司马十二作相了！”但没有评说什么。后来听说朝廷罢行免役法，复行差役法，他才惊愕地失声说：“连这个也罢了？”过了好一阵，他又缓缓地说：“免役法终究是不该罢的。我与先帝反反复复讨论了两年，讲求其中利害，然后才付诸实施。不该罢呀！”

因为朝中对役法仍有不同言论，加之复行差役法也有许多具体政策需要研讨制定，朝廷便于二月二十八日设置详定役法所，委派一些官员担任详定役法（详定役法是临时职务），负责研制役法事宜。苏轼亦被任命为详定役法。

苏轼是一个办事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尤其涉及维护百姓利益的事，他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去办，不会半途而废。既然朝廷叫他参与详定役法，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百姓利益说话，于是他再去政事堂向司马光陈述不要复行差役法的理由。司马光听着听着就不高兴起来，最后竟然怒容满面。苏轼也气恼了，责问司马光：

“从前韩魏公（按：即韩琦）主张在陕西征集义勇并在其手背上刺字，您当时任谏官，与韩魏公极力争辩，尽管韩魏公不高兴，您还是不肯退让。我以前听您详细讲过这件事。难道您今天当了宰相，就不许我直言吗？”司马光这才勉强地笑了笑。但是，两人还是不欢而散。

苏轼非常气愤，回到家里一面脱官帽、解腰带，一面连声叫骂：“司马牛！司马牛！”

苏轼在详定役法所商议役法的时候，说应当将现在积累的免役宽剩钱拿来雇募服役人，以一年为期，在这一年中命令朝内朝外详细研讨，然后再立法。——这原是谏官苏辙的建议，目的是使差役法缓行一年，以便有充裕的时间研讨役法。苏轼又说，衙前役还是照原先的做法，用坊场、河渡钱雇役。他的这些建议，却遭到同是详定役法所官员的孙永、傅尧俞、韩维等人的诘难。

苏轼又跑到中书省和政事堂向执政讲解差、雇衙前的利害，主张衙前可雇不可差。但没有取得支持。

苏轼跟宰相司马光和其他执政大臣以及详定役法所的官员都讲不通，那就只有给太皇太后陛下讲了。于是，他写了一封“论招差衙前利害”的奏状递了上去。“论招差衙前利害”是苏轼的原话。由此可知，这封奏状是论述用田招募衙前之利和差派衙前之害的。苏轼一直主张给田募役，而这封奏状只求实行给田招募衙前役，因为衙前役害民最深。在司马光他们坚持复行差役法的情况下，苏轼只能退后一步只争取避免衙前之害。万分可惜的是，苏轼这封奏状没有流传下来，给苏学研究留下不尽的遗憾。

苏轼退后一步，可司马光的追随者半步也不让，而且一窝蜂地披挂上阵，一齐向苏轼开火——当太皇太后陛下将苏轼的奏状发到详定役法所讨论的时候，谏官王岩叟立即上书“论给田募役十弊”，批驳苏轼的建议。今天读王岩叟这篇论文，可知他只是虚张声势地提出实行给田募役可能出现的十种现象，而这十种现象是可以预防、避免和解决的，他并没有说明给田募役对国家、对百姓有什么固有的危害。接着，监察御史上官均和孙升、言官王觌纷纷上书，驳斥苏轼的主张。由此，苏轼“论招差衙前利害”奏状就搁置了起来。后来苏轼说“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就是指这一情形。不过，这“仇”在司马光死后多年也没有了结。

苏轼没有想到司马光完全不从实际出发考虑哪种役法对百姓才有好处，而顽固地坚持复行差役法，也没有估计到那些台谏官们为了迎合司马光而求取晋升，竟然不顾百姓利益胡说八道，更没有料到自己从亲行各种役法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有利于百姓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用，反而遭到多人的批驳。他非常气愤，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庞大的势力面前是无能为

力的，于是他请求罢免自己的详定役法职务。不几天，圣旨批准了他的请求，可是给事中胡宗愈却封还了圣旨。<sup>[4]</sup>苏轼即于五月二十五日再上《乞罢详定役法札子》，说臣最近上奏论招差衙前利害状，见解偏执，请求罢免详定役法职务，胡宗愈不了解情况封还了圣旨。臣此前的议论确实疏阔。但是，衙前是招还是差，利害关系非常重大，并非只是役法中的一事而已。臣既然有不同意见，决不肯跟随众人一起签字表示同意。请求陛下尽快降下圣旨罢免我的详定役法职务。同时他又给中书省上了《申省乞罢详定役法状》，说自己最近奏论招差衙前利害，见解偏执，请求罢免详定役法职务。二十六日，圣旨却命苏轼继续担任详定役法。

既然还要担任详定役法，就得履行职责。苏轼于六月十三日上了《论桩管坊场役钱札子》，建议把坊场、河渡收入的钱，城镇人户和乡村单丁户、女户、官户、寺观出的役钱，以及增收的酒钱，统一储存保管起来，用于支付衙前酬金、召募纲运官吏等诸般开支。如果本州不够开支，即向本路申报，从别的州调钱支援。如果本路不够开支，即向户部申报，从别的路调钱支援。开封府管辖的地方，一县不够开支，即向提点司申报，提点司再向户部申报，由户部设法解决。钱开支后有余的州、县，不得因为有余而额外支出；钱不够开支的州、县，也不得因为钱不够开支就将招募役人改为差派役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安抚苏轼，朝廷同意按照他的建议办。

六月十四日苏轼又上《论诸处色役轻重不同札子》，说各地色役（即职役）都是依照本地的需要来设置的，服役人的负担轻重有所不同，比如盗贼多的地方，弓手、耆长的负担重；赋税难于催收的地方，户长的负担重；当地人不精通书算的地方，曹司的负担重。所以，很难将各种职役统一规定等级而统一立法。今后如果衙前招募够了，就需在第一等户中差派次重（比衙前稍轻一点）的役役（因为以前的衙前是由第一等户承担的）。苏轼建议，由朝廷委派各路监司根据本路各州实际情况，一州一州地与官吏共同研讨，确定当地职役轻重的等级，从上等户起依次差派。也许又是为了安抚苏轼，朝廷又同意按照他的建议办。

但是，给田招募衙前的建议仍然不见采纳，苏轼即于七月初二日上《再乞罢详定役法状》，说臣先曾奏论衙前一役只能招募、不能差派，执政不以为然，至今亦不蒙施行，但臣愚蠢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近日又看见吏部尚书孙永奏状驳臣所论。臣愚暗无礼，上与执政、下与本所官员（孙永也是详定役法所官员）的意见

都不一致，若不罢免臣的详定役法，执政想立的法就不能立成（因为苏轼坚持不肯签字表示同意）。所以请求陛下早降圣旨罢免臣的详定役法。

这次圣旨批准了苏轼的罢职请求。但是给事中孙觉又封还圣旨，并且请求朝廷将苏轼的奏章和孙永驳苏轼的奏章，一同发付给台谏官、给事中、中书舍人和郎官议定谁是谁非，然后才决定推行什么、罢停什么。

给事中胡宗愈、孙觉先后封还批准苏轼请求罢免详定役法的圣旨，表明朝中希望苏轼留在详定役法所抵制复行差役法大有人在，孙觉的建议从表面看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支持苏轼主张的。

苏轼明白虽然有好些官员支持自己的主张，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不想再做无用功，便向中书省上了《申省乞不定夺役法议状》，说我前后对役法发表的意见，自己知道不严密有谬误，决难施行，所有是与非，更没必要交大家讨论定夺。我只请求按圣旨办，我从本月后不敢赴详定役法所签书公事。读苏轼这份议状，可以明显感受到苏轼心怀怨愤。最终朝廷同意他辞去详定役法。

孔凡礼《苏轼年谱》元祐元年（1086）七月丁巳（初二日）条下载：“尝见司马光，再陈差役弊，光不悦。乞外补，不许。”苏轼多次找司马光陈述差役法的弊端，起初司马光对苏轼没有不悦，随着苏轼陈述次数的增加，司马光对苏轼开始不悦，慢慢就讨厌他了。苏轼也很生气，有一次竟对司马光说：“相公此论，故为鳌斯踢。”司马光不理解，问道：“鳌安能斯踢？”苏轼说：“您这就叫鳌斯踢！”苏轼心想自己关于役法的建议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利，而且自己已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说服执政采纳自己的建议，可是最终劳而无功，还弄得彼此不高兴。他看出司马光一切只按老办法老规矩办事，没有一点创新精神，跟自己一贯从实际出发、从百姓利益出发，不断革弊创新的施政理念不合辙，明白今后自己的主张在朝中万难被司马光们采信，那么自己待在朝廷不但不起作用，反而徒增苦恼。他经过反复思考，反复较量，决定主动申请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工作，为百姓做点实事好事。于是他向朝廷上了乞外补的奏章，但太皇太后陛下没有批准。可惜的是，这封乞外补的奏章也没有流传下来。苏轼几次请求退出详定役法所，就已经惹恼了司马光，现在他又请求外补，司马光就愤怒起来，也想把苏轼驱逐出朝廷。谁知司马光一天一天病重起来，还没有来得及把苏轼驱逐出朝廷，他就呜呼哀哉了。

苏轼后来这样回忆这段役法之争：“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即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议。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sup>[5]827</sup>

“始论衙前差雇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sup>[5]913</sup>“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sup>[5]827</sup>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概述了苏轼与司马光之间的役法之争：“时君实（按：司马光字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按：指苏轼）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sup>[6]1121</sup>

按理说苏轼离开了详定役法所，而且又与司马光们闹得不愉快，就应该不再参与役法的议论。可是，苏轼一旦发现役法中的问题，还是忍不住要给朝廷提出合理的建议。他在八月初九日上的《论高强户应色役疏》中说，各路的高强户都列在第一等户中，但高强户与一般的第一等户比较，他们的家业钱财相差却很大，可他们服一样的役，显然不公平。他建议，如果第一等户的家业钱财为二千贯，高强户的家业钱财达到四千贯以上，那么他就应该比一般的第一等户多服役一年。家业钱财更多的高强户，按此数类推，最多不超过多服役五年。

司马光逝世刚满五个月，太皇太后高氏跟苏轼谈及役法，苏轼就向太皇太后陛下、哲宗皇帝陛下讲述了自己跟司马光争论役法的情形，并且说给田募役法现在还可以推行。苏轼退出殿堂后，就把他刚回东京的时候撰写的《论给田募役状》抄录出来上奏，并写了《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建议朝廷如果以为可以施行，就令范纯粹详细论述给田募役之利害。由此可见，苏轼并没有放弃自己关于役法的主张，一有机会他就要争取朝廷采纳自己的建议。

元祐三年（1088）三月初九日，苏轼上了《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说差役之法天下人都以为不利，独有台谏官数人坚持认为差役法不可改变，他们磨刀霍霍地往四下里看，看谁敢发表反对意见。所以人人害怕，不敢说出不同

看法。最近有个离京城很远的小臣叫张行者的极力揭批差役法的弊端，谏官韩川对张行者深加诋毁，甚至要将他重行编窜（类似于开除流放）。司马光在世时候，他们迎合司马光的意思；司马光去世后，他们又妄想陛下会坚守司马光的意见。他们不知道司马光至诚尽公，本来就不喜欢别人迎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不会不广泛听取意见。如果司马光现在还活着，看见差役法有弊端，早就改正过来了。臣每次见到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按：都是宰执大臣），他们都说差役法不利百姓，只因为已经推行，不便轻变，加之害怕与台谏纷争，难以调和。希望陛下询问吕公著等人，命令他们陈述差役、雇役各有什么利害。过去实行雇役，中等人户一年出钱多少，现在实行差役，平均一年花费钱多少，两相比较，利害一下子就清楚了。复行差役法后，农民在官府服役，受贪官污吏的百般蚕食，比出钱雇人痛苦十倍。五路百姓大都不习书算，被差为手分（会书算的一种服役），便要雇请他人代役，花费更多。所以说差役法不能不改。

从上面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苏轼回到朝廷后的两三年间，在役法的议论中虽然碰了许多钉子，惹了不少麻烦，甚至跟台谏官员结下了仇怨，可是他为了使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坚持不懈地向朝廷建议罢行差役法，改行有利于百姓的雇役法或给田募役法。其为百姓争利益的立场坚定不移。

在宋代，役法跟赋税法一样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法，制定役法是国家大事。制定什么样的役法比较有利于百姓，是苏轼始终关注的焦点。他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做官，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所行役法对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力求避害趋利。可是一直以来，一些书籍、文章对苏轼在役法方面的立场、态度、表现，缺乏正确的评述，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一、说苏轼批评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就是反对改革差役法。这是违背逻辑的误解。苏轼早在任凤翔府签判的时候，就向宰相韩琦上书反应凤翔百姓最怕服衙前役，还反应用，把瓮盎釜甑都算尽其家业钱财不到二百千钱的人户也免不了被差遣服役。他感叹道：把瓮盎釜甑算上还不满二百千钱，连生存都困难，可还要服差役，“王民”真难做啊！可见他对差役法是深恶痛绝的。那时他就不仅有改革差役法的念头，而且利用手中小小的职权修改了衙规，减轻了服衙前役人户的损失。苏轼针对役法发表了不少文章，人们从中却找不到一句肯定、维护差役法的话。苏轼批评王安石推行的免役

法，主要是批评他借推行免役法过多地收取百姓钱财，加重百姓负担，对用钱雇役这种方式并没有异议，也没有说不能用雇役取代差役。如果王安石用国家税赋收入雇用职员，而不叫百姓缴纳各种役钱，苏轼一定会举双手赞成。所以，不能说苏轼批评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就是反对改革差役法。

二、说苏轼在熙宁时批评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在元祐时又反对司马光罢行免役法，是从反对免役法转变为肯定免役法。这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的误解。前面说过，苏轼批评免役法主要是批评王安石借机掊敛民财，对雇役这种方式并没有反对。他跟司马光争论役法时，也指出“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sup>[7]108<sup>10</sup></sup>说免役法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sup>[5]79<sup>1</sup></sup>把苏轼十几年前对免役法的批评和十几年后对免役法的评价作比较，不难看出是多么的一致！十几年前的批评，是苏轼对施行免役法后果的预见；施行免役法十几年后出现的状况是对苏轼预见的证实。苏轼对免役法的批评意见前后一致，没有矛盾，苏轼亦对司马光说免役法和差役法“二害轻重盖略相等”。因此，苏轼不存在从反对免役法到肯定免役法的转变。苏轼明确指出免役法掊敛民财，有二弊，并没有完全肯定免役法。苏轼与司马光争论的根本点在于反对司马光复行差役法，并非是为了捍卫免役法。

三、说苏轼反对司马光罢行免役法，表明苏轼已改变了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由变法的反对者转化为变法的拥护者。这是罔顾事实的误解。免役法仅仅是王安石推行的一项新法，不能代表全部新法，更不能代表王安石变法。何况苏轼仅仅为了反对司马光复行差役法，才建议保留免役法，而且要改革免役法的两个弊端。所以不能说苏轼由此转化为变法的拥护者了。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苏轼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做了如下的评述：“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至于学校贡举，亦已罢斥佛老，禁止字学。”“二圣嗣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诚一、吴居厚、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何正臣、卢秉、蹇周辅、王子京、陆师闵、赵济、中官李宪、宋用臣之流，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以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効札子二首》）<sup>[5]832~833</sup>这些义正辞严的句子，足以表明苏轼对王安

石的政治表现及其变法丝毫也不认同，足以表明苏轼始终没有改变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始终没有由变法的反对者转化为变法的拥护者。

四、说苏轼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这是挪用概念的误解。因为司马光坚持复行差役法，苏轼才建议他去掉免役法的两个弊端之后保留免役法。这就是说，苏轼仅仅建议保留免役法，而且还要对免役法加以改造，并非原原本本地保留。对于司马光废除王安石的其他新法，苏轼不但没有反对，而且是赞成的。不明确说明苏轼在役法方面跟司马光的具体分歧，而笼统地说苏轼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容易使人误认为苏轼是王安石新法的拥护者、捍卫者。

### 注释

[1] 贯石，是复合的计量单位。贯是钱的计量单位，一千钱为一贯，但在宋朝一贯不足一千钱。石是粮食的计量单位，一般以十斗为一石，宋时以五十斤为一石。笔者曾经致函请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女士如何解释贯石，她回信说：“‘贯’指钱，‘石’指粮食……古人算 GDP，就这么一股脑地拿上来。”

[2] 三国时期，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均属正一品，是极高的官职。

[3] 府兵：平时种田、战时从军打仗。打仗的武器、马匹由府兵自备。府兵由各折冲府选拔和训练。长征之卒，就是长期征战的士卒。

[4] 神宗元丰五年实现新官制，增设了门下后省，专掌封驳、书读诏命。将此前只作阶官名称的给事中改为职官，为门下后省的长官，属正四品，掌审读中央颁降的文书和地方上奏的重要文书，如有不当即驳回，如允可即签字放行。

[5]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 高秀芳、陈宏天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7] 脱脱等撰：《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赖正和，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苏洵求官心路浅探

有愚

**内容提要** 自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访苏洵起，苏洵再有意于仕途，希望将多年潜心钻研、历尽心血构建的政治理想加以实现，无奈现实残酷，直到最后也未能达成所愿，年仅五十八岁便郁郁而终。本文从苏洵从至和元年到去世期间的作品、行踪出发，对其求官途中的心态变化进行探究，以期对他这段时间的思想和创作进行更为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 苏洵 求官 心路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九日和韩公》<sup>(1) 496</sup>

北宋治平三年（1065）重阳，五十七岁的苏洵应邀参加了宰相韩琦的家宴。在这场宴会中，韩琦邀请的多是像欧阳修这样的朝廷要员，只有苏洵职位最为卑微，时任霸州文安县主簿的九品官职。宴会中宾客们把盏言欢，口吐珠玑，纷纷唱和，只有华发萧萧的苏洵无心美酒佳肴，更无心把酒言诗，只是端坐，心事重重。傍晚归家适逢大雨，苦冷难耐，苏洵久久难眠，于是写下这首诗歌。

自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访苏洵起，苏洵再有意于仕途，希望将多年潜心钻研、历尽心血构建的政治理想加以实现，无奈现实残酷，直到最后也未能达成所愿，年仅五十八岁便郁郁而终，留下千古遗憾。此诗便可看做他求官路途的真实缩影。

## 一、出蜀求官：充满希望、信念坚定

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到任成都府，遍访群贤，听闻眉山处士苏洵的才德，很是欣赏，表达了愿见之意。随后，苏洵上书张方平并登门拜访，张方平“听其言，知见博物洽闻矣。既而得其所著《权书》、《衡论》阅之，如大云

之出于山，忽布四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注于海……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文安先生墓表》）<sup>(2) 148</sup>，遂待以国士。雅州太守雷简夫更是与之一见如故，给予苏洵极高的评价，盛赞他是“天下之奇才”、“真良史才”、“帝王师”、“王佐才”。

张方平、雷简夫的激赏让苏洵激动不已，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苏洵怀揣经世治国的理想，自十八岁起两次参加进士考试皆无功而返，又举制策、茂才异等也不中，不觉心灰意冷，后杜门家居，“一顿俄十年”，取古代圣人、贤人之文专心研读，自觉大有所益，在眉山附近小有名气，然而从未得到过像张方平、雷简夫这样的政坛泰斗的盛赞。他们的肯定又重新点燃了苏洵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在张方平推荐苏洵出任成都学官无果后，张方平与雷简夫鼓励苏洵远游京师，寻求更大的发展。雷简夫亲自向文坛领袖欧阳修、宰相韩琦上书引荐，张方平更是打破僵局向之前的政敌欧阳修极力推荐苏洵。

这时的苏洵是无比欣喜、充满希望的，然而前路茫茫又让他惶惑，多次科考失败的经历更让他隐隐担忧。他在《木假山记》中写到：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余，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潰，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sup>(1) 404</sup>

文中向我们展示了树木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树木要活下去，要成材是极难的，要逃脱厄运也是极难的，作者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写树木的遭际，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那个人才受到压制的社会，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

处在厄运之中，有多少有用人材被无端毁掉。偶尔有一个半个被“好事者”看中了，取用了，“强之以为山”，但也是被用来做成木假山式的装饰品，供人装饰其门面。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遭遇尚且如此，而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作者在对树木种种不幸的描绘中，流露了自己的深切忧虑。

出蜀求官的苏洵是忐忑的，同时也饱受争议的，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旁人看来这个多次科考失利的老夫子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简直就是沽名钓誉之徒，在近天命之年还要背井离乡求取功名更是不可理喻。甚至苏洵在后来名动京师，有人也始终不相信，认为是天方夜谭。苏洵后来在《答二任》中无奈地写道：

昨者入京洛，文章被人夸。  
故旧未肯信，闻之笑呀呀。(1) 448

虽然压力很大，苏洵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念，他在东往京师的途中遇到故人陈公美，作《又答陈公美三首》既劝慰故友又表明心迹：

仲尼鲁司寇，官职亦已优。  
从祭肉不及，戴冕奔诸侯。  
当时不之知，为肉诚可羞。  
君子意有在，众人但愆尤。  
置之待后世，皎皎无足忧。(1) 465

诗中写道孔子身居鲁司寇这样的高位，而仅仅为鲁国郊祭之肉不及，就离开鲁国奔走诸侯国。当时的人们认为孔子仅为肉而出走，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后世责难者也众多。苏洵认为，孔子奔走诸侯国是为了施行其道，郊祭之肉不及，只是一个导火索，可以看出鲁国不欲行其道、用其说，所以奔走他国。孔子的行为就如皎皎明月般照亮后人。苏洵借孔子之事劝勉陈公美勿以他人责难自己惶惶仕途以求升迁为羞，同时也告慰自己勿以他人嘲笑自己为求升之禄奔走他乡为耻。他认为：求国之禄，食国之禄，为国办事，何罹于他人责难。

仲尼为群婢，一走十四年。  
荀卿老不出，五十千诸田。  
顾彼二夫子，岂其陷狂颠？  
出处固无定，不失称圣贤。  
彼亦诚自信，谁能恤多言。(1) 465

在第二首诗中，苏洵再叙孔子因鲁君受齐之女乐而离鲁，一去十四年，受齐之女乐不过是小事一桩，孔子未免小题大做。荀子少壮不出仕，到老了却汲汲功名，五十岁才来齐求官。两人的行为都让人无法理解，众人称之为狂颠。苏洵认为，人的环境、思想、素养、操守不同，立身、谋事之道便不同。孔子、荀子从其特定

环境出发，行其道以利天下，并矢志不移以行之，所以能成圣贤。苏洵此次出蜀，议论之人众多，有人甚至以狂颠论之，苏洵以荀子自喻，他告诉陈公美要坚信自己的选择，长此以往流言自然会平息。

第三首诗再以汉代公孙弘年少时遭放逐，在海滨牧羊，后来在乡人的推选下年六十到长安，后官至宰相，大有建树为例表明：大丈夫立身于世，当出仕则出仕，当如公孙弘般顺应时势，不必坚持不出以沽名钓誉。孔子、孟子终生为行其道，如逆旅过客，未得安宁，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坚定信念、施行己道、为民造福。

小结：十年的发奋苦读，殚精竭虑，不仅使苏洵文采斐然、思想深邃，更让他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国。张方平、雷简夫的慧眼识英为苏洵带来了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尽管多次应举失利让他隐隐忧虑，周围更是阻力重重，他还是怀揣坚定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求官之路，因为他知道：只有行动才能带来希望。

### 二、名动京师：一官难求、坚持自我

嘉祐元年五六月间，苏洵父子抵达京师。才华横溢的苏洵同样受到了文坛领袖欧阳修和枢密使韩琦的大力推崇，成为韩琦的座上宾。欧阳修一见其文称赞不已，叹为“此孙卿子之书也。”(《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颍滨遗老传》)苏洵“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文安先生墓表》)王公大臣、士大夫们争相识面，以与苏洵相交为荣。

张方平、韩琦、欧阳修等朝廷重臣的激赏，众多王公大臣、士大夫们的极力推崇，使苏洵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对前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他自认为是当代的杰出人才，他自信在政治、军事方面见解独到，可以致用当世。他开始主动出击，纷纷向宰相富弼、文彦博，枢密副使田况等当朝重臣上书，毛遂自荐，不卑不亢，大胆指陈时弊。这个时候的苏洵是极为自得的，他在《上田枢密书》中说：

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今洵用力于圣人之术亦已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传于后与否，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夫岂无一言之几乎道？千金之子，

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负，或者天其亦有以与我也。<sup>(1)</sup>

317

苏洵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天赋予自己才能如果不能尽力施展，则是对上天的亵渎。他委婉陈述自己已得圣人、贤人之道，希望能得到田枢密的推荐，不逆上天之意。

苏洵在写给朝廷重臣的求荐信中言辞大胆激烈，直指当朝的时弊，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种种不作为。他在给韩琦的信中写道：

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罹谤。好名则多树私恩，罹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才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上韩枢密书》

(1) 303

书中犀利地指出当今的政府兵多质量差，战斗力低下，军纪涣散，甚至时常发生兵卒叛乱的事情，其根本的症结在于“大臣好名而罹谤。好名则多树私恩，罹谤则执法不坚。”他在后文提出“杀一儆百”的建议，效仿唐代的李光弼。他认为韩琦做了几个月枢密使了，但却不整顿军纪，不敢杀人立威，是推个人之威，求个人之名的表现。至于他在《上富丞相书》中对富弼的责难就更为直接了：

方是之时，天下咸喜相庆，以为阁下惟不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后起，起而复为宰相，而又值乎此时也，不为而何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厚也，不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后有下令而异于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获见也，戚戚然而疑。呜呼！其弗获闻也，必其远也，进而及于京师，亦无闻焉。<sup>(1) 307~308</sup>

书中直指富弼入相以来无所作为，这与仁宗起用他为相时“天下咸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失望不已。这样的言语，形似委婉实则十分尖锐，几乎把富弼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

然而苏洵虽然声名鹊起，他的求荐信却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欧阳修上书皇帝推荐他，也一直未能得到回应。长时间的等待，消磨了苏洵的信心，使他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当中，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其实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苏洵却不愿为达到目的而改变自己，他在《有触者犊》中写道：

有触者犊，再箠不却。

为子已触，安所置角？

天实畀我，子欲已我。

恶我所为，盍夺我有？

子欲不触，盍索之笠？<sup>(1) 441</sup>

这首诗写作于嘉祐元年上韩琦、富弼书后。诗中写道触的由来，有角方能触物，触是上天赋予的禀赋与性格。犊由于有触惹出了许多麻烦，于是有人劝犊不用触。犊坚定反驳，认为有角是天性，不触就是违反天性。那些害怕犊触角的人，不是已经遭到了犊触角的抵触，就是即将遭到犊触角的抵触的人，他们因畏惧而产生嫉恨之情，公然提出让犊放弃触，甚至把犊逼迫到了更加危险艰难的境地，然而犊却毫不退让、一往无前。作者借犊的不屈不挠，展现了自己永远不会妥协、失去自我的决心。

嘉祐元年冬天，苏洵得知张方平从益州调入京师作三司使后喜出望外，携童仆亲自到郑州去迎接。没等来张方平，迎来的却是趾高气昂的宋祁，碰了一鼻子灰的苏洵尴尬不已。回京后，大失所望的苏洵给张方平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当时冒雪远迎的苦况：

昨闻车马至此有日，西出百余里迎见。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烈，童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sup>(1) 347</sup>

信中描述了种种惨状：苏洵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之日，一路兼程、马不停蹄到郑州时，风尘仆仆、双唇乌黑、面无人色。主仆到一家旅店向主人借火取暖后，又匆忙来到城外十里左右的地方翘首以待，当看到一大队人马打着旗幡从东边奔驰而来后，立即下马立在道边恭候。一时间黄烟滚滚，人马杂沓，吆喝声、马蹄声、马嘶声交杂成一片，苏洵一行被这雷鸣般的气势吓得惊恐不安。然而，经历这样的艰辛却未能迎来张方平，而是目中无人的宋祁，苏洵既尴尬又沮丧不已。苏洵还叙述了自己到京师以来的境况，极写穷困之态，希望张方平能为之动心，再次向朝廷引荐自己。张方平十分同情苏洵的处境，欣赏他的才华，再次向朝廷引荐，可是仍然久无音讯，苏洵求仕之途依然毫无希望。

小结：苏洵犹如一道横空出世的闪电，刹那间照亮了整个文坛。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赞美

和推崇如潮水般涌来，使苏洵更为自信与自得，充满力量。然而，他的求官之路并不平坦，一次次的主动出击换来的只是一次次的打击和无尽的等待，不过一个信念却在他的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决不妥协，决不为获取官位而失掉自我。

### 三、归隐之念：理想幻灭、亲友离去

嘉祐二年四月七日，程夫人突然病卒，苏洵父子三人悲痛万分，仓惶返蜀，甚至来不及与欧阳修、张方平等告辞。苏洵在后来给欧阳修的书信中写到了当时的凄凉之境：

昨出京仓惶，遂不得一别。去后数日，始知悔恨。盖一时间变出不意，遂扰乱如此，……今已到家月余，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洵离家时，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洵老矣，恐不能复东。阁下当时赐音问，以慰孤耿。

——《上欧阳内翰第二书》<sup>(1) 336~337</sup>

程夫人的死对苏洵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位18岁起就与他相伴的妻子温良恭谨、勤俭持家，不仅为苏洵发奋苦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更是培养出了苏轼、苏辙这两位旷世奇才。在苏洵眼中，程夫人是贤妻更是良师和益友。她辛苦操持多年，正当苏家硕果初结之时却先他而去，这怎能不使年过半百的苏洵悲痛万分。苏洵在《祭亡妻文》中说：“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伤心故物，感涕殷勤。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sup>(1) 429</sup>其悲恸之情溢于言表。

不幸之事总是接踵而来，安葬亡妻不久，好友史经臣病倒了，他与这位心心相惜、志同道合的好友相交多年，是知己更是亲人。苏洵听闻病讯奔走往问、心急如焚，与老友同举制策“破窗孤灯，冷灰冻席，与子无眠。旅游王城，饮食寤寐，相恃以安”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现在却是“问以后事，口不能语，悲来塞咽。”白发斑斑的苏洵再也承受不住这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他心力交瘁、卧床不起，甚至无法亲自送好友最后一程，只好“哭书此文，命轼往奠，以慰斯魂”<sup>(1) 425</sup>。

丧妻、亡友，求仕途中的屡屡受挫，饱经风霜的苏洵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哀与无奈，

隐居山林、以此终老的想法时时萦绕心间，他在《老翁井》中写到：

井中老翁误年华，白沙翠石公之家。  
公来无踪去无迹，井面团团水生花。  
公今与世两何预，无事纷纷惊牧竖。  
改颜易服与世同，毋使世人知有翁。<sup>(1) 516</sup>

诗中老翁年华已逝、白发苍苍。他既没有亲人，也没朋友，不喜欢与人交往，独来独去，只留给人们一个远远的身影和井面上团团升起的水花，引发人们无穷的遐想。老翁不问世事，与世无争，超凡脱俗，他经历了不知多少年的岁月沧桑，大隐隐于纷纷扰扰的人世，居于幽静而宜人的井中，只想以山为伴、以泉为家。

文中的老翁其实就是苏洵的化身，老翁的生活也是他此刻的向往。他少年落拓不羁、胸怀大志，仗剑去国、远游四方。二十七岁发愤苦读，才华横溢，然三次应举皆不中。后醉心学术，十年寒窗，晚年名声大振。然而现实却依然残酷，眼看暮年将近，苏洵没有迎来自己理想的实现却等来了发妻、好友的离世。

嘉祐三年十一月，朝廷召苏洵试策论舍人院，他以“负薪之疾”辞之。对于这个特别加恩，苏洵是非常气愤和懊恼的，也使他对求官之路更加地心灰意冷。他在给好友雷简夫的信中说：

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为信其平生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恐复不信，祇以为笑。

——《答雷太简书》<sup>(1) 362</sup>

他认为《权书》、《衡论》、《几策》是翰林学士欧阳修认为可进而呈朝廷的，如果朝廷认可我，相信欧阳学士的话，那还需要什么考试？如果连自己闲居十年的心血之作都不肯相信，那一日考试中的仓卒之言又何足取呢？这分明是对自己的轻视和不信任。

对于考试，苏洵是心有余悸的，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少年应举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

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与梅圣俞书》<sup>(1) 361</sup>

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再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不仅让人无法忍受，而且会让人轻笑——儿子都已经有功名了，作父亲的还要到舍人院考试，难道想做官急成了这样吗？这实在

是让人感到悲哀和羞愧之事。

嘉祐四年六月，苏洵《上皇帝书》进呈半年之后，朝廷的第二次诏命下达，仍是要他参加舍人院考试。对于这样的结果，苏洵感到既心酸又无奈，他再次委婉拒绝了朝廷的诏令。

小结：陶渊明式的田园诗意图生活是每一个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丧妻、亡友，求仕途中的屡屡受挫，饱经风霜的苏洵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哀与无奈，而朝廷两次召试策论舍人院更是让他心灰意冷，此时的苏洵只想隐居山林、以此终老。

#### 四、再赴京师：失望苦闷、老有所托

嘉祐四年十月初，苏洵带着复杂的心情与二子再赴京师。父子三人一边赶路一边游览河山吟诗作赋，直至嘉祐五年二月中旬方才到达。六月欧阳修再荐苏洵，先他回京述职的益州转运使赵抃也已把苏洵作为本路人才，再次向朝廷推荐了他的行义。郁郁不得志的苏洵依然清高，虽然他知道现在是欣赏他的韩琦担任当朝宰相，但是他却不去打听，只是静候朝廷的安排，希望事情能获得转机。

八月，他被授予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职务。这个时候的秘书省只负责日常祭祀祈祝活动中文字方面的准备工作，“校书郎”也不过是空有校讎典籍之名，实际上的任务和撰写祭辞祝文之类相关，官爵最低是九品。苏洵身为布衣不肯通过考试就职，所以“校书郎”前面加着“试”字，就是试用、代理的意思。这样的结局，使苏洵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虽然心灰意冷，但却不得不接受这个承命。苏洵分别给欧阳修、韩琦、富弼写信，对他们的破格拔擢表示感谢，同时也解释了自己一再推辞诏命不去参加考试的原因，字里行间颇有不平之气。他还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委婉地批评了朝廷的用人制度，充分显示了布衣尊严。

校书郎是一个闲职，基本无事可做，一年多来，苏洵仍然难以从落寞的心绪中完全摆脱出来，他对功名早已心灰意冷，的只是幻灭之后的感慨。他觉得自己虽然已经错过了入仕的最佳年龄，但自己能做的事情还很多，绝不止这个“试校书郎”。他搞不懂汉唐时期平民布衣可因一言而位至公卿宰相，当今号称盛世，真正有才华抱负的人想要有点作为，却简直如登天一般难。郁郁不平之气时时涌上心头，他在《朝载日昇》中云：

朝日载昇，薨薨伊氓。  
于室有绩，于野有耕。  
于涂有商，于边有征。

天生斯民，相养以宁。

嗟我何为？踽踽无营。

初孰与我，今孰主我？

我将往问，安所处我？<sup>(1) 442</sup>

太阳从东方升起，万民享受着上天的恩惠，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男、女、商、兵各得其所，相互协作扶持，构成安宁、和谐的大社会。而自己却独独不在此列，只能独自徘徊踯躅，无所适从，无人可倾诉、无人可交流。当初，有人与我同游，现在同游的人在哪里呢？当初有人为我主宰，施以援手，现在为我主宰的人在哪里呢？我要问问苍天：我的归处在哪里？整首诗充满了孤独凄凉之感、悲愤痛苦之情。

但是这样的牢骚恐怕只有在诗文中抒发了，苏洵虽被朝廷授予官职，但是因为官职卑微，月俸也低，只有六七千钱，连养家糊口都较为困难，而且他已经五十多岁还要“守选数年”等待空缺，悲愤之余，一直颇有傲气的苏洵不得不拉下脸面向韩琦写信求官：

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贤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胜于今，粗可以养生遗老者耳。去岁蒙朝廷授洵试校书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过听，而洵侥幸，不过得一京官，终不能如汉唐之际所以待处士者；则京官之与试衔，又何足分多少于其间，而必为彼不为此邪？然其所以区区无厌，复有求于相公者，实以家贫无资，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韩丞相书》<sup>(1) 352</sup>

苏洵在信中写道自己年老且无所事事，家产破坏，并不是希望朝廷像对待贤俊一样，只要求给一个能养老活命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次写信求乞官职，实在是因为“家贫无资”，根本没办法养活家人。其言语凄楚，让人不忍卒读。

几天后，苏洵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官级由九品升为八品。原来朝廷打算让太常寺修纂从宋太祖赵匡胤以来的《礼书》，工程量浩大，准备由欧阳修负责主持协调，欧阳修向韩琦推荐了苏洵，总算让闲置已久的苏洵有了正式的差事。修纂礼书是一项需要较高专业知识才能胜任的工作，苏洵以前就著有《谥法》、《谥录》等书，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了。加上这次编纂工作又由对苏洵父子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负责，苏洵觉得自己多少有了一点用武之地，心中稍许安慰。

（下转第 67 页）

# 《后杞菊赋》主旨别解

饶学刚

**内容提要**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秋，苏东坡在密州太守任上，作《后杞菊赋》。他以自我嘲笑式的设问、动人情理的回答来揭示他忧患仕宦人生的难言之隐。东坡把人生看得淡然，以为不论什么样的身价人物，最终“归于一朽”。面对严重自然灾害和政治漩涡，东坡仍以超然的情怀，从杞菊的民生滋味中吸取了儒佛道的治政哲理，透视人生，造福一方；从而铸造了他“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的仕宦人生美。

**关键词** 苏东坡 《后杞菊赋》 斋厨索然  
日食杞菊 清廉仕宦人生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秋，苏东坡在密州太守任上。时年四十。是他青春的黄金岁月，是他壮志难酬的岁月，也是他贫困、爱民、清廉的岁月。作《后杞菊赋》以言志，度过他“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的仕宦生涯。

据乾隆《诸城县志》载，东坡知密州时，当地连续七年大旱。熙宁七年，“自秋至冬不雨”。熙宁八年“春夏旱”，蝗虫泛滥。东坡为民请命，急上丞相韩绛书，陈述蝗灾，宜量捐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论方田均税、手实法、免役法之患；请京东、河北免榷盐等。

宋朝官员俸禄较厚，但外任官员收入微薄，东坡家境尤为清贫。灾情严重，东坡与通判陈廷式等采杞菊以食。其内心情缘全在于他心系民生。

同年秋，东坡感叹“斋厨索然”。唐代农学家陆龟蒙，即文中自号的“天随生”曾种植杞菊以食作《杞菊赋》；东坡效之而作《后杞菊赋》，以示涟水令盛侨。侨转示张文潜。文潜作《菊赋》赞美东坡，开始亮出东坡食杞菊缘于心系民生之情愫。

熙宁九年元月，东坡登超然台，作《超然台记》，

再次提及“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情怀。元祐六年，东坡知颍州，作《到颍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戏作》，深深忆及密州斋厨索然、采食杞菊之坦然乐观心绪。“戏作”，暗示他的仕宦生活有难言而又诙谐之隐。

东坡所写的《后杞菊赋》情结可不一般。与《寄刘孝叔》、《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诗一样，终被诬以“讥讽朝廷法度屡更”，“讥讽新法事多”，“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这就是东坡忧患仕宦人生的难言之隐。但东坡旷达洒脱，超然物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之。你读读他的《后杞菊赋》，就会恍然大悟。

“赋”的正文结构分为两部分，即设问与答问。东坡设问：你堂堂的太守，有前扶后拥的人为何你不受理？超时间地辛苦办公你为何不顾忌？为何桌上不见你的酒杯，见到的只是菊和杞？昔皇后弟弟用麦饭、葱叶招待大儒井丹，为何井丹认为是对他不尊重而不吃？为何对他乡密州这么眷恋，难道嫌故乡眉州太穷了吗？这种自我嘲笑式的设问条条在情在理，一般人难以做出美满的回答。这就是东坡处世的人生智慧。还是东坡给好友刘贡父、李公择的诗《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回答得最精粹：“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是“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的残酷现实，铸就了东坡这位密州太守与民同命运、清廉为官的仕宦人生。

百姓和官都有生存权利，第一位的是要吃饭活命。东坡在密州的仕宦生涯表明：官不可不做，而官越做越穷，生活艰难，两袖清风。写密州生活的作品中，东坡三次提到“斋厨索然”。他不用官权，不搞特殊化，日食杞菊。这与那些“一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的官场生活相比真是无法理解。显示了他在底层落地生根,与民同命运,“寓意于物”(《宝绘堂记》),保持清廉的难能可贵的品格。正是这种接地气、保持清廉的品格,让东坡享受意想不到的“扪腹”之乐,作《后杞菊赋》以解嘲。

“解嘲”写得十分精辟。东坡外任密州,面临严重自然灾害和政治漩涡,仍以超然的情怀,从杞菊的民生滋味中吸取了儒佛道的治政哲理,透视人生,造福一方。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兼济天下”,东坡坚持抗旱灭蝗赈灾;佛教最大的心胸是以慈悲为怀,东坡“泪洒循城拾弃孩”。而首要的都把保全生命放在第一位,才不得不循城采食杞菊。杞菊又是养生中药,道家非常重视,故东坡坚定走“以杞为粮,以菊为糗”的生活道路,追求“西河、南阳之寿”的美好人生结局。就是说,东坡从食杞菊的民生滋味中吸取了儒家兼济、佛教慈悲、道教养生的治政哲理元素,警醒朝廷弊政,减轻赋税负担,造福苍生,书写清正廉明的仕宦人生。

“赋”的笑答写得也非常诙谐有力。人生一世,好比臂肘的一伸一屈短暂;有的人吃麦糠身体反而肥胖,有的人吃粱肉身体反而瘦弱;晋朝何曾吃饭很奢侈,南齐瘐杲之吃饭很节俭;有的人在梦中还计较谁吃得丰盛些,谁吃得节约些。可是不论何人,到头来,统统是同死腐朽。这一一道明了官吏与百姓、地位与待遇、廉与奢、富与贫、贵与贱、美与丑、生与死等最后都“归于一朽”的辩证哲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官再大,钱再多,阎王照样将你往土里拖。所以东坡把人生看得淡然。东坡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短暂;不论什么样的身价人物最终“归于一朽”;“以杞为粮,以菊为糗”仍能长寿等。我们从他的这些精辟见解中,就获得了重大的宝贵的人生启示:人们应以平常心清廉地健康地活着,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而贪得无厌,以致腐化堕落,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东坡“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的仕宦人生最美。值得我们今天的公务员、全国人民效法。

(饶学刚,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上接第65页)

虽然未能如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苏洵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工作当中,工作之余,苏洵还把精力投入到了《易经》的解读中。治平二年(1065),在他和姚辟的共同努力下《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完成,他的《易传》也初具开先河大作的风范。位卑言轻的苏洵始终心系天下苍生,他听闻韩琦欲为宋仁宗盛敛厚葬、大兴土木后,多次上书厉声劝谏,韩琦虽然不大高兴,但还是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

小结:在被授予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职务后,苏洵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他再一次陷入了极大的落寞与苦闷之中。但达者总能在绝望的生活中找到平衡。在苏洵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负责修纂礼书后,他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还耗尽心血解读《易经》,位卑言轻却始终心系天下苍生,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积极散发着他的光与热。

治平三年(1066)春天,苏洵积劳成疾,四月二十五日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他的突然离世,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惋惜与遗憾。出于对苏洵为人为文的敬重,前来吊唁的官员、名士络绎不绝,为其作挽词就有一百多人。欧阳修在挽词中这样写道:“诸老谁能先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感叹他有贾谊、司马相如之才却未能得到君王召见,对于朝廷不重用苏洵充满了不满和遗憾。宰相韩琦挽词中有“名儒升用晚,厚愧莫予先”,表达了自己未能早用苏洵这样的“名儒”惭愧和自责。宋英宗听闻苏洵死讯后特下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苏轼婉言谢绝,只请求朝廷为父亲赐官,因为苏轼深知父亲生前一官难求的苦楚。六月九日,英宗追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并要求有关部门准备船只护送苏洵灵柩回蜀安葬。

才华横溢的苏洵终究没能实现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他的悲剧其实只是众多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始终积极争取,在屡屡受挫中始终坚持自我、不卑不亢、坚守布衣尊严,无论身居何位都心系苍生,展现了一个有责任与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胸怀,也为后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 注释

[1]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 孔凡礼著,《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有愚,《苏轼研究》编辑部编辑)

## 《且行——苏祠外仰视》序二

方永江

无巧不成书。人生的诸多遭际，全赖巧合。

中学时代，琼瑶言情小说在少男少女中风靡一时。同桌郑君是个铁杆粉丝，每有琼瑶新作上市，必节衣缩食购之为快，我沾光不少，荒芜学业废寝忘食阅读之。许多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都忘却了，但是，其代表作《窗外》中的一句经典公式却印象深刻。无数的偶然相加等于必然。我摊上这些事，即是写照。

研究、创作、发掘和交流，服务三苏、替三苏跑腿，步履蹒跚、步履维艰、步履铿锵走过七年了，这一切，都是拜缘分所赐。凑巧、碰巧，所有的巧合，充满了戏剧性。

1991年6月，大学临近毕业，一天中午，从乐山李码头喝茶的大榕树下离开，往食堂去。在校门口碰上来校选人的市直机关工委领导，既非优大，更非学生会干部的我，不揣冒昧，斗胆毛遂自荐。几句交谈，打动领导，相约下午直接到机关办公室深谈。一去就定下了我。虽因小人作祟未能去成，却与王书记、何主任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从马边回乡探亲，经过乐山，去警备司令部探望何主任，他说：小伙子，莫灰心，凭你的本事和人品，早晚是会上来的。这是予我最大的慰藉和支持。十六年后，我们同赴眉山创业，频频相见，每次相见都分外开心。真个巧呀！

从市委机关到乡下学校，于农村出来的娃儿，无异于天上地下。我面对滔滔岷江，掷地有声撂下一句誓言：三年之内，我一定杀回来！在学军、建军、根林等一帮子肝胆相照的一生好友的陪伴、宽慰下，我从极端排斥到坦然接受，——既然命中注定要去往他乡，那就是一定有人在马边等我。

半年孤魂野鬼，半年苦泪暗咽。1992年元旦，我在门框上贴联曰：

露半边脸使半分力作半个梦糊涂半年，种一畦菜酿一壶酒读一柜书逍遙一生。

已然脱胎换骨矣。2月17日《中国青年报》加编者按刊发长文《我也曾困惑》，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将军亲笔题词激励，为马边建国来之破天荒，引起轰动。县委书记拿上报纸，要求宣传部、团委、教育局等单位发起在全县特别是广大青年教师中向我学习的倡议。县检察院、武装部、教育局等单位纷纷考察我，有意调我进城。去往县委常委、文卫党组书记、宣传部长蔡心华那里要人，哪里要得动啊！他说，你们请回去，我早就盯上了。他把我喊去，叮嘱我带上一些能反映我能力的资料。他从我发表的各类文章中，独具慧眼，看中了《娱乐片的悲哀与出路》，以至后来出版《警钟长鸣》，特意要请我给他写评论。1993年3月，寒假一过，我就调进了宣传部。学年中途教师系统中调人，在当时也几乎是破天荒。

1994年国庆前夕，游镜良、邵其乐诸先生来马边采访，心华派我服务。他们回去没多久，给我来信，说见面仅两次，谈话也不多，感觉和印象均佳，问我愿不愿意到《乐山日报》。这不啻天降馅饼，真乃大喜事！很快，心华通知我，《乐山日报》要你去实习一个月，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去好好干，可能对你调动有帮助。”当时，老少边困地区人才匮乏、人才难留，对人才流动有着严格的限制。心华胸襟开阔、眼光长远，有自己的一番见地，认为，树挪死、人挪活，合理、适当的人才流动是必要的，也更能激活人才这池水；从马边出去的人，心里是会装着马边的，最不济，去外地出差，能够去喝茶的地方也要多一些嘛。

在报社实习五天，发稿13篇。周末，老总找我谈话，可以回去了。心内咯噔，没戏了？回去不久，游总打来电话，说市委组织部的调令已经在路上了。原本一个月的实习考察期，不到一星期就过关了，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临行前，心华对我说，把你的父亲也请来，多要几天，离开马边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

再回来了。

在当时的大乐山，17个区县中多少人梦寐以求调往乐山。而《乐山日报》小报扩版为大报，仅从基层中选调了我一人，我是何其幸运啊！

1995年3月到了《乐山日报》，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想到哪个部门。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刚从马边来，对外面的情况很不熟悉，希望到记者部，多到下面跑跑。领导一锤定音，你的水平完全胜任编辑工作，就不去做记者了。报社当时的情况是，记者当伸抖了，成了记者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做编辑。我却一步登天，以至于新闻工作从业十余年，竟没有当过一天真正意义上的记者。

在《乐山日报》的两年，受诸位师长的恩惠，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各方面保持着向上的势头，广受青睐，可谓顺风顺水，有着可以预期的美好前程。只因年迈的双亲都在仁寿乡下，虽有一帮足可付与重托铁心铁肺的弟兄关照，但乐山与眉山分设，毕竟隔了一座桥，许多事情显然不那么方便，不假思索，到眉山创业。当年从马边调往乐山，有朋友给予我美好的祝愿，飞翔的翅膀就此止于眉山。在某种人生际遇上，到眉山可谓我的“走麦城”，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不是偶然中的失落，必然要去赶一段别样的路程，看一段别样的风景，成就一番别样的事业，活出一个别样的人生呢？

我听从着内心的召唤。

恍兮惚兮之间七年就过去了，窖藏为杨宇笔下的诗酒年华。做梦也没想到眉山要成立三苏文化研究院，还没想到我会开启第二次创业之旅，更没想到十二年后又会与心华一起“奋厉当世”，一同在苏海中放舟飞歌。从1995年3月离开马边宣传部到2007年3月在三苏祠南堂挂牌，整整十二年，人生的一个小轮回，你不能不惊叹命运的神奇！

从学生做起，虔诚拜师，用心交友，诚挚服务于苏学专家学者，服务于苏学研究、创作、发掘与交流。其间有着不为人知的酸楚，有着不可名状的惶恐，也有着集腋成裘的执着。到了2010年的时候，上海的教授来眉山访问、交流，见了我说：原本以为是个老先生，想不到这么年轻！到了分别成功举办全国首届苏洵、苏辙学术研讨会后，苏氏宗亲、苏学专家、苏研会的名誉会长及继任会长们莫不异口同声说：秘书长一职，选方永江选对了。2013年8月，第十八届全国

苏轼学术研讨会在我的母校乐山师范学院隆重召开，晚宴上，邱俊鹏、曾枣庄、张志烈三先生与乐山市、院领导在主桌就座，我与同事刘清泉择一僻静处坐下。酒杯正举，三先生不管不顾，一同站起，东张西望，口中急呼：方永江呢？方永江呢？赶快把小方请过来喝酒。此三先生者，著述等身，德高望重，公认为学界翘楚。大凡我们有事，无论大小，定有求必应，倾心相助。是我道德的标杆、治学的楷模，一生的敬畏。酒过三巡，乐山市的领导对身边的人说，什么时候，可以有人能像方永江一样在三位老先生心目中具有这样的份量，那就很不错了。第四届东坡文化节，来自印尼的钢铁大王、苏氏宗亲终身荣誉会长苏用发先生在亲友搀扶下，颤颤巍巍专门向我敬酒：感谢你为我们老祖宗所作的一切。场面十分感人，我几欲落泪。我何德何能，频受如此礼遇？一切皆拜三苏所赐。

与三苏、三苏文化结缘，续写着我与母校的传奇。称为我母校的传奇，乃是我就学时系书记的夸奖。盖因我读书时，白天三分之一时间上课，三分之一时间泡图书馆，三分之一时间茶馆枯坐、聊天、冲壳子；毕业后，一不小心成了“作家”。当年的老师，在学会中担任副会长、理事，我有幸再次领受他们的教诲，真是再巧不过！

与三苏、三苏文化结缘，我巧遇了深圳的朋友、黄冈的亲戚、儋州的同乡、惠州的亲人。种了前世的因，结下了今世的缘，我深信，一路走下去，还有许许多多拍案惊奇的巧合在生长。

七巧，定然与爱情有关，是巧合中的巧合。七巧节，又称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男耕女织乐，聚散两依依，为农耕文明时代田园牧歌式的爱情绝唱。今天，光彩迷离的人间，有几人仰望星空？又有七年之痒一说。我承受了这样的疼痛，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更加砥砺前行，突围出来，却也开辟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通道。在三苏文化的润泽下，登上了别样的高度，这就是文化的高度。不可预知的人生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沧浪之上，苍穹之下，头上三尺有神明；与人为善多栽花，不种刺，是非恩怨付诸一笑。冥冥中的种种定数，都是张惶中的巧合，偶然中的必然，不关风与水，不关数与字。且行且珍惜！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会秘书长）

# 《探秘苏东坡》后记

刘寅

《探秘苏东坡》系列在《眉山日报·博周刊》连载了近两年时间，感谢读者们一直以来给予的关注。其实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对笔者而言，正是这段经历给了我靠近苏东坡的机会。尽管生在东坡老家，但以往对苏东坡的印象，大约是一个“伟大的符号”，随着阅读与写作的深入，这个符号也变得不那么抽象，甚至于有一股亲切之感。或许是为同一片土地所塑造的心灵、血脉，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共通之处的，这也算是眉山人理解苏东坡的一个优势吧。

苏轼自言，北宋眉州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这儿的人聪明，也懂得安分守己，相互帮助。这里结下了一张根深蒂固的风俗之网，若是谁触了这张网，便要受到责难，连当官的也不例外。这张网，其实就是眉山人一如既往的生活世界，慢慢悠悠，知足常乐，懂得享受，又不过分贪图。在这“峨眉之阴”、“蜀江之上”，延续着眉山人代代相传的幸福之道。苏轼在眉州度过了最初的二十多年，他呼吸领会的生活意蕴，也为日后的道路提供了指引。如他对幸福的领悟，成型为“道德之深浅，风俗之厚薄”的固国理念。如他经历政治起伏，转而在黄州之后，开始走向诗意生活的回归。如他追慕陶渊明，栖居田园，把仕途的低谷变为艺术之巅。他的豪迈直面命运的冲击，而他的细腻婉约，则呵护着生活之美好。乐天的苏东坡，热爱美食的苏东坡，游山玩水的苏东坡，与他人分享快乐的苏东坡，这些极富亲和力的形象，可以轻松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视野，为活在不同境遇的人，带去快乐的可能。或许这便是今日这么多人热爱苏东坡的原因。

在时下这个飞速发展，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就笔者看来，苏东坡最大的意义在于提示出生活的“何所在”。在西方，哲学的视野已由理念转向生活世界，而我们自己仍处于技术革命带来的生活变革之大潮中。这里面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只是我们很难分辨，以至于大体上全盘接受，失掉了许多宝贵的传承。回望古人，特别是古代的伟人，不只要关注他们经天纬地的事业，也要关注他们最寻常的生活姿态。在那些看似普普通通的现象背后，往往藏着一些最宝贵的东西。如同古人的山水田园情怀，在陶渊明笔下，化为淡雅之至的清澈表达，而在西方大文豪歌德眼中，则上升到“人与自然总是同时生活在一起，一切都比我们（西方社会）显得更明理、纯洁和道德。”对于生活，我们理应拥有自信。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苏东坡大传》（李一冰著）、《苏轼传》（王水照著）、《苏轼评传》（曾枣庄著）、《苏东坡》（刘小川著），也多得眉山市政协主席王影聪先生指点，还有眉山日报社诸位领导，以及周刊部诸位编辑的共同策划与精心校对，在此一并致谢。

（刘寅，《眉山日报》编辑）



书名：探秘苏东坡  
作者：刘寅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版  
开本：700×1000mm 1/16  
页数：228页  
定价：36.00元

# 穿越千年，对话东坡

张玉肖倩

“人人都喜欢他，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懂他。”“追溯人生真谛，成就千古文章，自古以来只有苏东坡实现了。”8月21日，著名作家贾平凹、孙绍振、谢有顺来眉山，与我市近300名东坡文学爱好者相聚，共话苏东坡，一场文学头脑风暴在我市上演。

当天，由眉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东坡区委宣传部主办，眉山市作家协会、眉山市散文学会、东坡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穿越千年 对话东坡”活动隆重举行。活动中，著名作家贾平凹，著名学者孙绍振、谢有顺以“三苏散文的当下意识”为题，共话苏东坡，展现大家风范，吸引了我市近300名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

## 读苏东坡：不仅要读文，还要读人

“人人都喜欢他，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懂他。”贾平凹说，苏东坡是绝代的天才，且有着旷达的心胸。其人就像一个天然磁场，吸引着不同的人。然而，有着旷世寂寞的苏东坡，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贾平凹说，要读苏东坡的作品，首先要了解这个人。不了解作家全部的东西，有时候就不能懂，他的文章为什么写得好，好在哪里。所以，对于苏东坡，除了要了解他的文字，还要了解他的书法、绘画，以及他的政治、经济、人文活动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了解苏东坡。

苏东坡参透了天地人生，一生写抒情性的东西，脱口而出，不矫情、不做作。他经历了很多苦难，有着旷世的寂寞。他把生命融进写作，这就是写作的“在场”。

现在留下来的苏东坡脍炙人口的名句不只是词句优美，还都富含哲理。在一些论辩的文章中，有着对人性独到的见解。他的性情，沈从文形容得分毫不差，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的真性情“害”了他的仕途和入世的生活，

他的官职不是那么大，还遭到政敌的陷害，一生孤独失意。但苏东坡对父母、兄弟、爱人的感情都很强烈，这种爱让他战胜苦难，成为了思想家。

贾平凹、孙绍振、谢有顺一致认为，苏东坡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无论他身处什么困境，写出的文章都没有刻薄、抱怨，而是刚健、明亮，能滋养别人。谢有顺说，20世纪以来，关注黑暗面的作品太多，人的善良、温暖体现得不够，其实应该向苏东坡多学习。

## 论“写散文”：心之所至，意之所到，就是好文章

放眼当下，贾平凹认为，“在场”就是表明任何事情一旦来时，人们都学会接纳，而不是逃避、谴责或是一味辩护。“在场”感知到的愤怒和痛苦，是人们良知的精华。

与此同时，在贾平凹看来，苏东坡等文学大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随意而为，有感而发，挥洒自如，就是苏东坡的境界。他的许多信件、札记、报告都是精妙的文章。现在的学生要想写好文章，就需要多观察、多想象，多培养表达能力。

谢有顺认为，太像文章反而就不是文章了，自由的境界才能写好散文。王羲之的书法也用来记账，他认同“不能日用，这个艺术就不能长久”的观点。写散文，心之所至，意之所到，就是好文章。自由，随意挥洒，就是苏东坡的境界。

## 现场花絮：贾平凹精心准备6页讲稿

贾平凹特别重视这次座谈会，为此还特地准备了6页手稿。活动中，贾平凹浓重的陕西话，让台下近300名文学爱好者听起来有些困难。（下转第73页）

# 品读三苏文化，推进“文化立市”

## ——2015年端午沙龙·苏东坡与经典诵读综述

熊 莉

我爱苏东坡，为你把墨磨，一撇又一捺，一生都快乐……

6月19日，在《我爱苏东坡》优美的旋律中，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主办的2015年端午沙龙拉开帷幕。耄耋之年的苏学泰斗、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名誉会长邱俊鹏、曾枣庄等人不避酷暑，风尘仆仆而来；全国人大代表、眉山籍女画家何学斌外地归来，闻听盛会，不事休息，急急而来，成为活动中的一大亮点。市政协主席王影聪，副市长付庆一，市政协副主席杨常沙等参加活动，并与部分特约研究员、苏学爱好者围绕苏东坡与经典诵读这一主题，立足“文化立市”攻坚实际，畅所欲言，为文化立人贡献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充分展示了阅读的力量。

### 品三苏：感受文化坐标的影响力

东坡（三苏）文化，无疑是眉山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是眉山的乡愁所系、文化基因。此次沙龙活动，每一句谈吐、每一段吟唱，甚至随性而来的一句感悟，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三苏文化之于每一个与会者、之于眉山的发展变化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邱俊鹏教授饱含深情地说，自1980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眉山三苏祠成立，三十五年来，眉山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无论怎样变，我都不会迷糊，因为我心中始终有一个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三苏祠，它不仅是眉山的地域坐标，更是眉山的文化坐标。

邱俊鹏的这个认识众皆称善。张志烈教授语气铿锵地说，眉山的空气、水、土弥漫着东坡文化，小孩子打娘肚子里就受到熏陶。眉山的本地学者体会更深。徐康说，与三苏祠为邻，睁开眼睛都在“读”三苏（三苏祠），家里人大都从事理工方面的工作，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一说，但自己却走上了从文一途，这就是东坡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孙

开中发自肺腑地说，自己愿终身做一名守望苏东坡、守望三苏祠的草根学者。

### 品三苏：培养阅读的操控力

当前，之所以要提倡建设书香社会，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可见阅读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问题，阅读经典，就是要对庸俗、低俗、浅阅读说不！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在阐释沙龙主题时说，之所以确立苏东坡与经典诵读这一主题，首先在于苏东坡就是经典本身，读不尽、读不完、读不全，读苏东坡、东坡文化之于我们的人生都有着极深的意义。再者，苏东坡读经典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八面受敌法”，教会我们如何读书才裨益良多。

曾枣庄、胡先酉等人一再强调，要多读经典，多读原著，不能图囵吞枣、照抄照搬、炒冷饭；不能为读而读，不加选择地读，读书要有冷静的思考，独到的见解。

张志烈、蔡心华等人一致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跟着东坡足迹去读书，从其遗址遗迹中去领悟他的高尚品格；读书应成为生活的常态、生活的本身，活到老，学到老。

因为志趣、职业等的迥异，一些学者以不同的阅读视野生动地诠释操控与选择的重要。何学斌因其画家的身份，分外看重东坡视觉艺术、味觉艺术的精彩。王军对于孙氏书楼之于眉山文脉的涵养情有独钟。身为三苏故里人，理当熟知三苏事。选择苏东坡就是选择经典，眉山应自觉品读、深研、传承苏东坡。

### 品三苏：展示现实的爆发力

学以致用，当代眉山人以其实施独一无二的“文化立市”战略，展示了一个样板。

张志烈、邱俊鹏、曾枣庄等人同声称道，眉山学人不浮躁、不媚俗、不贪大、不猎奇，

始终保持稳健的势头，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从零到丰富。

刘川眉、胡正清等人由衷感叹，眉山作家的作品就是阅读经典的结果。徐丽、郑晴霞等人说，进入东坡世界，是幸福而快乐的。

省社科联《四川社科界》连续发表《苏研重镇是这样炼成的》、《苏学普及“四进”路径的实践与经验》等重头稿件，推广眉山经验；东坡文化节、东坡泡菜节、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相继在眉召开；《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等学术专著20余种，相继荣获省政府社科三等奖等重大奖项；《苏东坡》、《大写三苏》等文艺作品，好评如潮；东坡诗意图喜获“兰亭奖”，展示了眉山实力。

徐康、赖正和等老专家、老学者笔耕不辍，刘寅等后生可畏，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张志烈喜不自禁，点赞了一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对眉山学人的褒扬，是对此次活动的肯定，更是对今后眉山传承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  
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  
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沙龙活动在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袁丁、唐雅兰吟唱苏轼《浣溪沙·端午》的深情中圆满落幕。这次活动是前行的基石、交流的平台、成果的展示。大家一致认为，这种生动活泼、新颖别致的开放式活动，对于创新社科研究方法，对于以文化人、文化立人，对于普及和传承东坡文化，都是十分有益的，值得推广。

## 采访手记

### 传承与共享

闻 风

身为东坡故里人，理应熟知东坡事。对于东坡文化、国学经典的传承，就是不遗余力地做好普及工作。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立足眉山实际，探索出的“进机关，以身作则带好头；进校园，娃娃抓起开好头；进社区，文化富民出好头；进社会，文化立市起好头”苏学普及“四进”路径的实践与经验，被省社科联作为社科普及的有效方法向全省推广。2015年端午沙龙·苏东坡与经典诵读再掀普及高潮，持续展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

该院依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依托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力量，借鉴前人、国内外人士的研究成果，依靠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包括市民的作用，组织文化沙龙。这种开放性的研

究方法，以其主题的突出性、广泛的参与性、生动活泼的交流氛围，成为一项深受苏学爱好者好评的文化活动，一度被市上列为重要会节活动之一。其中，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苏东坡与美好女性，以及此次的苏东坡与经典诵读等大型沙龙活动，既有效地传承了经典，唱响了眉山名片，又让人们分享了文化立市的美好生活。

的确，传承不是目的，共享才是旨归。对于国学经典三苏文化的诵读，我们不仅仅是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传承国学，更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国学经典之于我们人生的影响、人生的意义与大家共享，对于提升个人的素养，对于提升整个眉山的文明指数，对于建设中国散文之乡、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活品质之城，都有着极大裨益。

“我爱苏东坡，为你把墨磨……”优美的旋律萦绕于心，其将一直伴随着我们把传承与共享国学经典的路走得更加坚实而令人神往。

（熊莉，《眉山日报》记者）

（上接第71页）于是，孙绍振和谢有顺当起了“翻译”。而贾平凹也凭借着自己用心的准备、精彩的对话，不时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其实，贾平凹是苏东坡的忠实拥趸。早在20年前，为了近距离感受苏东坡，他就来过眉山，如今对三苏祠还有着深刻的印象。20年后，贾平凹在参加了眉山“中国散文之乡”授牌仪式活动后，又前往三苏祠拜访。

在三苏祠的披风榭里，被称为文学界书法家名家的贾平凹，挥笔为三苏祠题词：“耸瞻文旦”。后来，贾平凹题解说，苏东坡是文学的太阳。这四个字，表达了自己对苏东坡的无限喜爱和敬佩。

（张玉，《眉山日报》记者；肖倩，《眉山日报》见习记者）

#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三）

〔韩〕洪瑀钦

## 二 模仿苏轼诗文的语言和文风

高丽中期文人，不仅学习苏轼文章，并进一步模仿其富赡恢博的语言和豪放旷达的文风，以写自己的文艺作品。李奎报《答全履之论文书》（同上书卷二六）云：

足下以为：“世之纷纷效东坡而未至者，已不足道也，虽诗鸣如某某辈数四君者，皆未免效东坡，非特盗其语，兼攘取其意，以自为工，独吾子不袭蹈古人，其造语皆出新意，足以惊人耳目，非今世人比。”以此见褒，抗仆于九霄之上，兹非过当之誉耶？独其中所谓之创造语意者信然矣。然此非欲自异于古人而为之者也，势有不得已然耳。何则？凡效古人之体者，必先习读其诗，然后效以能至也，否则剽掠犹难。比之盗者，先窥谍富人之家，习熟其门户墙篱，然后善入其室，夺人所有，为己之有，而使人不知也。不尔，未及探囊胠箧，必见捕捉矣，财可夺乎？仆自少放浪无检，读书不甚精，虽六经子史之文，涉猎而已。不至穷源，况诸家章句之文哉？其不熟其文，其可效其体，盗其语乎？是新语所不得已作也。且世之学者，初习场屋科举之文，不暇事风月。及得科第，然后方学为诗，尤嗜读东坡诗，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足下所谓世之纷纷者是已。其若数四君者，效而能至者也。然则是亦东坡也。如见东坡而敬之可也，何必非哉？东坡近世以来，富赡豪迈，诗之雄者也。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钱贝，盈帑溢藏，无有纪极，虽为寇盗者所尝攘取而有之，终不至于贫，盗之何伤耶？且孟子不及孔子，荀、扬不及孟子，然孔子之后，无大类孔子者，而读孟子，效之而庶几矣。孟子之后，无类孟子者，而荀、扬近之，故后世或称孔、孟，或称軻、雄、荀、孟者以效之，而庶几故也。向之数四辈，虽不得大类东坡，亦效之而庶几者也。焉知后世不与东坡同称，而吾子何詎之甚耶？然吾子之言，亦岂无所蓄而轻及哉？

像这样，高丽中期文人都认为苏轼就是富赡豪迈的“诗之雄者”。所以，他们非常羡慕他那文学艺术的

境界，而模仿其语言和风格。到了这里，特别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录取科举的年轻人的动向。他们摆脱科文之桎梏，都追随东坡文学之美境。因此，人说：“今年又三十东坡出。”我们从李奎报的这一段话可看出，在韩、中比较文学史上，高丽中期是接受苏轼文学影响之绝顶期。

另外，李奎报还有《十月五日陈津见访，留宿置酒，用苏轼诗各赋》（同上卷一一）、《次韵皇甫书记用东坡哭任遵圣诗韵，哭李大谏眉叟》（同上卷一五）等诗。崔滋评李奎报云<sup>(1)</sup>：“文顺公（李奎报）家集已行于世，观其诗文，如日月不足誉，近代律诗，于五七字中，有声韵对偶，故必须俯仰穿琢，以应其律，虽宏材伟器，不得肆意放言，披露妙蕴，故例无气骨。公自妙龄，走笔皆创出新意，吐辞渐多，凭气益壮，虽入于声律绳墨中，细琢巧构，犹豪肆奇峭。然以公为天才俊迈者，非谓对律，皆以古调长篇强韵险题中，纵意奔放，一扫百纸，皆不践袭古人，卓然天成也。”

（《补闲集》卷上）“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得其体也。”（同上）“李文顺公奎报，气壮辞雄。”（《补闲集》卷中）“今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真与东坡吻合。”（同上）从以上评论可看出，当时最高文人李奎报，集中体现了苏轼文学之“滋液”（风格），完成了自己文学艺术的理想。

## 第三节 高丽后期文人对苏轼的观点

高丽中期崔氏武臣政权，对卷土重来的蒙古侵掠军坚决抵抗。可是，因长期的战斗，财尽力疲，终使高丽王朝屈膝于蒙古面前，故从25代忠烈王到34代恭让王为止的100余年间的高丽王朝，不得不为大元帝国的附庸国。因此，高丽国王和大臣，常入元京，与元朝政坛人物、学者、文人、艺术家等交游，以输入新时代的文物制度。其中忠烈王的儿子忠宣王，在元京构筑万卷堂，招致当时各界名士并与之交游，是颇富代表性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元朝文坛的新动向。元朝为了确立绝对专制国家的统治秩序，诱引许衡等

汉族学者，鼓励他们积极研究新儒学的名分论。朱熹的理学，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复兴起来了。这一元朝新学问的动向，被来往丽、元间的使臣，很快地传达于高丽文坛。陪忠烈王入元的安珦（1243～1306），在元京求得《朱子语类》、《朱子大全》、《四书》等有关新儒学书籍而回到高丽之后，安珦的门人白赜正和权溥等收到新儒学书籍，一面研究其内容，一面复刻刊行而广布于文坛。从这个时候开始，高丽文人的关心越来越集中于以名分为主的朱熹理学，而渐渐远离豪放旷达的苏轼文学。

李齐贤、李穡等高丽后期的一些文人，虽然羡慕苏轼之为人和他的文学艺术世界，而他们学问的中心，已不在于苏轼的词章性的古文，而倾倒于朱熹的理学（道学）性的古文。看一看下面的几条例子：

### 一 李齐贤对苏轼的认识和游览眉山

李齐贤（1287～1367），号益斋，高丽后期文臣李瑣的儿子，白颐正的门人，从白颐正学程朱理学；又是权溥的门人和女婿。他的赋性聪明英特，弱冠时的文名，已振动高丽文坛。他是高丽后期对元从属期的外交政治家、学者、诗人。官至门下侍中，封鸡林府院君。有《益斋乱稿》。1314年他应忠宣王之邀入燕京，在万卷堂与汉族文人元明善、姚燧、赵孟頫等交游。1316年，代替忠宣王去西蜀峨眉山作祭天仪式的时候，路过苏轼故乡眉山，故停车游览三苏堂，看坐在石上的东坡塑像，并为作赞，写下了对苏轼的怀念：

《眉州并序》（《益斋乱稿》卷一）：“吾大人三昆季，俱以文笔显于东方，伯父、季夫相次仙去，唯公无恙，年今七十有奇。若使北来，得与中原贤士大夫进退士林间。虽不敢自比于苏家父子，亦可以名动一时。故水陆千里，干戈十年，所处而安，无慕乎外。故天下莫有知之者。”诗云：“眉山僻在天一方，满城草木秋荒凉。过客停骖必相问，道傍为有三苏堂。二苏郁郁应时出，一门秀气森开张。渥洼独步老骐骥，丹穴双飞雏凤凰。联翩共入金门下，四海不敢言文章。以来悠悠二百载，名与日月争辉光。君不见鸡林三李亦人杰，翰墨坛中皆授餞。韩洎绳枢笑无用，王家珠树誉成癖。机云不入洛中来，皎皎沧洲委明月。两雄已矣不须论，家有吾师今白发（自注：东坡云：易可忘忧家有师）。”

《苏东坡真贊》（卷九）亦云：“金门非荣，瘴海何惧。野服黄冠，长啸千古。”李齐贤追尊三苏，称老苏为“老骐骥”，称二苏为“双飞”的“雏凤凰”，有了三苏，“四海不敢言文章”，他们“名与日月争光辉”。而在他的深层心里，已发生了“两雄已矣不须论”的潜在意识。李齐贤除了这首诗以外，还有借东坡诗韵而作《吴江又拜一斋用东坡韵作》、《游道场山陪一斋

用东坡韵》（同上，卷九）等的诗和《大江东去》（过华阴）词：“三峰奇绝，尽披露一掬，天慳风物。闻说翰林曾过此，长啸苍松翠壁。八表游神，三杯通道，驴背须如雪。尘去处，俗眼岂知天上人杰。犹想居士胸中，依天千丈气，星虹间发。缥杳仙踪何处问，箭箙天光明灭。安得联翩，云裾霞佩，共散麒麟发。花间玉井，一樽轰醉秋月。”

### 二 李穡对苏轼的观点——“坡诗多藏教”

李穡（1328～1396），号牧隐，是李齐贤的高弟，累次入元为国子监生员，深入研究性理学。回高丽以后，历任艺文馆大提学等重要职责，选拔金九容、郑梦周、李崇仁、权近、吉再等名人，为高丽末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莫大贡献。他是高丽后期对元从属期的最大文人、学者，官至礼部侍郎、翰林直学士兼知制教、兵部郎中，所谓丽末三隐之一。著有《牧隐稿》。他做了3000余首诗和大量散文，但考察他的文集，几乎看不到与苏轼有关的诗文，只是有下面一首《华严大选敬如，在妙觉寺携东坡诗从天台圆公受其说，因其来访，讯之如此，喜其知慕斯文，赋诗以赠》（《牧隐稿》诗稿卷一三）诗而已：

华谷雪林远，天台道路通。  
坡诗多藏教，萧寺半儒风。  
熟读灯花落，高吟瓦雪融。  
斯文寻已遍，更访白头翁。

李穡以外的高丽后期文人对苏轼的关心，都跟李穡差不多一样。

### 注释

[1] 崔滋，（1188～1260），高丽中期武臣治下的文人，李奎报门人。官至守太师门下侍郎，有《保闲集》。

（韩瑀钦，韩国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 守望眉山的草野学者孙开中

伍成艳

孙开中出身于川东地区一个教育世家，因母亲是眉山人，且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安家于眉山，故他虽在川东一带读书长大，但在心灵深处，一直和眉山保持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但直到1963年旧历年底，已是西师中文系（今西南大学文学院）二年级学生的孙开中，解放后才首次踏上眉山的土地探亲。

当他第一次走进三苏祠的时候，深为眉山历代乡亲对三苏的崇敬和热爱所震撼，从三苏祠文管所工作的川东老乡张彬的私下介绍中，了解了解放以来一些名人权要对三苏的评价，得知几个月前，朱德委员长的题辞：“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孙开中暗自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川东人特别熟知的共产党人代表朱德的卓见叫好。

## 一、与三苏研究结缘

作为一个生于解放前，成长于红旗下的文科大学生，有一点三苏的常识不言而喻。应该说，三苏研究在文革前就是一大冷门，文革中更成为令学者们行动上望而生畏，思想上又依依不舍的学问。1967年秋，重庆武斗正酣，初拿到大学毕业生工资尚等待分配工作的孙开中，在北碚嘉陵江畔一家废品收购站淘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宋史纪事本末》等书，读后眼界大开。几经辗转，1972年底，孙开中如愿以偿地分配（实为调动）到三苏故里任教，有幸结识了一大批眉山热爱三苏的老少学者朋友。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孙开中曾奉命到三苏祠参与批三苏。读了若干资料和东坡原著后，自觉水平低，看不出三苏对党和人民的危害之处，所以借故溜之大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9月，由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眉山县文教局发起，全国首届苏轼学术讨论会在眉山三苏祠召开，并正式成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这对已落户眉山任教多年的孙开中，在思想甚至精神层面上，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于是他尽个人能力，添置图书，搜集资料，在任教的学校中，自觉宣传普及三苏文化。同时联系师友中的苏学爱好者和行家，如曹慕凡，徐洪火，马德富、文天行，邓洪平、彭泽良、叶权等，互通信息，切磋讨论，形成自己稳定的学术思想和态度。

1987年是苏东坡诞辰950周年，眉山将举办大型纪念活动，时任三苏博物馆副馆长的张忠全（后任眉山市政协副主席）主动向孙开中约稿，表明各地稿子会择优由省级出版部门正式出版，学术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做到畅所欲言。

孙开中当时在眉山师范学校任教，以民盟宣传委员身分兼任着眉山县政协常委和文教组副组长，不按时交上一篇比较像样的文章是说不过去的。思之再三，孙开中决定扬长避短，放胆说话。他觉得苏轼研究老是停留在“全能作家”和政治平反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全新的视角和研究领域。

他在《苏东坡的成才之路》一文中表述了如下观点：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文化巨人中，无论生前或死后，无论对哪个阶级或阶层，无论对国内或国外，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的，恐怕莫过于苏东坡了。”

“没有北宋中叶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没有正在实行着的科举制，就不会出现苏东坡这样的‘奇才’。”

“他能名震京师，首先得到社会承认成才的标志不是举仕后才大量创作的诗词，也不是为官之暇写的那些文学散文，而是闪耀着爱国和民主思想光华，充满改革进取精神的政论文章！”

《苏东坡的成才之路》近万字，涉及的问题很多，这种带有乡土风味的文章面世后，受到社会一致好评。1988年秋，经专家反复审定，获得了当时乐山市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证书。

这篇三苏研究的处女作发表后，孙开中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研究文章，内容和主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这篇文章而逐步深入扩展的。

## 二、学术议政的实践

孙开中身为改革开放时期处于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主业是培养和培训各类学校的教师，主要成就在教育科研。他在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之外，连续兼任了县政协两届常委、县人大两届常委，眉山撤县建市过程中，还同时兼任了市（地区）首届政协委员和四川省人大代表。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眉山成立以后，大大提高了眉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全面推动着眉山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进步。传承三苏文化、弘扬东坡精神，建设崭新的文化主导型城市，日渐成为眉山人民的共识。可以说，市县（区）各级历届领导都很重视三苏文化的研究和发掘，希望从中能找到帮助眉山跨越发展的内在动力。

1997年9月，眉山县举办第三届东坡文化节，《眉山文化》主编李永贤主动约稿，孙开中提交了费神写成的《陆游诗赞眉山城考》一文在文化节专号上发表，文章详细论述了陆游诗作的可靠性和重要价值，指出“陆游独具慧眼，‘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抓住了眉山和其它地方相比而凸现的特色或本质特征，对眉山深厚的文化传统倍加推崇和赞美。”“陆游的这首诗，最先向世人揭示了眉山的风采和魅力，从而使眉山一直饮誉天下。”显然文章为“中国诗书城”的建设推了波、助了澜。

为配合眉山的改革开放，1985年5月，旅居成都的眉山籍乡亲，成立了“苏里建设学会”，集资翻印出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5000册，他们利用部分创收款，支持眉山著名书法家伍中一书写苏东坡名文《眉州远景

楼记》并勒石刻碑，石碑送到三苏祠要求博物馆收藏展示曾受阻，其影响广泛深远。

后来，《三苏祠》编辑何家治向孙开中约稿，孙开中特地写了《令人千秋眷念的精神家园——放谈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发表在《三苏祠》2003年第四期“苏学研究”上。他接着在东坡诗社社刊《远景》就此另外连发数文，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没想到眉山市政府在财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很快设法重建了这座千古名楼，由此成为新眉山的地标性建筑。

早在眉山尚为“地区”之时，孙开中应《眉山日报》编辑王旭敏之邀，于1999年7月8日发表了《弘扬三苏文化，发挥传统优势》一文，声称：“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无疑是眉山最大的传统优势。”建议：“地方文化应该创造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没有特色和个性的文化因缺乏生命力而缺乏渗透力、凝聚力和牵引力。弘扬三苏文化，既是高雅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形成眉山城市文化特色的要求。”

仅此数例，十七年中孙开中在眉山的学术议政实践可见一斑，作为一个苏学的草野学者，他能亲眼看到和体验到自己的研究，对社会的进步产生哪怕是一点零星的作用，也觉得是莫大的快事。

## 三、薄薄的成绩单

孙开中没有出版过苏学专著，他喜欢干具体的实事。当“中国诗书城”崛起于神州大地的时候，凡用得着他并且他也干得了的杂事，孙开中都会自觉去干。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眉山老一代知识分子发起成立民办文化团体东坡诗社，二十多年来，发展成员众多，已蜚声海内外，2008年成为中华诗词学会团体会员。孙开中一直参与了筹备和领导工作，自2003年以来，担任副社长和社刊《远景》主编至今。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领导高瞻远瞩，2005年将秘书处从四川大学迁移至眉山，并创办会刊《苏轼研究》。眉山市出于文化立市的战略考虑，专门设立了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2007年，退休后的孙开中被聘为首批“特约研究员”，《苏轼研究》编委，还做了两年“特邀编辑。”

至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形成于文字而孙开中首肯的论文另计有：

（下转第79页）

## 游苏辙公园

刘清泉

8月19日，在王影聪主席带领下，到城区的文化建设项目采风，在此我特意为大家介绍一下苏辙公园。

我们的车从眉州大道接近岷江二桥西端，来到苏辙公园的主入口。那儿有一个卧牛似的景观石，高约2米，长约6米，据说有20多吨重，石质细腻，文饰美丽，颜色橙黄，与花草深红的花圃相映成趣。仿佛有风从右边吹来，石上的风云动态与文字静态相映成趣，似蒙太奇效果。镌刻的“苏辙公园”四字为深红色，集自苏辙书法。

巨石背面，有山峰似的凹凸，有淡墨色浓荫，有深红色的刊刻。左侧“养气”二字赫然在目，为苏轼书法；右侧刊刻竖排小字，曰“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引自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对“养气”二字进行诠释，以彰显三苏父子重视品德修养的家风。此文是苏辙19岁进士及第时写给枢密使韩琦的求见信，是他少年得志、彩色绚烂的文字。

距入口不远，是颍滨广场，苏辙塑像伫立其中，高6米多，据说是国内首个苏辙铜像。川眉说：“这是现代著名雕塑家叶毓山的作品，他擅长历史题材的雕塑。”其底座为黑色大理石，高约2米，上镌刻“苏辙（1039~1112）”。铜像定格了苏辙做副宰相时疾步行走的瞬间，只见他甩开两手，右手在前握书卷，有风自左手吹来，衣袂飘拂、披肩飘扬、神思飘荡，微低的头颅、沉静的神情、睿智的眼睛，一边步行一边思考着。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苏辙“致君尧舜”的风发意气。我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苏辙啊！大家都争着在塑像前留影，王影聪主席与徐康老师亦在塑像前合影留念。

前边有1.13万平方米的“千叶白莲湖”，我想

大约是遍植白莲之故吧。川眉说：“湖名取自苏辙诗《千叶白莲花》：‘莲花生淤泥，净色比天女。临池见千叶，谪堕问何故。空明世无匹，银瓶送佛所。清泉养芳洁，为我三日住。蔫然落宝床，应返梵天去。’”苏辙居住颍滨，邻父赠他白莲，植入三尺盆内，百日之后，花繁叶茂，其《盆池白莲》诗曰“及秋尚百日，花叶随风翻。举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公园大部分景观都以此湖为中心设计。

我们首先来到湖滨的“菡萏廊”，此名出自苏辙《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菡萏轩》，诗曰：

开花浊水中，抱性一何洁。

朱槛月明时，清香为谁发。

菡萏即荷花，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倍受世人赏爱。朱槛月明，清香益远，很美的景致。九曲回廊建筑在湖边，廊首有牌匾和对联。川眉说：“为了这些题名和对联文字，我翻遍了苏辙的集子。”我知道他喜好书法，于是说：“公园里的题字，有你的书法吗？”“这是集苏辙的诗句、赵孟頫的书法。”小川说：“作为苏辙公园的文化顾问，这些文字都是川眉定夺的，但整个公园没有他写的一个字。”“菡萏廊”对联曰：“湖上柳丝有所系，桥底荷花无限思。”我猜想，湖上柳丝系住了荷塘月色吧，桥底荷花思念着牧童短笛吧。

出回廊不远是“翠眉桥”，桥名出自苏辙《绩溪二咏·翠眉亭》，诗曰：

谁安双岭曲弯弯，眉势低临户牖间。

斜拥千畦铺绿水，稍分八字放遥山。

愁霏宿雨峰峦湿，笑卷晴云草木闲。

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

与苏轼“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一样，“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是苏辙不由自主的乡思流露。像眉毛一样的桥，上下有

明显的坡度感，但防滑效果很好。桥头有大面积的草坪，乔木成林，灌木成片，据说公园绿地面积就有6.78万平方米。

往右是公园三大“川西宋式”仿古建筑之一的“雏凤阁”，下配对联为梅尧臣写给苏洵的诗：“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称苏轼兄弟为“雏凤凰”。左右两边的配套建筑分别悬挂“秀杰深醇”和“汪洋澹泊”牌匾并配对联，牌匾揭示、对联诠释苏辙的性格特征，字乃集黄庭坚书法。

从“雏凤阁”前面绕湖而行，有“九曲亭”，匾联皆为集赵孟頫书法，联曰：“城下柳荫新过雨，湖边荷叶自翻风。”出自苏辙诗《次韵王巩见寄》，写雨后汴京垂柳依依、湖水茫茫、荷叶田田的清新、脱俗，以风荷的自在、忘情，表达对王巩大隐隐于世的称许。此联前句“怜君避世都门里，劝我忘忧酒盏中”，是说王巩避世隐居在京城里，劝我借酒浇愁忘记烦恼。此亭源自武昌九曲亭。武昌北宋时为鄂州治所，即今湖北省鄂州市，与黄州隔江相望。苏轼贬谪黄州，常常渡过长江到武昌西山游玩。西山松柏之间，羊肠九曲，有亭曰九曲亭，其址甚狭。元丰五年，一夕，风雷大作，拔去一木，地得以广。乃重建九曲亭，苏轼嘱其弟苏辙作文记之，乃《武昌九曲亭记》。苏辙抓住苍森历落、萧然绝俗的景物特点，描写人物幅巾迎笑，睥睨终日，摘花采石，翩然若仙，最后用人生“以适意为乐”议论作结。此文情景理俱入佳境，是一篇精彩的写景小品。

从九曲栈道穿过湖面，只见两边众多的白莲盆栽安放在湖里，在浅水里向我们点头致意。过栈道路边有3米多高的青石景观，青色中夹杂着白色竖纹，仿佛数峰耸立，其正面刊刻东坡体的“千叶白莲湖”五个大字。转过身来，竟然回到了“菡萏廊”前。

因行程安排关系，我们没有到文定楼、遗老斋和次入口。公园次入口在南面，在“雏凤阁”后面，与主入口相对，为牌坊建筑。

苏辙公园占地面积9.6万平方米，投资7千多万元，其特色在于地形塑造和建筑设计融会苏辙诗文和生平，展现他“汪洋澹泊，秀杰深醇”的人文风韵，是眉山中心城区“四大主题公园”中，引人注目的浓墨重彩。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上接第77页）

《纵论苏东坡的成才环境》，2003年获眉山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苏东坡民本思想述评》，2007年入选《东坡国际文化节论文集》。

《平民“文豪”苏洵刍议》，2009年5月入选《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究会论文集》。

《东坡母舅程氏家族漫谈》，载《苏轼研究》2008年第1期。

《一代奇女照汗青——正论东坡夫人王闰之》，载《苏轼研究》2008年第3期。

《说说苏东坡之妾》，载《苏轼研究》2011年第4期。

《苏东坡黄州功业浅说》，载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放鹤亭》。

《不能轻易被代表的大文豪苏辙》，2012年5月入选《苏辙研究——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敢立潮头亲浪花——赖正和先生苏学研究述评》，载《苏轼研究》2012年第2期。

《东坡诗论浅见》，载东坡诗社社刊《远景》2006年本。

《草野文化的力作——读熊朝东<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载《苏轼研究》2010年2期。

《东坡文化精神永放光芒》载《今日东坡》报2008年7月28日。

受积习影响，孙开中在学术研究上坚持两条：一是注重发现，二是务必创新。舍此二条，宁缺勿滥。他尊重权威，但从不迷信，更不争名逐利。凡为文，自出机杼，言皆已出，故于同道中多得好评，少闻恶声。

刚过古稀之年，孙开中定居于三苏祠、三苏文化研究院之侧。人到晚年，可以日夕守望。悠游于中国的文化圣地之中，不能不说这是基层文教人士的快事。

（伍成艳，眉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 眉山举办“苏东坡与经典诵读”端午沙龙

“我爱苏东坡，为你把墨磨……”在一群小学生声情并茂的吟唱中，6月19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主办的2015年端午沙龙“苏东坡与经典诵读”在三苏纪念馆举行。

市政协主席王影聪，副市长付庆一，市政协副主席杨常沙，苏学泰斗、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名誉会长邱俊鹏、曾枣庄与部分特约研究员、苏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话经典，传承、分享品苏心得。

此次活动结合全民阅读，立足“文化立市”战略攻坚实际，确立了苏东坡与经典诵读的主题，以

文化人，文化立人。活动融吟唱东坡、诗词联诵、情景独白、推心置腹的交流于一体，形式新颖别致，活泼大方，是一个切磋的平台、前行的基石和提升学养的有效途径。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种寓教于乐的苏学开放式研究，对于东坡文化品牌的普及与传承，对于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活品质之城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值得推广。

王影聪、刘清泉等现场签赠新书，助力全民阅读。

（熊莉，《眉山日报》记者）

## 徐州举办首届利国苏轼文化节

2015年7月8日，由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党委、政府和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利国苏轼文化节暨苏轼诗词大型演唱会在利国镇举行。出席文化节观看演出的有：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会长，徐州市原市委书记、市长、市人大主任王希龙，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叶升平等，共200余人。

大会将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孟昭全等编写的《苏轼文化知识问答》一书，作为利国镇普及苏轼文化知识的基本教材。徐州市书法家雷声、江苏省特级教师徐新民等分别将自己的作品赠送嘉宾和奖励教师、学生。叶升平教授将以苏轼诗

文为内容的精致的艺术品捐赠给利国苏轼小学、利国中学等单位。下午2时30分，首届利国苏轼文化节苏轼诗词大型演唱会在利国宾馆礼堂拉开序幕。全体演员怀着对苏轼的无限敬仰，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在节目衔接的间隙，穿插着数个华中科技大学的精致艺术品的捐赠仪式，使整个演唱会显得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整场演唱会组织细致，演出精彩，异彩纷呈，高潮迭起，受到全体观众的高度赞扬。

（谭敦容，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 苏轼文化登上铸造技术高端论坛

2015年5月14~15日，中国铸造协会在中国苏轼文化名镇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举办高炉短流程铸造技术论坛。国内有关高校的铸造专家、从事铸造行业的企业家及企业界代表近50人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铸造学会理事、消失模与V法铸造技术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叶升平主持。叶教授和到会专家认为，把苏轼文化引进科技论坛是这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九百多年前，苏轼治理利国，采用石炭代替木材作为燃料，其实质就是用科学技

术的手段，提高了炼铁的效率和质量，再辅之以打通产品销路，治理盗贼等行政管理措施，使利国走向了辉煌。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像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一样，采用科学技术的手段辅之以一定的行政管理措施，多管齐下，群策群力，发扬关注民生，勇于创新，和睦相处，发扬自强不息的东坡精神，让利国继续走向辉煌。

（谭敦容，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高级工程师）